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向上流動卻逐步遠離？：菁英文組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衝突

Moving Up or Drifting Away? Parent-Child Conflicts of Elite Liberal Art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謝宇修

Yu-Hsiu Hsieh

指導教授：藍佩嘉 博士

Advisor: Pei-Chia Lan,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July 2020

## 感言與謝辭




我深信第二階段所要涵蓋的新論題，便是家庭：那個女性主義的敵人應該抵抗圍攻的血腥之境。在那場戰役中有我們個人和政治會造成危機的情感與經濟賭注，但女性主義者卻視而不見。

Betty Friedan, 1995[1981], 《第二階段》, 頁 88

這本以家庭為研究對象的論文的起源是我所接受到的女性主義召喚。我學習的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著重關注公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壓迫與歧視議題，而深受啟蒙的我也一起關心並探索如何改善女性與性少數在公領域所遭受的壓迫與污名。然而，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下強調革命式的改變鉅觀結構的取徑讓我遲疑：假若女性主義者所盼望的性別平等之境是遠在遙不可及的未來的烏托邦理想鄉，那麼活在現時現地受苦的人們的困擾如何得到安放？在這樣的反思下，進入研究所就讀的我試著轉向探究私領域的「家庭」，誠如前述引言所提的，我想要攻進那場有我們個人和政治會造成危機的情感與經濟賭注的戰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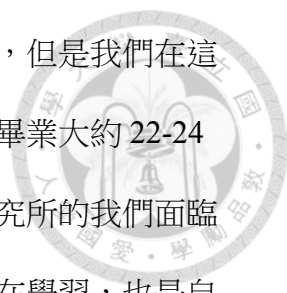
對我而言，家庭有四個觸發我的興趣的向度。第一，在我著手進行這本論文的研究之時，立法院尚未立法保障同性婚姻，甚至連司法院大法官宣告不讓同性伴侶結婚違憲的解釋文也尚未出爐，同時打著守護家庭為旗號的保守反同團體蠢蠢欲動。因此，我質疑這種以異性戀核心家庭為唯一形式的家庭想像，想要探索家庭多樣型態的可能。第二，照顧責任在國家、市場與家庭之間的分配問題上，台灣政府與社會往往將照護責任推卸到家庭身上，偶爾交給市場，而輕忽國家的責任，這一點上我也很好奇家庭該承擔的照顧責任程度應該到哪



裡。第三，從階級再製的角度來看，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往往是傳遞優勢資源的單位，但這件事卻被視為理所當然。也就是教養責任與權利交給血緣家庭的原則，有沒有鬆動的可能性？第四，受到精神分析的啟發，我認為家庭往往是人一生的議題，也是最初始的創傷來源。因此，對我而言探討家庭議題可以說是釐清人的自我形成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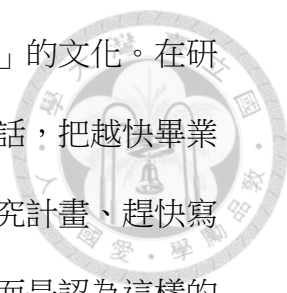
然而，著手實行一個以家庭關係為研究對象的質性研究所會遭遇的課題遠超出了我的預期，尤其又選擇了與自己所正面臨的生涯課題重疊的主題。我的生命經驗與受訪者的生命經驗相互映照，在受訪者的訪談裡也讀出自己與父母關係的酸甜苦辣，著實是需要投注相當大的情緒成本。以碩士論文來說，我想我不會推薦任何後進以選擇這種與自己生命經驗有太強烈直接的共鳴的主題來撰寫。這一趟旅程充滿顛簸，即便走到最後，好似確實對於與父母如何相處有了更提升一個層次的理解（但不代表實作能夠同步跟上），我仍然認為這是一段不敷成本的投資。如果可以重來，我會選擇找另一條讓我比較能抽離自己，站在他者的位置，潛心砥礪研究能力的路，對於身為研究新手的我而言遭受的挫折與內傷或許會少一些。

接著，我想分享我讀碩士班的一些感想。從以下的感想中，我想更能詳細地傳達研究所這幾年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我個人的經驗當然不能夠概括所有研究生的經驗，但是作為一個個案，我想儘可能的分享我所看到的在我身上以及我的同儕身上的結構力量是什麼，也就是所謂「研究生的心魔」，它並不是單純來自於內在，也是來自於外在制度和實作的共構。我想試著指認出碩士班研究生的四個「無以名狀的難題」。分別是年齡難題、英文難題、工作難題跟論文難題。



首先，碩士生雖然制度上設計的最大目標是完成碩士論文，但是我們在這個生命階段面對的課題不是只有做研究、寫論文而已。大學剛畢業大約 22-24 歲左右的年紀，相較於那些已經出社會工作的同儕，選擇唸研究所的我們面臨對未來更大的不踏實感及不確定感。因為讀研究所已經不只是在學習，也是自己所選擇的一種職涯發展起點。為了探知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喜不喜歡走這條路，比較焦慮的人就在急於得到一絲肯定的訊號和對自己失望中徘徊。在這個時候，本所的課程指定閱讀、對於「文獻對話」的想像又十分導向英文文獻，某種學術後進小國要追趕上美國學界的焦慮襲向我們。不在後美援脈絡下的我，剛好又特別對美國文化與英語世界缺乏認同感，勉強自己每週讀 100-200 頁的英文書目幾乎耗盡精力，碩一、二因此經常在系館熬夜，開啟身心疲乏的惡性循環。此時，面對經濟獨立的要求或需求，以及不同社會階級背景家庭的金援實力差異，研究生們接各自不等量的研究助理及教學助理的工作或是校外打工。工作勢必會佔去一些時間，當好助教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又因課程而異。碩一、二的我又因為多年來想要實現的日本留學夢，更勉強自己接更多工作存錢。

在年齡、英文與工作的三個難題夾攻下，已經應接不暇的碩士生，其實在面對沒有時程表、沒有實際操作經驗的論文研究時，非常、非常的無助。甚至連每個禮拜要撥多少時間給論文、撥給論文的時間應該要做什麼事，都沒有個方向。我曾經試著跟小我三屆的同學辦討論會，我想請他們每週撥個一小時的時間也好，早點開始處理論文，以免之後壓力爆棚。結果後來我失敗了。他們告訴我，我們每個禮拜上課、當助教要讀的書就已經讀不完了，我們沒有任何時間可以撥給論文。我當時深深感受到我太過天真，論文的「心魔」真的其實是一個制度性的結構難題。



在今天，我認為台大社會所存在著我稱之為「趕畢業比賽」的文化。在研究所的過程中學習成長的價值被懸置，壓抑自我發展的內在對話，把越快畢業越好當作目的本身，所作所為一切都要趕快簽指導、趕快考研究計畫、趕快寫完論文、趕快口試、趕快離校。我並不是說拖延是沒關係的，而是認為這樣的研究生文化忽略了一件事：研究是要磨出來的。

在我的經驗裡，我認為寫論文除了在修課中學到的讀書、寫摘要、做評析，以及研究方法的技巧外，還有很多隱性的必要能力必須學習。碩士論文研究是一個至少長達一年的大工程，但沒有人幫你安排工作進度和流程，你必須學會時間管理，管理自己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甚至要控管你能讓別人佔用你多少時間。而且，你必須學會自我規訓，研究過程和寫作都像是健身一樣，會慢慢進步但很辛勞，所以要學會能夠在沒有有人在背後監督的條件下，逼自己工作。你必須學會動手操作，不能太自作聰明，以為什麼都可以在你的腦內想通，然後直接輸出成一本論文；要學會零碎的寫筆記、畫架構圖，把心象變成看得見的對象來處理。最後，研究是一個起步時不能確保終點長什麼樣子的過程，當然也正是因為如此，研究才可以為人類的知識拓展未知的前沿。但對於研究新手而言，這種必須要承擔未知的風險、在伸手不見五指的五里霧中勇敢向前冒險的心智資質，常常是需要鍛鍊的。

寫論文真的很不容易，時間管理、自我規訓、著手實作、冒險性格，這些隱性的能力沒有一門課教你，告訴你你需要學會。但你不具備的話，碩士班這條路充滿荊棘，磨練著你必須練習習得。有些人剛好先備了這些性格特質，他們會走得比較不顛簸，讓不具備而需要學習的人，像是我，很容易自我懷疑、喪失自信心。

能夠度過這四年對我而言既艱辛、挫折，又不斷自我反省與重新自我認識的旅程，我要奉上十二萬分的感謝給一路上以各種形式支持我、善待我的人們。憑我一己之力，完全、完全無法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得到太多人的幫助，值得我逐一致謝。



首先，我最感謝的人，是我的父母。我和很多研究生不一樣的地方是，沒有我的父母，絕對不會有我的碩士論文。因為，我在背離親緣這本書的啟發下，開始進行了一個以親子關係為主題的碩士論文研究。我相信，不管小孩天生成或是後天變得和父母多麼的不同，親子之間還是有可能用對彼此真誠的愛協調共處。我的碩士論文也是我和父母的故事的縮影，因此，這一路上我最感謝的人就是我的父母。我也感謝我的三位姊姊們在我任性繼續升學的期間為我們家的付出，我自知理虧，連道謝的立場都站不穩，但我會盡我的努力補上我應該有的貢獻。

我非常感謝我的指導老師藍佩嘉老師。我自覺是給藍老師添了很多麻煩的研究生，也許很多時候藍老師不知道我在搞什麼，而那些時候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搞什麼。非常感謝藍老師在我因為各種研究生難題困頓停滯的時候，也不曾成為我的壓力源，鼓勵我要對自己有信心、展現出魄力；在我的論文有任何一步前進時，給我最適切有幫助的建議。雖然我自知因為一路下來研究所生活累積的沉重心理負荷下，這本論文有許多力有未逮之處，仍非常感謝藍老師耐心指導我到論文完成的時刻。以及感謝藍老師一直以來讓我當老師的研究助理，讓我鍛鍊研究的各種技藝，並成為我的經濟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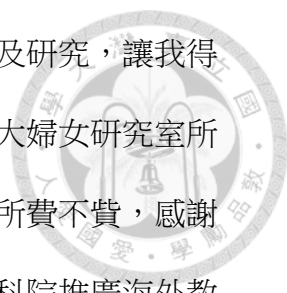
感謝這本論文在研究計畫階段及最終口試階段擔任口試委員的郭貞蘭老師、石易平老師、胡郁盈老師，有各位老師珍貴的建議，我才能完善這個研究，撰寫出這一篇碩士論文。本論文在撰寫過程中，部分內容曾在 2018 及

2019 年的台大、京都大、首爾大三校聯合工作坊 East Asian Junior Workshop、2019 年的台灣社會學年會、2020 年北海道大學舉辦的 East Asian Conference for Young Sociologists（以上工作坊感謝推派參加的台大社會系、京大文學研究科以及行前培訓的老師們），以及台大婦女研究室發表，感謝發表前中後惠予我建議的諸位老師、同學，協助我得以步步推動這本論文的完稿。

我也感謝在各個研究所討論會當中，耐心閱讀我不成熟的作品及聆聽我不成熟的報告，給予我意見的同學們。謝謝你們真誠的回饋，讓我得以精進論文的内容與寫作。論文自救會的小明（明中）、小寶（韋宏）、宇弘、定皇、侑謙、肯謝（易澄）、科量、舒晴、耕任、稚驊；互助會的 Sam、可祐、宇廉、高睿、明珊、悅澤、奕辛、琇雯、連毅；教育社會學討論會的以正、達文、明珊、旆君、璇嬋、蕙文。

感謝我進行這篇碩士論文研究過程中所訪談的每一位受訪者。滴水之恩當湧泉以報，無以回報的我願這篇論文能與你們的生命經驗也能有所共鳴，願我們一起在省思自己與父母的關係、自己與自己的關係的路上，終能走向內心的平靜與和解。

研究生名為學生，實際上卻是一隻腳踏入社會的半社會人士，自進研究所以來讓我得以經濟獨立地生活，要感謝一路上給予我工作機會的人們：讓我擔任研究助理的林宜平老師、楊弘任老師（感謝宗晏介紹工作）、藍佩嘉老師；讓我擔任教學助理的藍佩嘉老師、吳嘉苓老師、范雲老師、林國明老師、陳東升老師（以及行政助教家如）、黃克先老師、葉德蘭老師；讓我在京都打工擔任口譯員的株式会社アドリンク及照顧我的上司マリさん（感謝家安介紹工作）；讓我擔任行政助理且時常讓我打擾請教的瑜焄；以及在工作路上所有照顧包容不才的我的同事們。



研究生的工作收入有限，感謝以下的獎助金資助我的生活及研究，讓我得以無虞的撰寫論文：台大社會系所提供的移地研究補助金、台大婦女研究室所提供的台大婦女與性別研究碩博士論文計畫獎助金。赴日交換所費不貲，感謝支持我順利度過在日本當交換學生一年生活的獎助金：台大社科院推廣海外教育獎學金、全坤建設文教基金會獎助金（特別感謝 Robert 一直以來對我的幫助與支持）。

感謝在研究過程中協助我散布徵受訪者表單的世軒及其他我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以及感謝孟軒協助我繕打一部分的逐字稿。

在論文最後完成的階段，感謝閱讀全文並給我寶貴意見的小寶（韋宏）、廷碩、振傑；口試前幫助我預演的小寶（韋宏）、廷碩、喬元、振傑、霸子（明澤）；幫助我設計口試簡報的紘晟；口試前協助我場地佈置的紹芳。

非常感謝陪伴我度過研究生生活點點滴滴的 R05 同學們，你們都是最棒的，我愛你們：小侯（詠綺）、小寶（韋宏）、廷碩、君頤、哲維、振傑、韻如、貞沂、尉倫、婷婷、春旭，以及 R05 之友世軒和喬元。

感謝社會所各屆的同學們的陪伴，能和你們一起經歷過這段研究生生活的時光是我的榮幸：R02 的小明（明中）、亦甫、路易（宜武）、耕任；R03 的定皇、宇弘、稚驊、舒晴、科量；R04 的肯（易澄）、侑謙、予婷、育萱、廣彥、劭杰、奎彥、乙平；R06 的亮穎、詠馨、俊植、珮宸、璇嬋、學穎；R07 的以正、慧文；R08 的 Sam、可祐、宇廉、高睿、明珊、悅澤、奕辛、紹芳、琇雯、連毅、旖君；博士班的安琪；同門的學姊子壹。

感謝我在碩士班期間修過的所有課程的老師，你們讓我在學識上與人生上都有所學習：李相美老師、黃克先老師、藍佩嘉老師、郭貞蘭老師。也感謝其



他所上支持過、聆聽過、幫助過我的老師們：劉仲恩老師、簡好儒老師、吳嘉苓老師、曾熾芬老師。

感謝聆聽我的困擾、讓我諮商、提供我技巧或藥物，幫助我從論文與人生的泥淖中脫身的專業工作者們：台大心輔中心的老師們（特別感謝協助我建立時間管理能力的宣秀慧社工師、許嬰寧心理師；協助我找回寫論文意義的王梅君心理師）；昱捷診所的林朝誠醫師；伯特利身心診所的游佩琳醫師。

感謝我所有擔任過助教的課程中我所帶的學生們，在教學中我屢屢自我增進，我看見自己也會有喜迎挑戰的時刻，所以你們讓我發現，教學相長是比起研究讓我真正最快樂的事。

感謝在這四年裡，一路陪伴我喜怒哀樂，給予我心理支持經歷種種的所有我重要的朋友們，包括 R05 的好夥伴們（尤其是最常讓我訴苦的小寶(韋宏)、研究室夥伴哲維和振傑、常跟我分享研究趣味的廷碩，以及在論文後期支持同理我的韻如)，以及其他的友人：士珏、小明（明中）、小向（柏翰）、Tomo（知言）、佑權、東緯、威比、連翊、紘晟、苓儀、燕哲、純瑄、旻融、芷含、黃捷、孟璇、汎如.....。

在研究室度過的無數個或熬夜或失眠的夜晚裡，感謝有哲維、振傑的陪伴，感謝肯（易澄）偶爾的送暖，也感謝 106 研究室的巧拼和桌椅、212 研究室的行軍床、宵夜夥伴（全家、玉欣珍、瑞安豆漿），以及感謝碩一、二期間住在水源 BOT 時屢屢因我晚歸而被我吵到的前室友們的包容。

京都に留学していた間、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った方々にも、心より御礼申し上げます：柴田悠先生、柴田研の皆様、落合恵美子先生、落合研の皆様、ハイム先生、りょう（相澤亨祐）、大木さん、ソダムさん、郁欣、マリさん、映画村のスタッフの皆様、りょうた、あきら、たくや、こうすけ、たけ

さん、家安。そして、お参りしてきた神社さんやお寺さんにも、御礼を申し上げます。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せいで、当分の間日本に戻ってお目にかかることが無理そうですが、いつかまた会える日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どうかお体に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

感謝尾田栄一郎老師創作出 ONE PIECE 這部經典的漫畫作品，成為我一生中重要的精神嚮導，追著連載漫畫的日子充實了我的生活，這本漫畫也啟發了我對於權力與不平等的反思。感謝眾多遊戲實況主與 YouTuber 豐富我的休閒時光：烏龍、佑哥、尚恩、蘿蔔、蓋瑞、moba 數據姬、bubuchacha、老高與小茉、カラオケ 100 点おじさん、阿後、他她 TV、Ting。感謝唐綺陽的每週星座運勢週報，週週引導著我迎接新的一週生活。感謝 118 巷的餐廳們以及 TC 茶水鋪，這麼多年來充實我的食生活。

感謝在論文寫作的最後階段，以視訊語言交換的方式陪伴我的小諒（平川諒）。每週的語言交換讓寫作衝刺中疲憊的我獲得了很多滋養。

感謝在這幾年的歲月裡，直接面對我的任性，照顧我的脆弱，陪伴我成長的重要的人們：世軒、孟軒、明澤。身為見證這本論文誕生的乾爹，望你能伴我繼續走過未來人生的道路，闖過下一個與之後的個個難關，共享所有的喜悅，明澤。

## 摘要



在媒體上時常將中下階級出身考上知名大學的案例當作成功故事，高學歷學歷向上流動的價值。然而，鮮少有報導或研究進一步追問這些人進大學「之後」的生活是否真的如此美好？學歷向上流動就能夠改變家庭，帶動家庭躋身中上階級的世界嗎？本研究以進入頂尖大學就讀的文組第一代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在經歷過高等教育後，和父母的相處中如何發生衝突？他們又如何因應、調適與父母之間的衝突？透過訪談 20 位第一代大學生，本研究發現第一代大學生與父母相處所發生的衝突可以歸結於兩種想像與現實間的落差：一是期待高學歷帶給自己的改變的想像，另一則是中產階級中心的理想親子關係想像。前者是對於高學歷所投射的話語權與階級向上流動的期待，後者則是指在充滿中產階級同儕的高教環境中形成的對於親密親子關係的憧憬。此外，親子之間的性別也與其間的階級落差相互交織，反映在教養權威在父母間的差異、家庭資源分配在子女間的差異，以及同志子女的出櫃策略上。因此，第一代大學生在家庭關係上面臨諸多挑戰，成為其向上流動過程中需要應對的心理阻力。

關鍵字：第一代大學生、向上流動、高等教育、文化資本、親子關係

# Abstract



In mass media, there are lots of success narratives about people who have lower-class origin entering into selective universities, and which advocate educational upward mobility. However, few reports talk about the follow-up stories of these people. Does educational upward mobility really bring about an overall change of the family, bringing them to the upper-class world? In this research, I investigate how elite liberal art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conflict with their parents after higher education, and how they deal with and adapt to the conflicts. Drawing on 20 interviews with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 find the conflicts can be attributed to two kinds of gap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s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one is how they perceive and expect the changes brought by higher education, the other is how they imagine an ideal middle-class-center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former is about an anticipation of class mobility and its discursive power projected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latter is a dream bor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with many middle-class peers. Moreover, gender is also intertwined with clas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which is manifested on the difference of parental authority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the disparity of family resources between sons and

daughters, and the coming-out strategies of LGBT children. Thu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are confronted with many challenges in their family, becoming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put on their route to upward mobi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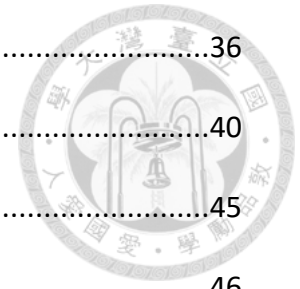


Keyword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upward mobility; higher education; cultural capit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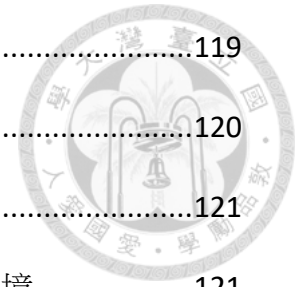


感言與謝辭 .....	i
摘要 .....	x
Abstract .....	xi
第一章 導論 .....	1
一、前言與研究問題：打破學歷神話 .....	1
二、文獻回顧 .....	3
(一) 當代青年第一代大學生的處境 .....	4
(二) 社會階級在家庭內的運作機制：教養的階級化 .....	7
(三) 重探代間情感糾結：社會階級取徑 .....	9
(四) 父權議價：第一代大學生親子間如何協商性／別？ .....	12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	16
(一) 抽樣方法 .....	19
1. 控制的變異：世代、學科與婚育狀態 .....	19
2. 極大化的變異：性別與性傾向 .....	20
(二) 研究方法反思 .....	21
1. 反身性議題：研究者作為第一代大學生 .....	21
2. 我來、我聽、我拿走的焦慮與言說的渴望 .....	24
3. 性別展演與訪談關係 .....	26
四、章節安排 .....	27
第二章 文化資本的內在弔詭：學歷差距如何阻隔親子溝通 .....	29
一、文化資本的二個面向：象徵與實質 .....	31
二、學歷作為地位象徵 .....	33
(一) 超乎父母期待而受父母肯認的子女 .....	33



(二) 父親的驕傲教養成就.....	36
(三) 母親的願望代理人.....	40
三、學歷實質內涵的曖昧.....	45
(一) 實用性的質疑：以市場價值定義學歷的父母.....	46
(二) 價值觀的對立：無法肯認子女關懷的父母.....	52
四、小結.....	60
第三章 像天堂的懸崖：經濟困難家庭子女的侷限心理.....	63
一、向上流動的心理困境.....	64
(一) 「做你所愛」的虛渺.....	65
(二) 經濟困難下的風險意識.....	68
二、拯救者的困境：階級翻身的期待與現實.....	79
(一) 對階級翻身能力的自我懷疑.....	80
(二) 質疑階級翻身的幻夢.....	83
三、小結.....	88
第四章 協商理想親子關係：子女親子互動中的距離策略.....	89
一、中產階級中心的理想親子關係想像.....	91
二、階級化的親子距離策略.....	95
(一) 積極納入：論述與資料的運用.....	95
(二) 消極排除：應付與資訊控制.....	102
(三) 同志子女的階級化出櫃策略.....	108
三、小結.....	116
第五章 結論.....	118
一、研究發現.....	118

(一) 高學歷的弔詭 .....	119
(二) 親子關係中性別與階級的相互交織.....	120
二、討論 .....	121
(一) 政策建議：檢視第一代大學生的學習與發展處境.....	121
(二) 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中相互同理如何可能？ .....	122
三、研究限制.....	124
(一) 壓縮的現代性難題：難以釐清代間差異或階級差異 .....	124
1. 國內「第一代大學生」相關量化研究不足 .....	125
2. 缺乏對照組：專業中產階級家庭.....	125
(二) 父母取樣不足：著重子女觀點.....	126
(三) 僅處理菁英文組大學畢業生 .....	126
參考文獻.....	128
附錄一、徵求受訪者表單 .....	135
附錄二、訪談告知.....	138
附錄三、訪談大綱.....	139





# 表目錄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概要.....17

表 2、個案選取架構.....21





獻給我的父母  
謝山山與張慧慈

## 第一章 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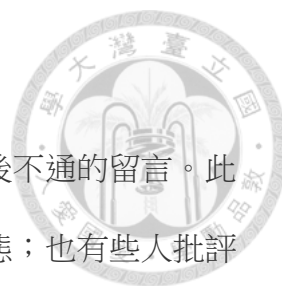


### 一、前言與研究問題：打破學歷神話

「拚命考上月薪7萬的夢幻公職，真能換來全家人幸福嗎？在菜市場長大的8年級女孩鯉魚（化名）從小就是家裡最會讀書的孩子，爸媽期待她考上調查局改善一家人生活，她也在大四開始過著同時打工、讀書、準備考試的日子，一天只睡3-4小時、天天挑戰半小時要寫滿幾面試卷——努力兩年她終於通過筆試，卻也發現自己因為忽視舊傷、右手長期操勞疼痛到無法使用，幾近報廢。」

風傳媒記者謝孟穎（2019）的報導以名校法律系畢業、父母在菜市場開小吃攤的「鯉魚」的故事，道出勞工階級子女「躍龍門」背後的辛酸。報導中提及，為了實現父母的期待，鯉魚拚命的準備國家考試，目標考上調查局或警官。由於對於父母而言，老化是沒有未來的事情，退休的焦慮轉嫁到了學業成就最高的女兒鯉魚身上。然而，在學校課業、補習班試卷及兼差打逐字稿的多重疲憊下，鯉魚車禍的舊傷復發，右手慢性肌腱炎導致整個月不能寫字。手不能用便不能考試，成了她重新反省自己拚命實現父母夢想的轉捩點。

鯉魚看清了自己一直在為父母而活。為了承擔父母無法想像自己退休生活的恐懼，甚至不敢投入自己夢想投入以改變社會的媒體業。當一切的重擔以身體症狀呈現出來時，鯉魚決定開始和父母溝通，「妳可以現在就可以拯救妳自己，不用等到發大財！」、「我要讓他們知道，他們還是有一些選擇權，我們家的資源或許沒那麼多，但並沒有少到完全不能讓自己放一陣子假」。鯉魚不再為父母而活，並停下腳步來釐清父母的焦慮後，她才終於敢鼓起勇氣往興趣發展，繼續媒



體業的實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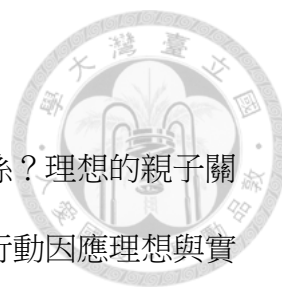
該篇網路報導底下的充滿著質疑故事真實性、指摘邏輯前後不通的留言。此外，有些人批評鯉魚的父母養兒防老、想靠女兒階級翻身的心態；也有些人批評鯉魚只是在牽拖父母找藉口，名校出身已經佔盡社會優勢。相較於個人歸責，在台灣「階級」往往不是人們理解社會現象、理解他者，甚至理解自身處境的框架。因此，勞工階級的經濟不穩定處境帶給勞工階級家庭的迴避風險、追求穩定的心態，以及獲得高學業成就的高學歷子女所面臨的家庭與自我的拔河，都鮮少為人所理解。

張盈堃（2005）藉由理論梳理，指出「文憑病」是存在於台灣社會中的一種集體追求更高學歷的心態。根據張盈堃的論點，文憑病是一種不分階級的傾向，但是在不同階級產生的作用並不一致。中產階級追求子女更高學歷指向的是為下一代延續、維持自身的階級；但勞工階級追求子女更高學歷，卻是一種「誤認」，因為即便透過教育可以縮小階級差距，勞工階級出身的高學歷者仍然是處於一種異化的文化位置，而非中產階級所處的高度的文化位置。

由於媒體報導和理論探討皆未能呈現究竟這些被當成階級翻身典範的所謂「第一代大學生」實際上的階級經驗究竟為何，本研究以此為背景，試圖實際探討與父母的學經歷大相逕庭的第一代大學生究竟如何在與父母的相處中，協商出其階級化的親子關係經驗？

在以上的討論基礎上，本研究探討第一代大學生的經驗如何重塑青年與父母之間的親子關係，我將提出三個主要的研究問題：

第一，在父母沒有大學學歷的家庭裡，子女取得大學學歷的經驗對於父母及子女而言的意義是什麼？又會如何影響親子之間動態關係？尤其是在原生家庭有經濟困難的狀態下，子女獲得的高學歷會如何乘載父母與子女自身的階級翻身期



待？

第二，在接受高等教育後，子女會如何想像理想的親子關係？理想的親子關係和實際的親子關係有什麼樣的落差？子女又會以怎樣的策略行動因應理想與實際的落差，和父母協商親子關係？

第三，在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經驗中，不同性別、性傾向的子女面臨的親子關係，及其協商代間階級距離的策略行動有何差異？親子彼此又如何藉由性別、性傾向來指認自己和對方的規範性行動腳本，並據以協調彼此的關係距離？

藉由以上的提問，本研究試圖藉由親子關係的經驗現象，呈現出「高學歷」在台灣的家庭內的互動中，如何成為親子之間相處矛盾的來源。同時，也指出第一代大學生在做子女的過程中，父母和自身的性別、性傾向如何與親子間的學歷差距交織，影響父母的教養實作與子女調整親子距離的策略。

## 二、文獻回顧

為了定位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座落在怎樣的研究脈絡中，文獻回顧將會分為三小節，分別說明本研究可以與哪些文獻對話，提出進一步的發現。首先，第一代大學生是在文獻中已經有人處理的議題，但主要是英美的研究為主，台灣的第一代大學生研究尚不充分。尤其台灣的第一代大學生研究多以學生個人為單位，探討其就學經驗為主，較未深入探討家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能夠予以補足。此外，不同世代的第一代大學生的經驗也會因產業結構和勞動市場中的流動性而有所歧異，而在本研究中將聚焦在當代青年第一代大學生的處境。其次，從家庭角度切入探討階級者則有不少處理教養與親職的階級化的研究，但由於聚焦在家長的行動上，且重點常著重在中產階級的教養優勢，勞工階級家庭常顯得「匱乏」



於教養子女。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低學歷家庭中的子女處境，以及其親子關係的複雜樣態。最後，除了階級外，本研究也強調親子關係並非性別中性的，而是有父、母，有子、女，階級和性別會交織作用在其親子關係中，因此從性別研究的角度中，也需要注意親子關係的協商本身也是一種父權議價的過程。

### (一) 當代青年第一代大學生的處境

在 1990 年代的教育改革之後，高等教育快速擴張，相較於過去的「大學窄門」時期，現在青年世代就讀大學時，大學已門戶大開：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2018 年 25-29 歲人口有大學以上學力者已達七成五（75.2%）；相較之下，父母輩的 50-54 歲人口僅有兩成（20.1%）有大學以上學力<sup>1</sup>。可以想見的是，在青年世代中會有許多的大學生會是所謂的「第一代大學生」（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也就是父母沒有大學學歷的大學生。

在輿論和媒體的主流觀點中，「突破逆境上大學」代表著鹹魚翻身、階級向上流動，許多教育相關的研究常將焦點放在怎樣的背景有利或不利於上大學（沈暉智、林明仁 2019；駱明慶 2002、2018；張宜君、林宗弘 2015；葉高華 2018）。弱勢背景會成為上大學的阻力，然而，如果成功上大學「之後」將會什麼面臨的課題？

國內已有少數研究注意到第一代大學生的存在並探討其特質（黃雅容 2008；呂宜臻 2009；莊淑惠 2011；劉若蘭、林大森 2012；羅秀東 2012）。這

---

<sup>1</sup>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86~107 年度），<http://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1B58E0B736635285&s=D04C74553DB60CAD>（讀取日期：2019/10/24）。



些研究運用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所蒐集的調查資料，比較了第一代大學生和非第一代大學生在入學選擇、校園經驗、學習成果及畢業流向等面向上的差異。值得注意的特質是，第一代大學生在選校系及生涯抱負上，有較為務實和低展望的傾向（黃雅容 2008），並且由於家庭給予的期望較低且資源較少，第一代大學生的生涯抉擇上，同儕的意見更為重要（劉若蘭、林大森 2012）。然而，在高教擴張的背景，大學之間歧異甚大，這些第一代大學生的研究當中並未進一步指出少數進入頂尖大學者的特性。鄭雁馨（Cheng 2013）的研究則有進一步指出青少年時期的經濟弱勢對於進入頂尖大學或就讀研究所的負面影響。她使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YP）的資料，發現青少年時期（國中）的經濟弱勢確實對未來就入頂尖大學或就讀研究所有負面的影響，而且正向的人格特質（如正向的自我定位、認真盡責、隨和等）對於經濟弱勢的負面影響的保護效果有限。但鄭雁馨的研究中則沒有對於家庭的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做進一步的探討。即便已經有些量化研究探討，但至今尚未見國內有質性研究深入描繪第一代大學生的處境及父母學歷背景的影響歷程。

相較之下，在 2000 年代以來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擴大高教參與政策背景下，許多以往沒有機會進大學的社經地位弱勢群體得以進大學就讀，因此「第一代大學生」的經驗吸引了學者關注，並且有許多質性研究深入分析第一代大學生的學校經驗 (Leathwood and O'Connell 2003; Lee and Kramer 2013; Lehmann 2009, 2014; Lucey et al. 2003; Mallman 2017; Reay et al. 2009; Stephens et al. 2012)。總結這些研究中指出的第一代大學生的學校經驗，大致上可以分成人際與經濟兩種導致心理壓力的來源。人際的壓力是出於一種「身處異鄉」(feeling out of place)(Granfield 1991: 335)或是「離水之魚」(fish out of water)(Reay et al. 2009: 1106)的不適應感，並且往往會歸因到自己身上，而變得對自己沒有自信，想偽裝自己。經濟的



壓力則是因為財務拮据，需要打工或是需要尋求穩定豐厚的薪水，一方面可能因此而犧牲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則是感受到強烈的風險與不安感。

在黃雅容（2008）的研究中，雖然也發現了第一代大學生在財務資本上的限制，呼應了這些西方社會（尤其是英國）的研究發現；然而，同儕的社會資本比父母提供的社會資本更重要的發現，卻和西方社會的研究中指出的「第一代大學生感到無法適應大學環境的隔閡感」有所差距。在選校或選系這樣的生涯抉擇上，台灣的第一代大學生比其他學生更看重朋友或同學的建議（相對於父母）。黃雅容推測，其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第一代大學生的父母能提供的社會資本較少，包括父母對子女的規範和期望較少（家庭內），以及父母透過在社區或職場與其他人的社會關係所獲得的大學相關知識和資源較少（家庭外），所以第一代大學生轉而倚賴同儕彌補社會資本之不足」（黃雅容 2008）。換言之，台灣的第一代大學生的處境或許反而是和父母隔閡、和同儕親近。

此外，當代青年第一代大學生面臨的處境還包括在產業結構轉型下，過去或許能夠藉由高學歷向上流動的「中產階級」工作正在逐漸消失。《被壓榨的一代》一書中採訪了許多從事傳統認為「舒適的中產階級」工作的從業者，例如教授、律師、會計師、工程師、醫療人員，結果發現了「高學歷份子向下流動」的窘境正在發生，現在或許很多人都比自己父母的學歷還要高，但卻不一定可以做比自己父母更賺錢的工作（Quart 2019）。

《被壓榨的一代》雖然反映的是美國社會的狀況，但其實台灣社會也在發生中產階級消失的現象。張宜君（2016）利用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庫，發現台灣的勞動市場的高薪與低薪工作機會正在兩極化，尤其低薪工作增加的幅度較高，中階工作則在消失中。而且，張宜君（2017）也發現如果區分不同時期進入勞動市場的世代，隨著世代的推展，高學歷能夠換來的勞動市場報酬越來越貶值，僅有少



數高階人才能夠獲益。這些研究都反映出了在台灣社會，高學歷其實越來越不能保證穩定的工作，而且主要是因為以往的中階工作在消失中。




在既有的第一代大學生研究的基礎上，我認為在台灣進行第一代大學生研究，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家庭（主要是父母）扮演的角色為何。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在台灣，家庭傳遞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模式值得深入探討。究竟第一代大學生的原生家庭和他們的關係為何？量化研究中所發現的父母在第一代大學生子女的生涯抉擇上重要性較低，實質上的內涵為何？當代青年世代的第一代大學生在產業結構和勞動市場轉型下的經驗又有何特殊性？在這些問題的基礎上，下一小節我將進一步回顧關於家庭內如何傳遞階級資源的既有文獻。

## （二）社會階級在家庭內的運作機制：教養的階級化

Kohn (1963) 的研究發現社會階級與親子關係之間存在著值得檢視的關聯。在該研究中，他指出父母教養子女的教養價值，受到父母所處的職業價值形塑。中產階級的父母由於工作的價值強調自主導向，他們的教養也就強調培養子女的自主能力；勞工階級的父母則由於工作上強調服從於外在權威的價值，他們的教養則偏向於要子女學習服從父母等權威。

不同於 Kohn 的研究取向直接將職業價值與教養價值連結，Lareau 受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理論啟發，將父母的持有的文化資本當作解釋父母階級化教養模式的關鍵，同時也把解釋的對象從教養價值延伸到教養實作。在《不平等的童年》中，Lareau (2011) 用組織日常生活的方式、語言的使用和對教育機構的介入，界定出中產階級家長和勞工階級家長兩種不同風格的教養，分別稱為「規劃栽培」和「成就自然成長」。中產階級家長的教養方式傾向於細心規劃孩子的日



常生活中的學習和休閒活動、與孩子用講道理的方式溝通，並且積極的參與學校的活動；勞工階級家長的教養方式則是傾向於讓孩子自己玩、自己發展童年，親子之間的溝通方式偏向於上對下的權威式管教，家長也比較少、消極參與學校的活動。Lareau 認為，不平等的童年是社會階級透過家庭教養再生產的機制，中產階級的家長因此培養出子女的「權利感」，讓子女在教育體制中爭取更多的機會和資源進入菁英階級；勞工階級的家長則會培養出子女的「侷限感」，讓子女習於服從權威，錯失機會階級向上流動。

台灣的研究和以上的美國研究有相似但不盡相同的發現，張建成、陳珊華（2006）以「生涯管教」和「行為管教」兩個範疇來區分家長的教養模式，前者指家長對於子女的學習進度、未來生涯發展的介入與規劃，後者則指家長對於日常生活中的禮儀與規矩的管教。他們透過參與觀察及訪談發現，中產階級的家長勤於生涯管教，但行為管教較為柔性；勞工階級的家長疏於生涯管教，而行為管教則較為剛性。不過，在家長與學校的關係上，他們則發現學校教育方針和家長的管教傾向有連續性。中產階級家庭居多的文教區的小學為學生規劃更多元的課程，在行為管教上也比較重視溝通與個人發展；勞工階級家庭居多的加工區的小學教育方式則較為制式化，強調背誦，並且重視集體服從一致的規矩。

吳明燁（2016）以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簡稱 TYP）的資料分析台灣專業白領階級、基層白領階級與勞工階級家庭的家長教養理念與教養行為，得到的結論與上述發現類似。惟值得注意的是，吳明燁（2016: 86）指出「階層之間的差異主要在『養』（照顧、支持）而不是『教』（管教、控制）」，不同階級的家長都最常採取約束限制的管教行為，只是白領階級家庭的家長更會採取費心安排的教養行為。

藍佩嘉（2019）則認為台灣的親職理念與實作反映出的是在社會變遷中家長




如何因應風險，因此她將擁有不等量的資本及追求不同教養益品 (goods) 的家長的教養行為看作是他們的保安策略。並且，教養行為並不只是反映社會階級位置，還是個別家長藉由反思自身經驗及子女處境，關注不同風險後所採取的行動。因此，無論是家長的受教養、受教育經驗，抑或是他們看待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處境，都是左右家長教養行為的關鍵因素。

階級化教養的文獻告訴了我們教養展現出不同社會階級傳遞資本給下一代、保障下一代安康的差異策略性行動，而勞工階級家庭常常是以「缺乏」的形式呈現。Lucey et al. (2003: 289) 曾指出「匱乏模型」(deficit model) 時常在學術研究上變成一種對勞工階級家庭的典型想像，亦即總是把勞工階級家庭想像成不足的、缺乏能力的、無能的。即便是出於一種同情、照顧的態度，仍然潛藏著對勞工階級家庭的否定，「他們」是待救援的，甚至是認為他們陷在某種「虛假意識」當中，因此無法突破不利的處境。而在本研究中，我試圖進一步指出的是，匱乏模型的難題並不只是學術研究上的想像，也是勞工階級家庭出身者對自己的侷限想像。即便第一代大學生透過教育向上流動，其低教育程度的家庭出身依然讓他們想像自己的家庭給予自己的是缺乏的、不足的。

### (三) 重探代間情感糾結：社會階級取徑

家庭社會學的領域中，通常以「代間關係」(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的概念來分析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互動。在台灣的代間關係研究中，不乏以代間連帶理論的取徑，探討親子之間在情感關係、勞務關係及財務關係等面向上的交換與連結 (林如萍 2011；林如萍 2012；伊慶春 2014；林如萍、黃秋華 2017；黃秋華、林如萍 2018)。然而，台灣社會處於東亞文化的一員，孝道規範對代間關係



存在著異於西方明顯的影響力 (Lin and Yi 2013)，影響親子間的權力與資源交換。因此，除了資源以外，規範（孝道）的作用也是台灣的代間關係研究的一大重心（葉光輝 2009），尤其是透過父系規範的作用，讓成年的兒子傾向於經濟上反哺父母，成年的女兒傾向於和父母維繫情感連結（伊慶春 2014）。同時，孝道規範的作用也讓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權力往往會延伸到子女長大成人、但經濟上尚未自立的階段，而非如西方典型的子女成年便獨立的核心家庭模式。

因此，在第一代大學生子女與父母的關係中，一方面子女取得在學歷社會中更有正當性的文化資本（相較於勞工階級的），從而使得子女在家庭中得以擁有更高的象徵權力；然而，另一方面文化面向孝道規範賦予父母的教養權力，使得父母又可能擁有超越子女的權威。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教育向上流動產生非預期的親子關係緊張。

Luescher and Pillemer (1998) 提出「代間情感糾結」(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sup>2</sup> 來指涉這樣的親子關係緊張。他們以母女關係為例：已婚並生育的女兒在尋求母親的幫忙時，從代間連帶的觀點是展現出緊密關係；但母親介入女兒的育兒行為，會侵犯到女兒的自主性，反而會產生衝突和怨懟。亦即是在親子之間並存衝突的角色規範，衍生出同時正向與負向的情感。

然而，台灣的既有研究援用代間情感糾結概念的研究多囿限於婚姻家庭的架構（吳嘉瑜 2004；吳嘉瑜、趙淑珠 2004；利翠珊 2007），著重在成年已婚子女和父母之間的代間情感糾結。少數例外如吳明燁（2016）以代間情感糾結的改念分析了青少年子女與父母的關係，發現了父親的約束限制管教方式會形成教養權威，讓父親與子女之間建立一種「遠而親」的關係；母親的約束限制管教方式則

---

<sup>2</sup> 國內研究多譯為「代間矛盾」，但為了凸顯出其「情感」上的正向與負向情緒並存但「糾結」的狀態，故在此翻譯為代間情感糾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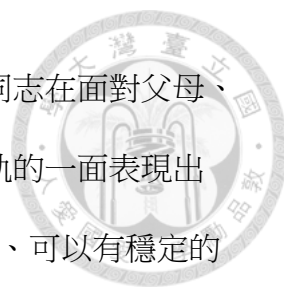


會引起較多的衝突及情感糾結。然而，這些研究未能探討成年未婚子女在未自立階段中，與父母之間更複雜的親子關係。並且，仍預設了親子間共享同質的文化，僅是因處在不同的生命階段，發展目標與義務不同而產生矛盾，忽略了親子間可能原來就各自抱有相異的價值觀。

例如，在移民社群的研究中，常發現親子間的文化失諧 (cultural dissonance) 現象。這發生在移民父母和在移民地出生的子女之間，由於子女直接浸淫在移民地的文化中成長，對於移民地文化的吸收往往比父母來得徹底。Qin (2006) 研究美國移民華人親子關係的民族誌，發現華人父母延續一套嚴厲的管教觀念，和子女在美國與同儕習得的一套個人主義價值觀相當衝突，形成平行的雙重參考框架。結果是親子之間的依附與溝通趨弱，彼此關係逐漸疏遠。

當親子價值觀的不一致牽涉到主體認同與現身的層面時，代間情感糾結的「愛恨交織」內涵可能會更形劇烈，以致於牽涉到複雜的親子關係協商。胡郁盈 (2017) 以台灣女同志現身 (或出櫃) 的親子協商作為經驗案例，回應家庭社會學中關心的華人父權家庭主義和女兒角色的討論，並質疑將「同志現身」和「家庭關係」對立的預設。運用女同志社群民族誌與深度訪談的方法，胡郁盈刻劃出更為複雜的動態協商：單身不婚的現代女性形象成為女同志對抗結婚壓力的策略；未婚女兒的角色在少子化的背景下，可以承擔老後父母照護責任變成修復親子關係的契機。在胡郁盈的描寫中，女同志與父母的關係不只是衝突，而是親子間的情感和規範性義務如何調解，共同重新打造家庭關係。

Amy Brainer (2019) 在台灣進行的同志子女民族誌中則發現，雖然傳統上認為因為傳宗接代責任落在兒子身上，讓男同志面對較大的「家庭壓力」；但實際上卻是女兒和媳婦這些女性，在物質層面和勞務層面上支撐起照護父母等家庭關係的運作，承擔實質上的家庭壓力。此外，為了讓父母接納自己的同志身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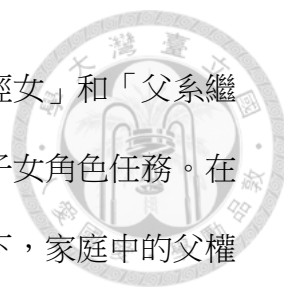


櫃的同志子女會展演「策略性的正常」(strategic normativity)，同志在面對父母、面對不了解同志的公眾時，常常需要、或是被期待要把符合常軌的一面表現出來：例如，同志可以是快樂的、可以事業有成（或甚至要發達）、可以有穩定的單一伴侶、可以建立家庭、可以養育子女等等。然後將會讓人覺得同志可能不快樂、可能不那麼成功、可能越軌的一面先壓著不談。雖然並非欺騙，但是是策略性的透露片面的真實，以贏取父母、公眾對同志身分的認同。這一點當然在同志運動策略上很有爭議性；但是在家庭關係中，需要慢慢讓父母熟悉、適應、學習，不能一步登天，卻可能是容易不被注意的面向。

然而，無論是代間關係取徑或是親子關係取徑的研究，都很少處理到「階級」在親子關係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親子間的階級差異引起的代間情感糾結，如何引起複雜的親子關係協商？僅有少數著重家庭關係和解、自我覺察與療癒的面向的個案研究。例如陳筱婷、洪瑞斌、莊騏嘉（2014）的自我生命故事敘說，處理了階級的落差如何造成親子間的關係斷裂。作者陳筱婷和父親之間的關係斷裂，放置在母親強調不斷唸書、提升階級地位，並將出身農家的勞工階級父親視為貶抑的他者的脈絡中。最後透過和父親彼此指認關係斷裂的根源，陳筱婷也暫緩攻讀博士班、繼續往上爬的計畫，放過自己，達成父女關係與自我的和解。

#### （四）父權議價：第一代大學生親子間如何協商性／別？

在描繪親子關係的經驗時，不能忽略的是親子並不是性別中性的詞彙，而應該要同時把性別的觀點帶入。Deniz Kandiyoti (1988) 提出「父權議價」(patriarchal bargain) 的概念，描述在男性支配的社會中，女人如何調適、對抗、協商出她們的生存策略。同時，她也指出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父權議價會展現



出不同的形式。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下，男性支配圍繞著「重男輕女」和「父系繼承」，交織在孝道的親子互動規範之中，並衍生出傳宗接代的子女角色任務。在本小節中，我將運用父權議價的概念框架，首先探討台灣脈絡下，家庭中的父權如何與孝道共構，再由此出發思考向上流動中的子女能夠如何與父權討價還價。

台灣的重男輕女現象顯著的展現在家庭內的資源分配上，尤其是教育栽培上普遍傾向投資兒子多於女兒。但既有研究已發現其中仍有一些細微的內部差異，例如：越年輕世代的父母越不會重男輕女（吳慧瑛 2007；魯慧中 2017）、高教育程度的父親有較強的性別偏好，高教育程度的母親則比較沒有性別偏好（魯慧中 2017），以及出生排序的影響——長子獲得明顯優勢，長女則無（Yu and Su 2006），且出生排序越後面的小孩之間越沒有性別偏好的差異（魯慧中 2017）。這些研究皆使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然而其中受訪者的最年輕世代僅到 1970 年代出生者。在 1985 年後，高等教育快速擴展下，有更多女性取得教育優勢，甚至可能勝過男性（蔡淑鈴 2004: 72），因此還無法輕易推論現在的青年子女經歷家庭內重男輕女資源配置的實態如何。

父系繼承展現在偏好生育兒子、由兒子傳承姓氏，以及由兒子繼承財產的傾向。謝志龍（2013）運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探討生育偏好與手足結構的關聯，驗證了第一、第二胎都是女兒的情況下，父母較容易選擇繼續生育，並且他的研究發現沒有社會階層與世代的差異。從父姓則一直是主流選擇，即便台灣在 2007 已修正民法容許父母自由合意決定從母姓，每年仍然只有不到 2% 的新生子女從母姓（彭滄雯、洪綾君 2011）。繼承權涉及財產的分配，家庭內的鬥爭則更形激烈。陳昭如（2009）分析了大量的繼承爭議判決書，發現在父系傳承的文化框架下，存在各種讓女兒無法繼承的手段：包括讓女兒的名字消失在繼承人名單上、迫使或偽造女兒拋棄繼承權，或是以女兒出嫁了、有獲得嫁妝為由，要求



不許繼承家產。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力爭自己繼承權的女兒，但必須背負著「不孝」的指控，才能去對抗父系繼承，爭取自己的權利。

在孝道的文化規範中，不僅有由重男輕女與父系繼承共組而成的男性支配秩序，還有結婚、傳宗接代的子女任務。因此，孝道不只是性別化 (gendered) 的，也是性化 (sexualized) 的，它規定了異性戀是正當的性實踐，而非異性戀的子女是犯忌的。正因為孝道在家庭中的運作，如何對家庭現身的困境是台灣的同志研究中相當受關注的課題 (畢恆達 2003)。此外，不同於父系繼承已經歷一連串的法律改革而性別中立化，在本研究資料蒐集進行期間，同性結婚與成家仍然是在制度上被拒絕或否認 (畢恆達、潘柏翰、洪文龍 2014: 399-403)，從而同志遭遇的是文化與制度雙重的困境。

然而，關於女同志現身困境的研究卻又突顯出性別與性傾向交織出的差異協商策略。Gayle Rubin (1975) 指出性／性別體系 (sex/gender system) 的基礎，是由把女人當作禮物交換的聯姻體系建立起的親屬網絡。女同志處在既是女人，又是不被「送」出去的女人的位置上，如何突破父系親屬倫理、重構並延續新的關係與家庭的意涵，成為了女同志研究的關心，而非對抗式的「出櫃／現身」(沈佩君 2012；李慈穎 2007；胡郁盈 2017；趙彥寧 2008)。

總結台灣家庭中的父權結構，重男輕女造成資源容易傳子多於傳女，父系傳承又強調連結兒子、切割女兒與原生家庭的連帶，容易形成兒子掌握資源、預期成為家庭支柱，而女兒欠缺甚至被剝奪資源的情形。傳宗接代的子女角色任務則鞏固了異性戀子女和原生家庭的關係，非異性戀子女則處於現身困境，需要過著雙重生活或是努力重構新的家庭意義。由此可見，性別與性傾向間可以交織出差異複雜的腳本，使得異性戀子女與非異性戀子女各自要和不同樣態的父權討價還





價。需要注意的是，在孝道的邏輯下，父母的「給」和子女的「報」相生，得到優勢的同時也意味著承擔義務。

在親子關係中，除了子女的差異外，也需要注意父親所扮演的父職、母親所扮演的母職也不是一致的親職實作，因為家庭內的互動也是夫妻做性別的場域。例如家務分工的研究中指出，夫妻會藉由家務工作分配來做性別，尤其是在妻子的收入遠高於丈夫的時候，妻子可能會做更多家務工作以中和性別秩序 (Bittman et al. 2003)。因此，父母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教養子女、與子女互動，也可能會展現出父母如何做性別。

在本研究中，必須要注意的是，性別／性傾向的作用與學歷／階級之間是交織的。舉例而言，在第一代大學生的個案中，由於父母的教育程度較低，父權的效應又會更顯著。既有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提昇與社經地位提昇，對於男女皆有傾向於非傳統的性別角色態度的效果 (呂玉瑕 2011)；換言之，低教育程度的勞工階級父母父母的性別角色態度可能趨於保守。因此，第一代大學生子女所面臨的在性／別上的親子關係協商可能會更加嚴峻。

此外，出身勞工階級的女性感受到的侷限與無能感可能比起男性來得更加劇烈：一方面是「上嫁」的論述形塑了勞工階級女性似乎只能利用美貌與性換取成功，而否定了努力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則是在勞工階級成功翻身的敘事中，向來不存在女英雄，女人想要成功的欲望被當作只是一種嫉妒 (Lawler 1999: 11-13)。Lawler (1999) 針對 7 位勞工階級出身、自認現為中產階級的英國白人女性深度訪談，指出女性流動者感受到更多的是「冒牌」焦慮：一方面怕自己被 (病理化的) 勞工階級的出身拉回去，另一方面也怕自己被拆穿是假冒的布爾喬亞。Lawler (1999: 5) 認為階級關係不只是經濟關係，也是「優越／次等、正常／異常、評價／羞辱的關係」(relations of superiority/inferiority, normality/abnormality,



judgement/shame)。Lawler 的發現呼應了 Skeggs (1997) 在 *Formations of Class & Gender* 中，指出勞工階級往往受到病理化 (pathologized)、勞工階級女性永遠無法「做對」(get it right)。

因此，從既有研究可以得知，階級的作用影響了對於性別／性傾向的價值取向。同樣是勞工階級家庭出身的女兒，和兒子所經歷的階級／性別經驗也是截然不同的。在本研究中，將會進一步考察在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中，階級、性別與性傾向如何交織作用，影響其社會互動的行事邏輯。

###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進行，研究對象為父母皆為低學歷的高學歷子女，訪談的內容主要包括子女與父母的親子互動經驗、關於子女的求學、就業及戀愛婚姻等生涯決策上，親子之間的價值觀與期待的異同，以及實際上彼此採取了什麼樣的策略互動／不互動。

我所定義低學歷父母為最高學歷為高中職以下，高學歷子女為最高學歷為大專以上。因為在台灣的升學主義文化下，中等教育學校傾向以考試升學為優先要務；但高等教育則重視培養批判性思考、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取得大專以上學歷的文化資本，蘊含其養成的慣習可能迥異於高中職以下的學校所養成的。

然而，在台灣，大學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尤其是公立與私立大學、普通大學與科技大學之間的隔閡，使得大學之間相當的異質。為了避免大學間差異造成是否學歷作為主要變項的效果曖昧模糊，我將子女個案限制為頂尖大學畢業者。本研究中的頂尖大學，以教育部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所定義的 12 所頂尖



大學為操作性定義<sup>3</sup>，一方面這表示了這些大學有受到制度性的肯定其社會評價，另一方面得到教育部的資源挹注，也可能使得其學生在就學期間得到更多的資源。

本研究並不以一般化推論為目標，而是透過呈現出低學歷父母與高學歷子女豐富的親子協商經驗，作為一種階級差距親子關係的特殊個案，分析其在個案生命歷程中，如何產生形塑其認同、理念與行為傾向的意義結構。因此，我以滾雪球的方式，尋找合適的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包括張貼徵求受訪者表單在 Facebook、PTT 和樂家庭版 FamilyCircle 及 Plurk，並從朋友尋求介紹合適受訪者。訪談進行時間為 2017-2018 年間，最終完成訪談個案數為 20 人，受訪者基本資料概要如以下表 1。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概要

化名	性別	性傾向	年齡	職業	父職業	母職業
黛比	女	異性戀	31	翻譯業 PM	退休（偶爾開計程車）	電子工廠作業員
海倫	女	雙性戀	28	自由業	清潔人員兼職倒垃圾	清潔人員
小瑩	女	泛性戀	25	學生	中藥商	中藥商
小威	男	同性戀	25	學生兼任媒體編輯	司機	餐飲業員工

<sup>3</sup> 包含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中興大學、長庚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湯姆	男	雙性戀 (偏同性戀)	25	學生	N/A	保險業務
阿源	男	無性戀 (偏同性戀)	32	郵局約聘 人員	工廠管理職	無
小芬	女	異性戀	26	人資	務農	務農
小宇	女	同性戀	22	研究助理	紙工廠老闆(已 歇業)	家庭主婦
西恩	男	同性戀	28	媒體業	製造業工人	車衣服工人
小波	男	同性戀	25	學生	N/A	專櫃人員
蒂蒂	女	同性戀	25	學生	無正當職業/賭 博	夜市賣娃娃
伊可	女	異性戀	23	待業	香菇農	家庭主婦兼幫 家裡工作
愛咪	女	異性戀	34	採購/業 務	退伍軍人	總務
阿尼	男	異性戀	25	待業	金紙店	金紙店
阿翔	男	異性戀	26	待兵役	五金行	退休
喜德	男	異性戀	26	研究助理	失業	會計
雷恩	男	異性戀	27	學生	司機	兼職幫傭



安尼	男跨女	同性戀 (喜歡 女性)	23	學生	N/A	保險業
瑞雯	女	雙性戀	26	研究助理	N/A	菜市場擺攤
克洛	男	無性戀 (偏異 性戀)	23	遊戲設計 師兼職作 家	計程車司機	清潔隊隊員

為了保護受訪者身分，受訪者的名字及最終畢業學校皆經匿名處理，且在本論文中會在保護受訪者身分的必要範圍內，編輯受訪者說話內容（如：將「台北」改成「北部」）。在呈現訪談內容時，為了閱讀流暢，我會編修冗詞贅字，但在分析上有必要時會盡可能還原原來的說話內容。

### (一) 抽樣方法

因為訪談個案數較少，屬於小樣本研究，為了避免個案間變異程度太大，以致於影響解釋力，我依據最能夠彰顯親子間認知差異、關係衝突及協商的標準進行理論抽樣。在已控制一些變異的個案之間，再以極大化變異抽樣法（吳嘉苓 2015: 40）的方式，尋找可以突顯不同樣態的親子關係協商的個案。以下，首先我將說明本研究中將會控制的變異；其次再說明我會極大化抽樣的變異。並分別解釋我控制與極大化的考量為何。

#### 1. 控制的變異：世代、學科與婚育狀態



我會控制的變異包含四個面向：世代、學科與婚育狀態。簡而言之，我會選擇的個案是初顯成年期（約 22-35 歲）、大學就讀科系收入偏向較低、不穩定，且尚未婚育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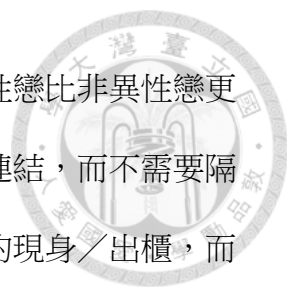
首先，世代的部份我藉由初顯成年期的理論觀點，在後工業社會中，剛進入成年期的人在完全自立之前有一段「準備」成人的階段。這些青年因為尚未在經濟上與情感上脫離於原生家庭，因此界在依賴與自立的矛盾位置上。在本研究的定義中，初顯成年期的子女大約是 22-35 歲之間。

其次，如果子女的學歷給予很大的求職優勢，父母仍然可以產生「可以找到高薪、穩定工作」的信念，因而減緩給子女的壓力，以及產生關係衝突的契機。因此，本研究排除工程、醫藥衛生、自然科學學門畢業的受訪者，僅以人文及社會科學類學門畢業者為研究對象。

最後一點是，由於進入婚姻、生育子女，在文化上和經濟生活上往往意味著較高的獨立性。尤其是在象徵的層面上，就是成立一個新的「家」。親子關係將由一個家庭內的動態，變成兩個家庭間的動態，在分析上會增加複雜度。因此我最終決定排除已婚、已生育的個案，僅以未婚育者為研究對象。

## 2. 極大化的變異：性別與性傾向

我在性別及性傾向的面向上，尋找各種不同類型的子女及其父母訪談。在我聚焦在這兩個向度的變異中，可以突顯出家庭內的「資源配置」與「關係連結」的面向。首先，性別的向度上，男性容易比女性更容易獲得資源的集中，尤其在資源較匱乏的勞工階級家庭可能更是如此。擁有資源的同時，意味著更有協商的



籌碼，或是更有回報父母的責任。其次，在性傾向的向度，異性戀比非異性戀更容易符合結婚、傳宗接代的期望，容易和原生家庭的親屬關係連結，而不需要隔離出雙重的生活。然而，既有研究指出女同志較不採取對抗性的現身／出櫃，而是重構家庭關係的意義（胡郁盈 2017），因此可以進一步檢討性別與性傾向交織之下，關係連結的差異。

藉由兩個軸線，大致區分出四個類型。性別的軸線依男性／女性的軸線，性向則是主流性向／邊緣性向。基於以上的基礎，我繪製出如表 2 的個案選取架構圖，尋找四種極端類型的子女，並且盡可能均勻的訪談四個類別。

表 2、個案選取架構

	主流性向	邊緣性向
男性	直男	男同志
女性	直女	女同志

## （二）研究方法反思

在訪談進行的過程中，身為研究者，往往在自己的位置、受訪者的位置，彼此之間的關係之間，感受到焦慮、迷茫或罪惡感。我相信這是質性研究者的必經之路。在本節中，我將分享本研究中的三則研究反思筆記，提供給未來的研究者（尤其是以家庭關係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者）作為借鏡。我的研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希望我的研究反思也能夠達拋磚引玉之效。

### 1. 反身性議題：研究者作為第一代大學生



本研究其實並不是完全以第三人稱視角，因為我本人也與研究對象一樣，屬於第一代大學生。所以，這本論文寫的不是「他們」的故事，而是「我們」的故事。

我開始進行這個碩士論文研究的起點是來自於我自己和我父母之間的關係。隨著我進到大學，我感受到讀書的結果是離父母越來越遠。中學時的讀書和大學後的讀書，在質的意義上就完全不同。中學時讀的科目是父母的共同經驗。那些詩詞和算數，中國朝代更迭，彼此都還能閒聊幾句。中學時的讀書走在一條直線的階級流動軌道上，分數考得越高，父母就越安心未來能有份安定的工作。大學之後，我越來越說不上來我在讀什麼東西。以往空空的、只會放學校課本的書架，慢慢擺上一本本厚厚的書、爸媽可能一輩子都不可能翻開來讀個五頁的書。尤其當我離開了那個（他們以為）他們可以理解在幹嘛的法律系，來唸我爸總以為是社會科、我媽總以為是社工的社會學。「會讀書的孩子是好孩子，身為父母就應該要好好栽培他」、「讀書就有前途，可以不用做我們這種辛苦的工作」，當這樣的信念，遇上了不知道研究所是什麼鬼東西、碩士博士到底要唸多久、畢業之後可以做什麼工作時，糾結矛盾產生了。

人會老、會病、也會死。時間總是和我們對抗著。當我從大學畢業，進到研究所，我的父母的年齡也已經逼近六十大關。長年從事體力活的他們，陸續出現一些身體疾病，也會抱怨工作太累，想要早點退休了。這些抱怨就轉化成我身上的壓力，明示暗示地催促著我趕快去找份穩定的工作來養家。於是，只要回家就要面對無奈，面對所謂「現實的」、「經濟的」考量。我變得越來越不愛回家，以逃避遇到父母就要處理的這些難題。有了宿舍後，越來越喜歡窩在研究室裡，直到夜半三更，或是清晨旭日東昇，我才騎著腳踏車回宿舍，小心翼翼地沐浴就寢，深怕吵醒室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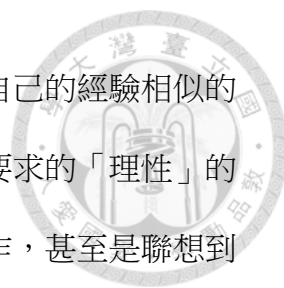




當我開始把我自己身上的議題當成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時，每每當我省思我的問題意識，我就越察覺自己身處在中上階級的學術世界裡，其實諸多侷限阻礙自己往前行的階級情感，並不是自卑，而是恨。我會恨如果自己不是生在這樣的家庭裡，或許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究的世界裡，不用覺得從事學術活動是一場高風險的賭注而戰戰兢兢。我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去哪裡，憑我能走去哪裡。其實和這一個研究主題相視而坐時我的心從來就靜不下來，許多的情緒，焦慮、緊張、煩悶、恐懼、怨懟、悲傷反覆地襲來。但我也無法放任自己恨自己的家庭，因為我也深知父母對我、對這個家庭投注的愛與勞力沒有少任何一分，甚至讓我時常覺得自己能生長在這樣和樂的家庭裡多麼幸運。

矛盾的情緒讓我在訪談的過程中，試圖理解其他的第一代大學生是不是面對和我相似的困境，以及想要知道他們有沒有採取什麼好的策略來緩和自己和父母之間的關係。隨著我聽越來越多人的故事，我開始意識到，其實第一代大學生們的父母並非是本來就那麼不可理喻，反而父母因為一方面不熟悉子女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敬重子女的生活，給了子女許多空間。但子女們常常是預設父母不可能了解自己，而預先地把父母排除在自己的世界之外。這種預設也是一種傲慢，子女們往往沒有試著去想像父母其實還是可能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去類比、推測子女的處境，而給予支持，反而其實是輕視了父母的生命經驗。即便不是如子女所期待、所預想的那種模式的「理解」，但身在不同處境的「同理」仍然是可能的。訪談讓我看到的更寬廣的世界開啟了我願意試著向父母部分揭露自己生活的契機，也讓我試著用貼近父母一點的方式去溝通我對於升學、職涯方面的觀點和顧慮。

然而，把自己的個人議題當成研究對象的一大問題是，到底是在煩惱自己的生活，還是在煩惱如何釐清研究議題，時常在內在是混淆的。個人煩惱和研究煩



惱相互交纏，相互加強。在分析訪談資料時，我很容易讀到與自己的經驗相似的段落時，一時無法分析下去。情緒會浮上來阻隔我以某種學術要求的「理性」的方式去分析、去組織、去論述這些經驗背後的社會結構如何運作，甚至是聯想到自己的生命經驗而浮現對家庭的負面情緒，以致於論文的寫作停滯，難以前行。同時，我也很容易站在一個過於同理受訪者的立場，因此每當和老師討論到要試著指出受訪者侷限住自己的「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e) 的時候，對我而言總是很難跨出那一步。因為指認出受訪者因為某種文化框架而將自己想像成很無助、很悲慘，於是侷限了自己的可能性的時候，好像就在譴責自己，我所經歷的苦難其實是庸人自擾。也許當初以為把個人議題當成研究對象可以用學術的取徑幫助自己處理艱難課題，但結果是把一個煩惱變成兩個煩惱，一個頭兩個大。

時至今日，我仍然不敢說我有辦法做到所謂的「二度斷裂」。即便可以看到自己在研究中的位置，但其實連與受訪者的經驗之間好好的「一度斷裂」都很難說有辦到。然而，在研究過程中相互映照的是，當我一指認出受訪者們遭遇的困境時，我也看到我在論文寫作中的困境好似也就是受訪者們的困境，而感受到自己的困擾有得到安放的空間。

我想，選擇自己身處的議題當作研究對象是高風險的決定，我不會建議未來寫碩士論文的同學做出這樣的決定。但是這個漫長而不順暢的旅程中，仍然不能說無所斬獲。有意採取相同模式撰寫碩士論文的同學值得審慎評估。

## 2. 我來、我聽、我拿走的焦慮與言說的渴望

剛開始要做訪談的時候，我有一種不安感、虧欠感、焦慮。好像我來、我聽、我拿走，別人憑什麼要講他的生命故事給我聽呢？而且還是很私密的家庭生



活的事。只是為了我要完成我自己的碩士論文？所以我以為不會有什麼人來填我的表單、接受我的訪談。

但我錯了。來填表單的人多到我訪也訪不完。當然，一部分是因為我的研究對象其實人數眾多，不是說極為罕見。我想一杯飲料的代價並不足以吸引這麼多人來填表單。況且多數填表單的人，真的是我完全不認識、看都沒看過的名字。

我開始理解到，其實人們有言說的渴望。有一位受訪者，我和她的訪談時間非常長，大概兩個半小時。她與母親的關係其實相當異常。她也坦言自己長期接受諮商，我的理解是她深陷在母親的議題裡。在她的敘述中，母親基本上就是個控制狂。最經典的故事就是她說她要去桃園找姊姊，一路上媽媽一直用 LINE 問說到哪了？上火車了嗎？到桃園了嗎？見到姊姊了嗎？以及她家裡非常嚴格、她也從不違反的門禁。即便她都已經 27 歲了。

訪談結束後，她說，很高興我願意聽她抱怨那麼久。然後她幫我付了咖啡錢，而且堅持我不要給她錢。即便她的收入說不定比我目前的收入還低。

身為一個家庭研究者，我發現我會被受訪者放在一個聆聽者的位置上。我的任務是設計好我的訪談大綱，並且準備好毫不保留、毫不評論的聽受訪者把關於家人的大大小小的事講給我聽。當然他們多少也有情緒，有反思。

另一受訪者告訴我，她談過很多次自己的同志身分和出櫃經驗。但是這是第一次從家庭背景（社會階級）的角度來看這個經驗。她覺得這是很棒的事。因為她認為現在很多的同志論述，都是不談階級的。從她舉的經驗，我看到階級研究者所批評過的「把 Middle-Classness 當成 Classlessness」(Reay 1998) 的常見弊病。

訪談的過程，就是一個敘事的過程。但是，人們想說，卻不常有人想聽。你有多少機會跟你的朋友細談你跟家人間的種種大大小小的互動呢？很多時候，再



熟的朋友，你都可能對他的家庭幾乎一無所知。因為我們並不習慣在日常相處中去談。

敘事的過程，也是一個產生認同的過程。因為人們在講的過程中，其實他們也在想，這個經驗帶給他們什麼，為什麼會發生，後來他跟家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怎樣，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又會那樣。

在這個過程中，我理解到訪談關係為何可以是一個互惠關係，也體認到了一些我身為訪談者的責任。在訪談過程中讓我安下心的，是我在李慈穎的碩士論文中看到：「我認為另一個使訪談順利的因素，是她們界定，這只是一個『一面之緣』的談話，我之後不會再出現在她們的日常生活中，她們也沒有想要跟我再建立進一步的關係，我們不在彼此的生活範圍之內，這使得她們對我，可以侃侃而談，包括她們對同志社群生活、家庭事務的看法，情感歷程，彼此交往、營造家庭的過程，一些感受較為深入的東西。一般來說，對於初識的朋友是不太可能提到這些私人事件的，但一個抽離生活的訪談情境，反使得她們比較沒有保留的提供我這方面的故事」（李慈穎 2007: 26-27）。訪談者與受訪者，有時正是因為萍水相逢的關係，才讓訪談的情境成立，才讓言說遭遇到得以安放的空間。

### 3. 性別展演與訪談關係

在日常生活中，我習慣淡化同志身分。以前的我是因為沒有出櫃的刻意掩飾，但現在的我更像是覺得平常不需要去動用那些「很 gay」的言行舉止比較自在。

關於性別特質，與其說是光譜，我更覺得是馬賽克。許多性別議題活動在看待翻轉性別時，常見的呈現方式都是男女裝扮交換。但是，「男性的」



(masculine) 和「女性的」(feminine) 這兩個範疇內部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子面向和項目。把「女性的」貼到「男人」(male) 的身上，本身還是沒有顛覆這兩個範疇——更口語一點，套餐——內部元素之間的組合、連結。

我認為屬於「我」這個人的性別特質，從男女二元的角度來看，應該也是馬賽克拼貼式的。而不是幾%男、幾%女。而且我的組合應該是多面的、可動的，在不同場合可以呈現出不同的樣子。即便不全然式照著我的意願呈現。用這樣的觀點看到性別特質，我練習不要自己應要怎麼樣。而是什麼時候適合怎麼樣。這就是屬於我自己的性別規則 (gender rule)。

在訪談時，我發現做家庭研究，我動用男同志的 schema 可以讓我取得更多的優勢。或許是因為（異性戀）男性具有一種非情緒的、侵略的意象，如果用一個很異男的狀態訪談，反而會讓人不自在。而我的訪談內容都會涉及交往和結婚成家的議題。在其中，我發現我很習慣自然的出櫃。即便對方不是同志。我發現那時，訪談氣氛是變柔和的，距離是變近的。尤其是訪談異女時，我的性別帶有的侵略性整個消失了，而變得自在。

#### 四、章節安排

本論文一共分為五章，本章為導論，引介本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問題、定位文獻地圖中的位置，並說明研究方法。接下來我將進一步說明其餘四章的安排方式。

第二章「文化資本的內在弔詭：學歷差距如何阻隔親子溝通」以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理論為背景，解釋第一代大學生與父母對於學歷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的差異想像與關注，導致父母所肯認的與子女想要得到肯認的不盡相同，而產生親子

溝通上的隔閡。同時，由於子女的高學歷所隱含的象徵地位會對父母的教養權威造成威脅，也埋下了親子關係衝突的種子。

第三章「像天堂的懸崖：經濟困難家庭子女的侷限心理」試圖回答在經濟困難的家庭中，高學歷如何作為他們期許的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而這個機會又帶給第一代大學生在與父母相處時怎樣的壓力與焦慮，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未能成真時又要如何面對期待落差。

第四章「協商理想親子關係：子女親子互動中的距離策略」指出經歷教育向上流動的第一代大學生獲得階級化的理想親子關係想像，而該想像與實際的親子關係有落差時，他們如何以調整與父母的關係距離的策略行動，來彌合理想與實際的落差造成的親子關係挑戰。

第五章則是結論，總結全論文中的主要論點，整理本論文主要的研究發現及貢獻，提出本研究對於未來政策的可能啟發及對第一代大學生子女的建議，以及說明研究限制，供未來欲從事相關研究者作為借鏡。

## 第二章 文化資本的內在弔詭：學歷差距如何阻隔親子溝通



蒂蒂的母親只有國小的學歷，蒂蒂媽為此感到很自卑。在蒂蒂小時候，她甚至要在學校要求填寫家長資料時刻意掩飾：在蒂蒂國小時填自己的學歷是國中、國中時則填高中，總之要比蒂蒂學歷來得高一點。蒂蒂的母親一直以來催促蒂蒂要好好唸書，蒂蒂認為是因為母親希望蒂蒂代自己彌補當年沒能好好讀書的遺憾：

（在媽媽年輕時）女孩子就是沒有錢給你讀書。所以你要去打一些工這樣子，讓弟弟讀書，或是哥哥。所以我媽就會一直覺得她沒有唸書。有時候我是覺得她想要彌補她沒有讀書這一塊，所以才一直想要我唸書。

然而，當蒂蒂和母親在日常生活中發生衝突時，學歷的落差常常浮現成一種母親羞憤的來源。當母親生氣到一個點上時，不見得和吵架的內容有關係，她會脫口而出說：「你不要以為你讀的書比你媽還要多，就可以爬到你媽頭上。我還是你媽媽。」

因此，蒂蒂認為，在蒂蒂媽的心中存在著一種矛盾：

她一方面又想要我唸書，為了「我」好，也是為了她好。她女兒唸得越高的學位，她越有臉面，來彌補她國小沒畢業的這件事情。但，我身為她的女兒，我卻不孝，我忤逆她。

從受訪者蒂蒂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子女獲得勝過父母的學歷時，可能會動搖父母的教養角色，發生父母威嚴減損的危機。子女在學歷上的優越喚起了父母的「隱性階級傷痕」(Sennett and Cobb 1972)，威脅了父母的教養權力。不僅是蒂蒂，許多受訪者的父母都曾以類似的方式教訓子女：「我給你讀那麼多書



不是為了讓你來反駁我」。這些父母的矛盾心理在於，他們一方面肯定了子女的高學歷代表的成就，另一方面卻又擔心這反映出了自己受教育過程中的不成功。

然而，父母並非是全然的肯定子女的高學歷的價值。例如，受訪者小瑩的父親是一個經營中藥行的老闆。雖然小瑩爸的學歷不高，在小瑩眼裡，經商表現也不怎麼樣，卻自我感覺異常的良好，經常貶抑女兒的表現。小瑩表示，父親經常會表現出一種輕視讀書人的態度：

我覺得我爸大概覺得，功課很好、讀到研究所很好，但你要把這些東西變成錢、變成薪水才有意義。然後另外一點就是，我爸覺得，其實你讀書讀得很好還是怎麼樣，你知道的永遠不夠多，因為你就是個讀書人，沒有出社會。即使他知道我有在參與社會運動、有在看一些媒體，還是怎麼樣，我會講一些他不知道的、他沒有聽過的事情。可是我爸都會把它解讀為不懂、不懂、你還是不懂。即使我跟他挑明的講說，「可是爸，你都只看新聞、只看自由時報。可是，我之前有告訴你有哪一些臉書（粉絲專頁）你可以看」，就是我有嘗試讓我爸媽看報導者之類的，我就說，「我有告訴你可以看那些啊，可是你又沒有看」。我爸就會說，「那些都沒有用，你就是都不懂」。就是他就會一直用，「我都不懂」這件事情來想要讓我閉嘴這樣。

這樣的心態主要發生在能夠維持家庭小康以上經濟狀況的父親身上。這些父親以「學歷不一定能夠轉換成市場價值」貶抑子女，以免自己的地位被超越。相對於父親，許多母親的心境比較類似蒂蒂媽，因為年輕時受重男輕女家庭犧牲，失去升學機會，反而期待子女能夠代理母親自身，實現未能實現的讀書夢。

從蒂蒂及小瑩的故事中，呈現出的低學歷父母對於子女的高學歷的矛盾心態，我認為其實反映了學歷作為文化資本的內在弔詭。Bourdieu (1986) 以文憑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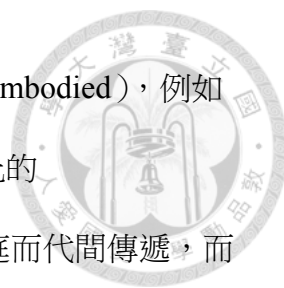
文化資本展現的典型形式，但同時他也揭示了資本的內涵為「勞動的積累」，並且是一種可轉換成其他資本形式的利益。文化資本之所以可以以 Bourdieu 指出的三種形式存在，是因為文化資本同時有象徵與實質的兩個面向。象徵的面向是以文憑等受承認的制度化、客體化的形式存在，實質的面向則是其內化成人的涵養的形式。Bourdieu 發現了文化資本的不同存在形式，但這些形式之間其實不必然 是對等的關係。在本章中，我所要探討的文化資本的內在弔詭，正是發生在其象 徵與實質面向之間的對立。

據此，本章首先簡要回顧文化資本理論，申論文化資本所涵括的「象徵」與 「實質」兩個面向。我認為，低學歷父母們對於高學歷子女的矛盾心態，立基在 「學歷」作為文化資本內在的象徵與實質兩個不同面向的衝突認知——父母們通 常肯認學歷的象徵意義，但是對於學歷蘊含的實質內涵抱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 度。因此，第二節與第三節將分述低學歷父母們對於子女高學歷的象徵面及實質 面的認知。最後總結此衝突的認知如何構成親子間溝通的障礙。

### 一、文化資本的二個面向：象徵與實質

在〈資本的形式〉( *The Forms of Capital* ) 一文中，Bourdieu 闡述了他獨特的 資本概念。Bourdieu (1986) 挑戰經濟學將所有的利益化約為商業交換的經濟資 本，忽略其他形式的資本的觀點。從而延續 Marx 將資本看作勞動的積累的論 點，提出了「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本研究將學歷置放於文化資本的脈絡 下探討，因此在此暫且先略過不談社會資本的概念。

文化資本是從不同社會階級的孩童的學業成就差異中發現的資本。Bourdieu (1986) 認為，經濟學者忽略了教育體系中，文化資本的傳遞造成的階級再生產。



Bourdieu (1986) 指出，文化資本以三種狀態存在：身體化的 (embodied)，例如教養或品味；客體化的 (objectified)，例如書或畫作；及制度化的 (institutionalized)，例如學歷。文化資本的特點在於其透過家庭而代間傳遞，而且耗費時間、以身體化為基礎而不易轉移。

Bourdieu (1986) 區分出三種資本形式的關鍵，在於提示資本間轉換是有時間差及需要耗費勞力的。因此，不能直接化約成經濟資本。但他也反對忽視其他資本可以在社會空間中轉化為經濟資本的事實。

然而，我認為在 Bourdieu 的資本理論中，將文化資本的三種狀態平行放置，忽略了文化資本的象徵性質和實質性質在資本轉換率上的差異。以本研究討論的核心「學歷」為例，雖然 Bourdieu (1986) 將學歷視為制度化文化資本的一個典型，但學歷除了制度化的面向外，同時也包含著身體化的面向。例如，受高等教育之後習得的價值觀、品味、文化知能、技能等等，即是「學歷」的身體化的面向。

我認為，學歷的象徵面向（無論是其制度化的或客體化的狀態），在轉換成市場價值（經濟資本）上是比起實質面向（身體化的狀態）來得更有效率。因為以文憑、證照等形式存在的學歷，比起需要在實作中才能展現出來的知識或技術，在勞動市場上更容易成為估價的對象，尤其在當今勞動市場高度競爭的環境下，文憑更容易得到重視。因此，低學歷的父母在重視經濟資本的前提下，傾向肯認學歷的象徵面向，但對學歷的實質面向抱有質疑或不信任。相對的，高學歷的子女的認知中，實質面向轉換成經濟資本的轉換率不見得是核心議題，可能其實質面向本身，抑或是轉換成象徵資本的轉換率，是高學歷子女往往更重視的。在本研究中，我認為對於學歷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的重視角度不同，是高學歷子女與低學歷父母之間產生衝突的主因。



## 二、學歷作為地位象徵

學歷對人們而言象徵著自己潛在的能力，以及應有的社會地位。然而，對於低學歷的父母而言，子女的高學歷對自己的意義是糾結的。一方面，與家庭外的人相處時，子女如同自己的延伸，可以彰顯自己的家庭教育有成，而感到光榮。但另一方面，在家庭內的互動中，父母的角色是矛盾的。父母肯定和接受子女的學業成就，卻也同時要防衛子女對自己的家長權威造成的威脅。

在本節，首先會將聚光燈打在子女身上，藉由高學歷子女如何藉由高學歷獲取父母的肯認，甚至是特權，提示學歷帶來的象徵地位效應的主要模式。接下來的兩個小節則會分述父親與母親展現出的相異的肯定高學歷的態度：父親傾向於把子女的學業成就視作自己的教養成就，成為向親友炫耀的勳章；母親則因為常常在年輕時因重男輕女的家庭內資源分配遭到犧牲，失去升學機會，傾向將子女看成自己未能實現的讀書夢的代理實現者。

### (一) 超乎父母期待而受父母肯認的子女

在父母學歷不高的家庭裡，父母對子女的教養策略常常不會有很高的期待。例如，關於升大學時如何選校的問題，許多受訪者都告訴我，父母只期待他們可以唸國立大學，因為學費比較便宜。因此，能夠唸到頂尖大學，對於低學歷父母來說，往往是已經「超乎期待」的表現。借用受訪者愛咪的說法，「反正我的人生對我來說就是我只要證明我做的可以比她（母親）想像中的還要好，她就沒有話講」。因此，超乎期待的部分，常常是子女可以握有自由選擇的特權空間。



例如，黛比的父母都是從事典型藍領階級工作，收入不高，也不算穩定。即便如此，他們向來對小孩的期待也不高，僅僅是設定一個平安健康的低標：

他們有的時候實在是很傳統。他們對小孩子的期待就是…只要你過得好，你知道你想要做什麼，不要說不工作，然後，比方說老年照顧，比方說生病，之外他們覺得都好。所以，然後我又是比較知道我自己喜歡什麼我就做什麼的人，所以他們不會太擔心我，不會過分干涉。……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就是，我爸媽他們就是希望小孩子有工作、有婚配、有對象、有生小孩。他們對小孩的期望就是這樣。然後健健康康這樣子。

階級流動的想像固然是一種父母會有的期待，但只是一種奢望，而非要求。假如這個小孩會唸書，父母會全力支持；但假如這個小孩不會唸書，父母也不會強求，把自己都沒做到的事情壓在小孩的身上。

小芬的父母就是察覺了小芬和姊姊、弟弟小時候就展現出學習天分，才會想要栽培小芬三姊弟讀書，而不是要求他們繼承家裡不太賺錢的農業：

也是因為這樣（會讀書）他們才會特別栽培吧。就會希望說，你，好像有點聰明。然後，他就再栽培你，想要給你好一點的分數啊，這樣子。

相較於會唸書的子女潛藏的想像中的未來階級向上流動可能性，父母對自己的階級固著想像，則傾向將自己想像得較為失能，需要把自己的未來交付給可能成為中上階級的子女。因此，不少家境比較不好的子女，都面臨著未來出社會後要反過來養育父母的重責大任。當我問及蒂蒂，你是否也像我的其他受訪者一般，被母親期待以後要養她時，蒂蒂告訴我：

她不會用「養」這個字。（宇修：那不然她會怎麼說？）會說「靠你



了」。

「靠你了」的說法展現出父母在期待子女扶養時的地位，比起由上而下的要求孝順，更像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能力不足對於有能力者的依靠。子女透過學歷超越父母獲得肯認，獲得不是從屬、而是主宰的特權地位，但也同時承擔起了要扮演父母的拯救者的角色。

小波的母親是單親媽媽，生父在小波年幼時就已經斷絕聯絡。因此，小波的成長歷程主要是由母親的媽媽（阿嬤）及姊妹們（阿姨們）加上母親的母系女性家族養大。在小波的家族裡，普遍的學歷較低，除了長輩，連平輩也都學歷不高。僅有同母異父的弟弟算是比較會唸書，不過年齡差距頗大，在小波受訪時仍在就讀高中。因此，就讀頂尖大學的小波在家族裡格外有個「會讀書」的身分。

然而，小波的高學歷並不是為了回應母親或家族的期待，相反地，小波只得到家人最低限度的期待。小波回憶，當家人看到自己的學業表現好的時候，家族自然感到開心；但同時也有一種不捨小波遠離家庭的矛盾心情，甚至會覺得寧可小波不要去唸那麼好的學校：

我們家族有一個矛盾的情緒是說，他們期待看到我唸上去，但他們又不想我離開家裡面這麼久。像我阿嬤就會一直說，「啊你怎麼不去那個E大就好了？」她就說，「啊你就開車去上學啊。就住在南部啊」。他們希望我留在南部，他們希望我趕快回來南部。但他們同時，也期待看著我越唸越高。這是一個矛盾的地方。

小波也向我坦承，到遠離家人的地方求學或生活，也讓他感到在家裡的那個責任被擱置，心裡過意不去。小波娓娓道來他心中難以放下的「牽掛」：

一方面跟家裡有點抽離，但一方面我跟家裡面卻又很緊密的地方。這個矛盾的感覺我也很難說是為什麼。因為，我跟家裡面距離這麼



遠，不管是心理上的距離，還是社會上的距離這麼遠，但我卻單方面、但是，（嘆），我這樣形容好了，就像是我對她們的牽掛很深，但他們感覺不到我的牽掛；她們對我的牽掛也很深，但是他們不會太常讓我感覺到她們的牽掛。就是我們彼此都很牽掛，但這個不是在同一個頻率上面的牽掛。所以他不會因此形成我們很緊密的關係。我們還是很疏離。我跟他們很疏離，但我跟他們的關係卻又很好，這個東西是並行在我的家庭關係裡面的。

能力越大，責任也越大。這句電影《蜘蛛人》中的著名台詞彷彿也適用在這些子女的身上。學歷超越父母的子女因為超乎期待而獲得肯認，象徵地位帶給他們自由空間，同時也背負起這些家人無意間施予的責任。

## （二）父親的驕傲教養成就

在子女的敘事當中，父親經常是扮演對親戚、朋友炫耀子女成就的角色。雖然實際上，教養子女的繁複實作常常是落在母親頭上的責任，但是當子女有所成就，反而會是增添「在外打拚」的父親的臉面。

出身鄉下農家的伊可畢業於頂尖大學的法律系。伊可是最早接受我的訪談的陌生受訪者，訪談當時我顯得技巧生澀拙劣。我起初便表明我也一樣是畢業於法律系，讓伊可察覺到我們共同感受過法律系的光環。伊可告訴我，在鄉下地方有小孩讀頂尖大學讓父親感到光榮：

因為他覺得，我們（伊可和妹妹）很會唸書，讓他覺得他的教育很成功。而且，在一個比較傳統的鄉下，小孩可以唸F大是一件他覺得很光榮的事。而且大家都會跟他說，哇，你們家小孩好會唸書。他的朋



友圈裡面，他們都覺得（會唸書很厲害）。其實我覺得現在普遍整個社會都是這樣啦，就是聽到家裡面如果有小孩很會唸書（很厲害），其實我不覺得這有比較厲害，但是，整個社會價值觀就是這樣。所以，他就會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而且他們覺得，只要會唸書，以後就比較有出息。

但女兒的學業表現其實衝擊了伊可父親的家庭性別秩序觀。學業表現出色的伊可和妹妹兩姊妹時常不滿於父親的「家庭老二哲學」。伊可語帶諷刺的說，父親常教導兩個女兒，身為女人就是要依附在老公的事業上，可以襄助但不應該居功，家裡只需要男人作主就好了。就像母親和阿嬤，他們生命的意志就應該依附在丈夫的身上。

有一次，伊可的妹妹嚥不下氣，當場反詰了一句，「所以你覺得我的人生意志也應該依附在我老公身上嗎？」父親馬上轉過頭來說，「噢，這不一定！」就如同前述引文中伊可所說的，因為父親相信，只要會唸書，以後就比較有出息。因此，人生意志不一定要依附在丈夫身上，甚至可以比丈夫更優秀。母親和阿嬤應該服膺的家庭性別秩序，伊可和妹妹可以赦免。

與為女兒很會唸書而感到驕傲的伊可爸相似，在本章引言中提過的家裡開中藥行的小瑩爸每到回鄉時，也樂於炫耀自己的小孩讀到研究所。就讀國立大學文史類碩士班的小瑩，從大學時期就受到社會運動的啟迪，熱衷於投入了解社會議題，以及親身參與社會運動。由於和父親的關係交惡，不想要在經濟上依賴於家庭的小瑩兼差擔任中研院的研究助理，以維持自己在外租屋的生計。當我們聊到父親和小瑩的關係，小瑩提起了父親的炫耀行為。她露出無奈尷尬的表情說，雖然有點困擾，但她多少還是能夠想像父親為什麼有這樣的心態：

我爸爸那邊的親戚有滿多是現在都還在南部，可能是種田。當然他們



的小孩可能來台北發展，可是目前我知道的是，有讀到研究所的其實非常非常少，就是更遠一點的親戚有讀到研究所的其實也不多。然後我覺得在這樣子的家庭氛圍之下，我爸就是家裡有一個很會讀書的小孩，要去炫耀，我就覺得其實滿可以想像的。或者是，還有另外一點是，因為很久沒見，也不知道要講什麼，這就是過年會比較小孩。我覺得這種也有可能。

然而，不同的是，小瑩爸的家庭性別秩序觀並沒有赦免小瑩。反而，小瑩甚至一直覺得自己身為一個「不能被控制的女人」是父親的內在焦慮，而成為父女間的衝突來源。小瑩指出，雖然同樣附屬於家業，妻子與子女都被預設要為家裡經營的中藥行無私的奉獻，父親對兒子（弟弟）和女兒（小瑩自己和妹妹）的想像就存在著落差：

我爸就覺得說，你雖然在讀大學，可是你就是要為家庭付出啊，這很難嗎？在你結婚之前你都是家裡人。所以你就要做這些事情。可是，相較之下弟弟出去試很多事情就是合理的。

在家裡三個兄弟姊妹中，小瑩自認和父親的關係最差、衝突最多。在三姊弟中，就屬小瑩學歷最高；但偏偏小瑩的高學歷及知識，卻如同本章引言所述，對父親而言就只是「你沒出過社會，你什麼都不懂」，而讓小瑩聽了十分不服氣。小瑩提起，曾經和某個學長分享她自己和父親的衝突之後，學長評論說：「你爸應該覺得你是一個書讀太多的婊子吧？」。小瑩當下雖然感到這樣說很失禮，卻又立刻察覺這句話點出了他們父女關係的核心議題。她認為，父親對於無法控制的女性感到特別憤怒，包括經商能力勝過自己的妻子，以及教育程度勝過自己的女兒。

不同於幾乎事事與父親衝突的小瑩，海倫的生涯發展總是照著自己的步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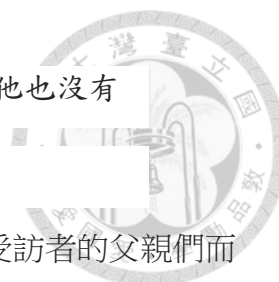


走。上大學選科系、猶豫是否轉系、畢業後到澳洲打工度假等，當問及父母當時的態度，海倫皆表示父母沒有什麼意見，或是沒有徵詢過父母的想法。此外，海倫自己身為雙性戀者，長期擔任倡議同志權益的 NGO 的志工講師，實踐她的性別平等理念，父母也未過問。雖然她都會告知父母自己有在外面演講，在 Facebook 上也向來大刺刺地公開，但她不曾和父母分享細節。海倫分享了一次被父母問及的經驗：

他問我說你在講什麼？一開始我就會說，呃，多元性別啊。他就說，什麼是多元性別啊？我就說，嗯，就是，他也沒多問啦。那時候就是，不明不白的。反正我就是一個在臉書上很公開自己的人。所以後來他們就加我臉書。哦，好啊，那麼就自己發現我在幹嘛。所以後來有點，心照不宣。

直到某一次，父親默默的舉動讓海倫深切的感受到，雖然沒有明言，但是父親將自己能夠當一個教育他人的講師視為自己的驕傲：

演講完有一個講師狀，然後上面就「感謝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的誰誰誰」，然後，感謝狀。我們家有一個獎盃區，在客廳，電視櫃上。例如說我哥那時候打撞球第三名有一個冠軍盃，或是我姊姊市長獎之類的，就是有一個獎狀區。然後我爸那時候就把我演講的那個東西，掛在那個地方。對我來說我覺得是一個認同，就是他知道我在幹嘛，或是這件事情是不讓他丟臉的，他滿自豪的事情。所以我後來他們問我就說，噢，我今天要去演講啊。然後他們也不會說什麼。他會覺得，好像演講是一個好事情，即便他不知道我在講什麼。（宇修：感覺像老師）對對對，因為我還有去跟教授還是牙醫師演講。他會覺得，欸，我女兒好像是一個講師，可以到處跟人家



去演講這樣子。所以他也就沒有多說什麼，或是他想聽，他也沒有表達這個意思。

從伊可爸、小瑩爸，以及海倫爸的表現可以看出，對這些受訪者的父親們而言，子女的文化資本是他們感到驕傲自豪的教養成就。然而，這樣的驕傲更像是一種別在胸口上的勳章，或是如同海倫家中的「獎盃區」直白地展現出來的：子女的成就就是身為父親的教養成就。相對之下，文化資本的內涵並不是重點，他們並不認為有必要去理解，甚至於是承認，子女在學習的內容、在演講的內容。

### (三) 母親的願望代理人

相較於父親，在我的受訪者的敘事中，母親很少會扮演對外炫耀子女的角色。許多母親反而會將自己未能實現的讀書夢託付給子女，讓子女成為自己的「願望代理人」(Rondini 2016)。在母親們年輕的時代，因為家庭資源有限，女兒們往往會被家庭犧牲。她們不得不放棄學業先去工作，把資源留給兄弟升學，許多母親都因此而未能完成學業。

小瑩媽正是個在重男輕女的時代下，因家裡背債而不得不放棄升學，其實曾經成績非常優秀的女人。最後的高職夜間部學歷，是白天在工廠打工之下才得以完成：

甚至，我媽的國中老師發現我媽在愛之味工廠打工，然後晚上去唸夜間部的時候，她國中老師還哭。因為她國中老師覺得，你功課這麼好，你怎麼還是放棄？我媽是一個功課很好很好的人。

不同於總是否定、貶抑小瑩的父親，母親在小瑩口中的形象，是一個很願意花時間在小孩身上，甚至會關心小孩在學業外的私生活的人。例如，小瑩弟在情



竇初開之時，小瑩媽便很關心小瑩弟的感情發展。小瑩妹交女朋友的時候，小瑩媽也很關照小瑩妹的女朋友。從而，小瑩打從心底相信，母親是一個即便小孩有不同於父母的想法，也很願意好好談的人。

然而，小瑩媽實際上比起小瑩爸會讀書這一點，原先就是夫妻間潛在的張力來源。在小瑩的觀察裡，經營生意上，其實也是母親的表現勝過父親：

我印象很深刻是，好像有一年我媽帶我表姊還有我去信義誠品。(那是)信義誠品剛開的時候。我(那時)就說，「哇，信義誠品是不是很大？」我媽就說，「那不然我們就搭捷運去」。然後就去了信義誠品，進去不到半小時，就有一個很大的客戶打電話給我媽說，「(你)不在喔？啊你什麼時候會回來？」我媽就掛電話，然後跟我們講說，「媽媽現在要回去賺錢」。然後我們就說，「好，那我們回去。因為賺錢很重要」。然後我們就走。就是那個客人完全不想跟我爸講話，因為他覺得，我爸不重視客戶。他覺得我爸…比如說有時候我爸會把一些藥價講得比較貴。這是一個生意的手段，可是我爸手段非常非常差、非常糟。然後我媽就會說，「他是大客戶，你應該分辨什麼話可以講、什麼話不能講。什麼錢可以賺、什麼錢不能賺」。可是我爸完全不會分辨。我爸就會亂來。

小瑩回想起年幼時曾經因為當班長遇到挫折，回家想要向父親尋求慰藉而被罵，心裡產生一個疑問：「爸爸真的那麼厲害嗎？」於是向母親詢問。小瑩媽當時沒有明白的說，但輕微的暗示了一句「你覺得你爸爸有這麼厲害嗎？」這句話啟發了小瑩的反省：

我就覺得，我爸好像沒有那麼厲害。我覺得我比我爸厲害很多啊。  
或者是，我也沒有很差啊，你為什麼要這樣罵我？所以我有時候就



會在想，我對我爸會不會有一種壓迫是，這個女兒即使講話沒有很尖銳，可是，反正再怎麼樣都不是一個溫柔的，對他來說，可能都不是一個溫柔，或順從的人。

小瑩的言下之意是，正因為小瑩不是一個溫柔、順從的女兒，甚至表現得有點突出，反而成為了父親在父權意識下想要壓抑的對象。同樣的，身為女人的妻子，也受到父親有意無意的壓抑。

在自己的求學路上不順遂，結婚後受到丈夫壓抑也未能在事業上得到應有的肯定下，小瑩認為，母親因此會想要更多時間在小孩的教育上彌補自己的人生缺憾。不過，願望的代理也不一定只是單純的強求子女代為實現自己未完成的夢。在小瑩媽的實踐上，她反而是透過反思，重新檢視對子女而言，最適合的求學路應該是什麼模樣：

我媽的學歷就是高職夜間部。然後我覺得，那個在求學路上的遺憾，會讓我媽想要花比較多的時間，來去了解說到底小孩想要什麼。她會盡量想要在教育這一塊彌補起來。還有另外一點我覺得滿有趣的是，我媽也不會一直覺得我們要去念高中跟大學。比如說，除了我啦，比如說她會很直接跟我弟跟我妹講說，如果你們不想唸高中，想要去唸高職，我覺得可以。可是當然對我的話就會覺得說，你功課那麼好，你去念高中好不好。可是我覺得相對於其他人的父母，她應該是相對開明的。而且反而像是我弟那時候要唸高中，是我弟堅持的。因為我弟覺得，我同學都去念高中了，很酷。我媽就很頭痛說，你的成績有很好嗎？你去唸高職啦！你要認清你自己啦！

本章引言中的蒂蒂媽，在蒂蒂的眼裡也是個把自己當成願望代理人的母親。



不過，蒂蒂媽並不像是曾經有優秀學業表現卻因貧窮而犧牲學業的小瑩媽，不曾有過升學機會、只唸到國小肄業的蒂蒂媽心中更多的是自卑感。因此，蒂蒂媽沒有辦法像是小瑩媽那樣，透過教養輔導子女的升學，來補足自己失去機會的學習經驗。對蒂蒂媽而言，升學是一件更令她陌生而敬畏的事情。

這樣的情緒往往在母女爭執時，透過「女兒的忤逆」般的意象映射出來：

因為她想要讀書的這件事情，被拒絕了。現實不允許。但，我的現實，是可以繼續的。但是當她又意會到，我身為她的女兒，卻爬到她的頭上。說真的，可能家父長的那種，「你憑什麼忤逆你媽」。當她在心浮氣躁，在暴怒的時候，我卻很冷靜的對待她，那當下就是，好像我在看一個小丑。所以她當下是覺得很丟臉的也說不定。或許她當下覺得，我咽不下這口氣。我越冷靜，越顯得她很可笑。說不定她這樣想，或是沒有。當下我是這樣想的啦。所以她才想要我跟她一起那麼可笑。說不定啦。然後又加上我忤逆她，我頂嘴。小的時候會覺得，你憑什麼這樣子。可是，長到更長一點，比較成熟之後會覺得……她生不逢時啊。在同一個年代裡也是有人繼續讀書的啊。然後，因為我外婆家是很重男輕女的啊。也有人過得很好啊。但我媽就是過得不好啊。所以我媽過得不好，就這也不是她的錯啊。

藉由蒂蒂的描述生動地再現了學歷差距在母女衝突時戲劇化的表現，表現在母親的情緒化和女兒的冷靜的對峙之中。當蒂蒂越是表現得冷靜，彷彿就越是居高臨下，把母親的情緒化對照成一齣不成熟的鬧劇。然而，在此同時，蒂蒂也覺察到母親的處境同時也是生不逢時的一齣悲劇。

蒂蒂在大學時並非就讀頂尖大學，但即便如此，從國中開始學歷就已超越母



親，逐漸將母親心中的自卑感向下深植。在大學畢業要考研究所時，本來想要去頂尖大學 B 大，因為大多數親近的同學都想要去 B 大。或是甚至根本就不想再繼續升學。但當時腦海裡浮現了母親，終究為了母親而選擇了聲譽更響亮的頂尖大學 F 大：

過去爭吵的那些，她都會講說她花很多時間啊什麼幹嘛的，奉獻在這個家裡面要養我們幹嘛的。但就是，你這是不會有成果的付出啊。就這成果不屬於你啊。就是…我也不想要唸 F 大啊。我當初是想要唸 B 大啊。或是其實我根本也可以不用唸書啊。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啊。但是…我媽就是在那。所以她就是影響著我。我知道我自己對讀書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啊。但，不是不能讀。所以我還是可以啦。但沒有到強迫。但我媽就是，那個臉會一直浮現上來。我就會覺得，我要、我要、我讀。好，我讀。

不過，蒂蒂媽也並沒有任由自己和蒂蒂的學歷落差擴大，也曾經為了跟上蒂蒂求學的腳步而試著學英文：

她其實曾經有很想要就是，跟上我求學的腳步。所以她之前才會想要去學英文。我猜的啦。因為，我記得她之前想學英文嘛。然後加上，國小不會的課、作業如果有不會的，我媽都還有辦法教我。但當國中的時候就有點難度了。高中更不用講。然後大學全然是她…就大學是更不可能啊。我記得到國中的時候她曾經跟我說，「媽媽沒有辦法再教你啦。要不要去補習？」

然而，蒂蒂媽之所以沒有辦法再靠自己努力跟上一點蒂蒂的腳步，其原因也很大一部分出自於蒂蒂爸的父權壓抑。關於這點，我將會在下一章中詳細說明。

從小瑩媽和蒂蒂媽的故事中，可以看到父母世代年輕時重男輕女的文化信念



剝奪了許多中下階級女性的升學機會，因此這些母親更希望在新的世代裡，子女能夠代替自己實現未能完成的讀書夢。不過，就如同父親一樣，願望代理人所蘊含的對子女的肯定意涵，有時也會反向折射出母親自己低學歷的自卑情結，因此產生出親子之間的衝突。

### 三、學歷實質內涵的曖昧

在前一節的分析中，學歷主要是以受肯認的形式存在。衝突的發生源則主要是來自於子女的高學歷的正面象徵的對照投射下，父母對於自己低學歷的自卑或遺憾情緒。教養高學業成就子女讓低學歷父母陷入的矛盾，來自於相衝突的社會角色：一方面，他們肯定、讚揚子女的學歷所象徵的社會地位，甚至與有榮焉；另一方面，又要維持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指導、管教角色的權威性，因為越是肯定子女的地位，越可能反過來暴露出自己的低學歷所帶來的地位羞恥感。

然而，學歷作為一種文化資本，其同時也有象徵以外的實質內涵的面向。亦即在取得高學歷的受教育過程中，個人會經歷一段智識上、技能上的學習、成長的歷程。完成該歷程後取得的表徵物是文憑，但文憑受到肯認並不必然是出自於肯認該歷程中習得的知識和技能，而是文憑本身就具備獨立於該知識和技能之外的獨立功能——市場上的交易對價。

文憑在市場上的交易對價來自於高學歷本身象徵的交換價值：職缺或國家考試要求學歷門檻，甚至依學歷決定起薪等。而這些依學歷的差別對待的合理化，並不必然來自於實際能力上的差異，而是學歷所象徵性指涉的虛擬能力。但是，經歷過高等教育洗禮的子女們，在該歷程中習得的身體化文化資本，往往已經成為子女們重新指認自身的認同的內涵。因此，子女們時常困擾於自己和父母處在



不同的「同溫層」裡，彼此像是不同星球的人一般難以對話，難以讓父母理解自己的關懷，更別說是肯認。

在本節中，我將深入探討這種學歷作為文化資本的實質內涵的曖昧。人們透過學歷的象徵價值想像的虛擬能力，和受高等教育習得的真實知識與技能之間的落差，亦是親子間學歷差距造成親子關係衝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一）實用性的質疑：以市場價值定義學歷的父母

在我的受訪者中，這些子女在取得高學歷過程中獲取的資訊與價值觀，可能會成為父母質疑或否定的對象。如同本章引言中經營中藥行的小瑩爸的例子，他對於小瑩關於社會議題、新聞資訊取得的貶抑，反映出父母心中對學歷的象徵性肯定的核心，常常其實是對於學歷在市場上價值的肯定。他們肯定學歷的市場價值，但是會懷疑取得學歷過程中習得的能力與慣習的價值。而這樣對於市場價值定義學歷的實用性的父母態度，在父母在職業生活上表現比較有自信心的家庭——主要是從事自營業的小資本家家庭——中，以及在勞工階級或經濟困窘的家庭中，展現出不同的風貌。

首先，從事自營業的小資本家家庭裡，家人和家業常常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身在老闆地位上的家長——通常是父親——會扮演統籌家人為家業付出的管理者角色，而家庭成員被預設為無酬勞工。小瑩曾經為此和父親發生很大的衝突。有一次，為了一改中藥行老舊的氛圍，小瑩爸決定更改店裡的燈光及室內裝潢。直到裝潢前的兩三天，小瑩爸突然脾氣大發，指責全家人：

可能他腦袋裡面對於這個時段的想像，那個 pattern 是，家人都在家裡，然後全家是每一天就是 8 小時、甚至超過 8 小時，大家全全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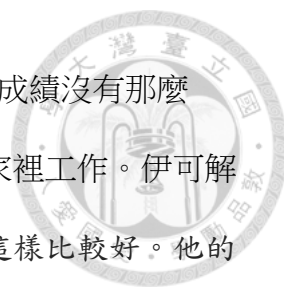


意都在做這件事情。可是其實不大可能。就是你還是會有暑假該完成的報告，或者是有該去打工、該去上班，對。可是這個對我爸來說可能，那個落差導致他非常不爽。所以那天我爸就做了一件非常無聊的事，就是把小孩聚集起來，然後，我好像有下跪吧，就真的是下跪。然後呢他就說，「大家有沒有盡心盡力？」我當下非常誠實的回答他說，我扣除我覺得難以推辭的事情，除此之外，我覺得我已經盡量了。我爸大概覺得說，竟然有些事情的 priority 比家庭的事情前面，我爸就很不爽。然後我爸當下就甩了我一個巴掌。

不過，把家人和家業當作一個整體的家庭觀、事業觀不只是反映在家庭成員要擔任無酬勞工的義務上，也反映在父母想像子女繼承家業的責任上。例如，伊可曾經為了哥哥被父親要求留在家裡工作而和父親產生衝突：

哥哥跟姊姊的成績沒有真的那麼好。但也沒有很差啦。就哥哥的成績還算，就是中等，他可以考上公立的科技大學，因為他是唸高職，他的高職也是那個時候大概 PR70 左右的學校。而且他唸資工。其實還不錯，而且是有前景的。但他唸大學那時候，被迫留在家裡。那個時候我就跟我爸大吵一架。因為我有幾年的暑假，我只要回家時間長一點，我就會跟我爸吵架。那一次我就有跟他大吵一架，就是關於我哥唸什麼學校、他想要叫我哥留在家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只有上那個 G 科大。在台中，G 科大還不錯。他只要上那個的夜校。但其實轉日校考沒那麼困難。但，反正我爸希望他唸 H 科大。H 科大是一個，只要有錢，就可以進去唸的學校。他就這五年都在家裡工作。

其實不只伊可的哥哥，伊可的姊姊也一樣被要求留在家裡工作。伊可很不服氣父



親的要求，她覺得「他（父親）對小孩的教育有點偏心」，因為成績沒有那麼好，就想要犧牲哥哥去唸比較前景的校系的機會，讓哥哥留在家裡工作。伊可解釋，父親背後的邏輯是「因為他覺得他應該在家裡繼承家業，這樣比較好。他的觀念就是自己當老闆，比去給人家養好」。相比之下，伊可自己和妹妹因為會唸書，就不被期待承擔家業，而是被期待要透過教育向上流動。

不過，會唸書的子女也會受到不同形式的介入。伊可說，她當初在選科系時，父親也表達了很強烈的評價：

他就會說，唸法律才有用之類的，不然以後做什麼工作，賺不到什麼錢之類的，就是這類的話。

這也造成了伊可一次與父親的劇烈衝突。面對父親對子女強勢的指導要選擇「有用」的科系，伊可反駁：

如果工作只是為了要維持生活的話，做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工作，然後你一輩子有這麼多時間都在工作上面，這樣不是很痛苦嗎？而且你還要逼自己去唸這些你不喜歡的東西。而且唸這些東西出來之後，你不一定要會做這個，就是你等於是浪費這些時間啊。可是如果可以把這些學習的時間拿去探索你喜歡的東西的話，不是很棒嗎？

然而，對於伊可爸來說，伊可的說法不切實際，他認為理想跟現實生活是兩回事。當時，伊可回了父親一句，「我們（子女）知道現實是什麼啊」，反而被父親誤以為是伊可在否定父親的努力、嫌棄父親無能讓家裡變得富裕。伊可爸為此和伊可冷戰了好幾天，直到伊可妹提醒，伊可才意識到自己無意間脫口而出的話，被父親解讀成嫌棄家裡窮，於是急忙向父親道歉解釋，才解開這回的心結。

剛從F大社科類碩士班畢業的阿尼，在接受我訪談當時正在待業中。他熟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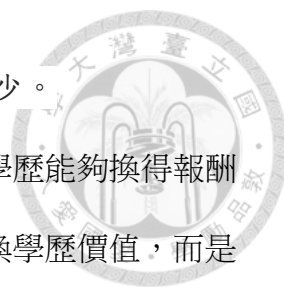
且快速地逐一回答我訪綱上列的每一個問題，也許是較熟悉量化研究的他，對於訪談的想像比較近似於問卷的結構化訪談。阿尼對自己在大學及研究所過程中習得的知識與技術有著十足的自信心，不時批評父母對於自己實力的低估，以及對於高學歷就業市場的偏誤想像。

阿尼的家裡開金紙店，在他的描述下，其實家裡的經濟狀況屬於小康。然而，他描述父母對於賺錢與休閒的想像，點出了其背後潛藏的階級心態，是一種把「賺錢」當成是一種自為目的（而非手段）的活動，而同時又把這樣的想像與經濟學的經典提問連結在一起：

中南部應該很多家庭都這樣子。就是，能賺錢、有錢跑進來，就繼續賺啊，為什麼不賺？經濟學也會問這種問題。通常是，你要收入超過一定的金額的時候，你才會覺得休閒比那個錢還重要。不然你通常會選擇賺更多的錢而不是休息。其實一般勞工也都是這樣。很多在 seven 跟全家打工的人也是啊。為什麼他們要去值大夜班？就是他們沒有錢啊。他們也是寧願選擇值大夜班。唉，沒有錢就是這樣子。

即便阿尼家並不窮，不必像在便利商店打工的人一樣，因為沒有錢所以能賺就賺。但是，「能賺就賺」的心理卻仍然反映在阿尼父母的工作觀上。對他們而言，休閒被安排在生活的邊緣位置。阿尼指出父母幾乎全年無休的工作模式背後的動機：

你在那邊開店，錢就會跑進來賺，為什麼你不賺這種錢？難道要等到有一天，你沒辦法賺的時候，你才再想要怎麼賺？這樣講也是滿有道理的。只是，唉，他們真的太誇張了。我沒有辦法想像我可以 365 天沒有一天有休息的。短期有可能，可是長期真的是不太可能。



他們還是有休息啦，就也還是有娛樂活動。但很少很少很少。

阿尼進一步犀利的批評父母的眼界狹隘，才會無法了解，學歷能夠換得報酬的最有效率方式，並不是像是去考公務員這種表面的方式來兌換學歷價值，而是善用受過高等教育的身體化文化資本來轉換成更多的經濟利益：

我爸媽也是這樣想，要我考公務員。為什麼我覺得他們這樣想？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嗯…嘖，我不知道欸，雖然這樣講很難聽啦，可是就是他們眼界有限。他們沒有辦法想像一個，高階的、私人的公司的職業是怎麼樣。然後譬如說他也會叫我去考書記官啊。反正就幫我爺爺弄事情啊。他講說書記官很跣啊。

相較於從事自營業的小資本家家庭，勞工階級或經濟困難的家庭中，則會出現「怕做工」（鄭英傑 2017）的心態。鄭英傑（2017）的研究中指出，勞工階級的家長基於想要脫貧及爭面子的心態，產生出「怕做工」的「反再製心態」，反而教養勞工階級的子女不要變成跟自己一樣的勞工階級。這樣的機制顯示出，在台灣的勞工階級家長的教養實作與子女受教養產生的心態，與 Paul Willis (2013[1977]) 的經典研究《學做工》中勞工階級親子間的階級再生產機制可能是並不一致的。

父親是貨櫃車司機，母親是兼職幫傭的雷恩，父母收入相當有限，夫妻合計月薪大約僅三萬元左右。在受訪當時，雷恩剛開始攻讀博士班，朝著自己理想的學術道路前進著。當我和他聊到學術產業未來的不確定性時，我詢問了雷恩，未來是否有可能考慮做其他的工作？父母會不會建議雷恩做類似於他們自己在從事的工作型態？雷恩用一種曖昧中帶有否定的口吻答覆我：

其實我也不覺得說我爸媽的…工作…不好怎樣子，可是他們其實一定不會希望說，我跟他們走上一樣的路。而且，從以前到現在，養



我養這麼大了，從高中，而且還就是補習什麼的，他們覺得是投資的事情也幫我做了，就不應該做跟他們一樣的，或是他們覺得是勞、苦力的那種工作。畢竟我現在已經越來越走向一個比較專業的領域了。所以其實，那種工作是比較、就是也不在我的…沒有想、沒有想過會去走、做一些…就是，嗯，藍領階級的工作，可以這樣講。

從雷恩試圖避免自己表現出對父母職業的否定、避免直接講出「那種工作」是哪種工作的說話方式，可以看得出雷恩以及他所認知的父母的想像，都深植了「怕做工」的心態。一方面，對於脫離勞工階級工作有著強烈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會擔心表現出對勞工階級的否定，潛在地影射到對從事勞工階級工作的父母的否定。

「怕做工」的心態在家裡務農，父母收入拮据的小芬的描述中更是清晰：

我覺得（怕做工的）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是務農的。就是他們都會一直跟我們說，「你們要好好讀書啊，不要像我們這樣一輩子都在務農。我們在這裡曬太陽，你們應該要去吹冷氣」。就是，他也不算是職業歧視。可是他們就會覺得，他們已經受過那個苦了。然後，既然你們三個（小孩）還算滿會讀書的，那你們應該不要再走我們的這條路，因為他們覺得很辛苦，又要靠天吃飯，然後又不一定每次收成的價格都很好，所以就會一直起起落落。就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太辛苦了。她就會覺得說，你們既然有點會讀書，那你們就應該去坐辦公室。我覺得他們的想法是這樣。就是，從小到大，他們都是這樣一直跟我們說。因為我們偶爾也會去田裡嘛，她就會說，「你看，這麼熱，你們做一下子就覺得受不了了。就跟你們說要



好好讀書，不要像我們這樣」。

「曬太陽」和「吹冷氣」的對比是勞工階級怕做工心態的一個經典敘述<sup>4</sup>。在勞工階級的父母眼裡，勞工階級的工作就是出賣勞力的辛苦活，又不賺錢；而能坐在辦公室裡的白領階級工作就是輕鬆舒適，又能賺比較多錢。怕做工的心態影射到的理想工作型態常常是以公務員為典型想像的「穩定」工作，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下一章討論階級翻身焦慮時詳細闡明。

## （二）價值觀的對立：無法肯認子女關懷的父母

在接受大學教育的洗禮下，無論是正規的修課中的學習，抑或是透過科系、社團、參與公共事務等課外活動的培養，子女們會逐漸內化一套價值觀與行事邏輯，即便其中並不存在單一一種模組。但在我的受訪者中，許多子女都察覺到自己和父母的價值觀與行事邏輯十分迥異，甚至用跟父母活在不同的「同溫層」這樣的方式描述。「同溫層」是近年來流行的網路用語，運用大氣層中的其中一個區塊的科學專有名詞，來譬喻自己所身處的論述空間（尤其是在社群網站上的）中的同質性極高，並且很難和身處相異論述空間的人達成有效的溝通。

愛咪的訪談中便直接使用了「同溫層」的隱喻來指涉自己和母親的觀念差距。愛咪在我的受訪者中是最為年長的，訪談的當時為 34 歲。愛咪和我聊了很多以前和父母之間大大小小的衝突故事，尤其是和媽媽之間。因為父親在她大學

---

<sup>4</sup> 鄭英傑（2017: 79）的研究中，受訪的父母也有用過這樣的形容：「讀冊啊，很重要啊，就是讀好才能賺錢，我自己以前就是沒有讀書，越讀越「冊」（討厭），才國小畢業，找無頭路，現在才會做工啊……做鐵工很辛苦，一天才賺幾百塊，不像那些會讀書的人，坐辦公室，吹冷氣，一個月賺好幾萬，沒得比啦。」（原文無粗體字，為本論文作者所加）



剛畢業那時過世。配合她戲劇化的敘述與笑聲，彷彿那些過往的不愉快都已經隨著時間經過轉化成了一齣齣喜劇。例如，愛咪其實非常困擾於母親焦慮的逼婚及要求相親。然而最後她卻把無奈尷尬的相親故事，講得像是一段笑話，甚至還為了我的研究擔心：「你這樣真的資料夠用嗎？我覺得我在講一些笑話的感覺」。

形象活潑開朗的愛咪事實上是位躁鬱症的患者。愛咪讀高中的時候，在輔導室諮商的過程中開始發現憂鬱症的症狀並確診。2010年，她從憂鬱症轉變成躁鬱症。愛咪援引了精神醫學的資訊，理解憂鬱症或躁鬱症是生理性的疾病，可以透過藥物控制來維持生活秩序。愛咪的母親卻一向認為是因為愛咪為了準備考試拚命過了頭，升學壓力太大把自己搞成了憂鬱症。愛咪說，母親和姊姊都不認同那些精神疾病的生理基礎，總是覺得只是愛咪的心靈太脆弱：

我當初甚至於為了要跟他們講這件事情，我還去印那種 Wikipedia 的憂鬱症解釋。就是我希望用一種比較學理上的、醫學上的解釋、生理的解釋，去跟他們講述。因為我在 2010 年那時候轉成躁鬱症。對，就是前十年是憂鬱症、2010 年開始轉成躁鬱症。所以，轉成躁鬱症的時候，其實對我自己的衝擊也很大。因為有躁症傾向的感覺跟鬱症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我那段時間很試圖想要用一些醫學上的知識去說服我家人說，你必須正視說所謂的這種精神疾病，它其實就跟我們一般的生病是一樣的。但是，還是有很多一般人他會覺得，那只是自己的脆弱或怎樣。還是很多人是抱持這樣子的想法。他不會去在乎說你什麼醫學的研究說什麼，因為你本身天生比較欠缺某一種類似血清素在你的血中。反正就是這些部分，我當初試圖跟他們溝通，但他們其實不願意聽。

在觀念上各持己見的狀況下，愛咪很容易和母親吵架。愛咪受不了母親情緒



勒索式的說話方式，但母親也同樣聽不懂愛咪想要傳達的內容，愛咪說「這是一個同溫層的概念」。而愛咪從自己的經驗來說，她覺得時間很重要，彼此都需要慢慢地學習：

因為你如果真的要靠溝通來講的話，你的溝通的前提必須是雙方有類似的經驗或者是一些，她可以接受新知這一點。但是我覺得，簡單來講我覺得這是一個同溫層的概念欸。就是，不管怎樣你今天的學經歷背景會幫你塑造出你的同溫層，那很明顯的就是，我的求學歷程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其實跟我家人的同溫層處在兩個世界。所以我們要溝通的狀況下，必須是，不管怎樣，可能必須要有一方很努力。例如說，因為可能我以前不夠成熟，對我來說，我不會知道要怎麼樣用她可以理解語言去跟她（溝通）。

後來經由愛咪的介紹，我前往愛咪在中部的鄉下地方的老家訪談了愛咪的母親。愛咪媽熱心的開車載我從公車站回到她家進行訪談。在路上，她主動開啟話題談起愛咪，直到當時，她也還是相信愛咪就是拚命唸書過了頭，才會升學壓力太大而得憂鬱症。然而，即使愛咪和母親始終沒有接納彼此的觀念和立場，但是她們已經慢慢學習到互不侵犯的相處模式：

她會慢慢的學習到說，她逼也沒有用，或者是，她急也沒有用。但是這個是需要時間跟她自己內心去調適的。甚至於包括我的年紀愈來愈增長。噢，這當中還是會有一些溝通的狀況。我是前兩年的時候，她終於比較願意去聽我講。例如我會跟她講說，我不是這中間沒有來往的對象，我只是不要而已。或者是相處了之後不適合。然後很有趣啊，我媽當下恍然大悟說，什麼！我一直以為你都孤家寡人，都沒有人追，原來是有的嗎？





同樣察覺到自己和父母親身處在不同同溫層裡的小宇，相較於已經和母親「纏鬥」多年的愛咪，剛從大學畢業 22 歲的她，仍然處在與母親溝通困難的煩惱中。雖然母親也很喜歡和小宇討論各種議題，但討論起來的感受還是跟與同學討論有很大差異：

但因為很多時候，這些衝突發生都是因為，除了我自己很無法接受以外，我媽自己很愛評論、要跟人家談論這些事。變成就會覺得，在我的世界裡，我跟那些 E 大社會的同學們，我們也是很常有這樣的談論。可能我們在宵夜店或是什麼的，大家就是會圍在一起，然後一起講說，我們對於一個議題有怎樣的看法，對這件事情有什麼樣的看法。所以我其實是用跟那些同學講話的方式在跟他講話，在講說，因為我查到了什麼資料，所以這樣跟你講。但後來發現，得到的 feedback 不一樣。

關於母親和自己不同的「同溫層」的溝通方式究竟有何不同，小宇則向我如此說明：

因為我媽就是非常熱愛跟我對話。各式各樣，她就是想要傳達各種他心中的理念給我這樣。告訴我說人就要怎樣。但她理念跟我很不一樣。她就很愛發表評論，但是我就會覺得，怎麼可以這麼輕易的發表評論呢？我就是比較實證主義派這樣。……但是她，就變成這種討論都不太能夠一來一往的感覺。就我可能會講出很多很多的論點來支持我的東西，但他的論點可能就只有一個，就是「因為我這樣相信」、「我覺得這就是社會的事實」。……因為這樣的溝通方式，會讓我更急切想要讓他知道說，不不不，我現在的論點是很重要的，是真的強過你那方的。可能就會搬出越來越多其實是超出他理



解範圍的東西。譬如說，就開始烙一些理論啊，或是烙一些數據什麼，那些東西其實是離他們更遠的。但是就會覺得，好像搬出這個看起來更權威、更有根據的東西，就會讓他能接受。但其實，反而更沒辦法溝通。

在大學裡面，重視證據和理論的論證說理受到推崇，被認定成是比較接近真理、或是更有邏輯的論述方式。這或許在菁英的世界裡是可以通行無阻的原則，但卻可能是一種階級特定的思維。當高學歷的子女們將這樣的思考方式帶回到家庭中，和低學歷的父母互動時，反而是阻礙了彼此的溝通，讓彼此更難互相理解。小宇反省自己的論證邏輯，心中萌生如此的擔憂：

就會覺得，第一，我的這個方式其實並沒有真的促成溝通，因為不是用他的話去講。第二又會覺得，有一種很強欺弱的感覺。感覺我們文化資本上有這麼大的落差，但是我憑藉著他們賜予我的文化資本拿去壓他們的這種很矛盾的感覺。……就會覺得，花他們的錢，去上大學，然後學了這些東西之後來嗆他們的感覺（笑），就會覺得自己在搞什麼啊！

就讀於 F 大的安尼經常和母親爭議的是死刑存廢的議題，他說，在母親眼裡看來，像安尼這樣的支持廢除死刑的高知識份子都只是「過太爽」，不食人間煙火：

就是死刑的看法。我媽會認為我標新立異啊。他會認為我接觸的這些，自以為高尚的人群。我媽就會認為說，我們這些 F 大學生什麼的，過太好過太爽啊。可是事實上不是。她會認為說我們不懂這些底層人民的痛苦。我說當然不是啊。有些人反而是你太理解那些痛苦是什麼東西，所以你會想從根本解決，而不是再去製造新的仇



恨。可是在他們耳朵裡聽起來，這些東西都是口號啊。沒辦法，因為喜歡呼口號的政客太多了。

尤其是參與社會運動的子女，社運所訴求的超越個人的價值，往往難以讓父母理解與接納，而製造親子間的衝突。就讀於社會系的西恩，在上大學以前本來與母親之間是無話不談，每天回家都會分享在學校生活的點滴；自從放榜得知自己上社會系開始，母親便流露出錯愕的神情。在當年，第一次參加野草莓學運，西恩與母親的裂痕就變得越來越深。西恩在情緒十分滿溢的狀態下，和我分享這段故事：

你看到你的老師、你的同學都在那邊，然後你看著他們被鎮暴警察這樣對待。你當然心裡就會覺得，就是國家機器在搞什麼東西這樣。可是我媽就完全不是這樣。我那時候最記得的是，學生可能跟警察之間有一些拉扯吧，我媽是站在警察那邊的。對，我當然不能理解啊。我會覺得怎麼會站在警察那邊。我就說這些人都是國家，我可能，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用那麼激烈啦，就是，都是國家機器的走狗之類的，或是服務國家機器的人。然後我媽就覺得我不可理喻啊。我媽就說，那些人也是人生父母養，為什麼你要這樣對他們。但我覺得那時候我還沒有辦法分清楚這件事情。或者是說，這麼複雜的東西，你看 OOO（人名）也花了他的碩論在處理警察在這當中的角色。那我當然沒有辦法在那個我才剛接觸社會學的階段說給他聽。可是那件事情給我或給我媽的衝擊是，她應該有意識到她覺得她小孩念了一個，我認為啦，她覺得非常邪門的東西。就是，我媽從那件事之後，她就非常討厭 F 大。她是這樣跟我講。她就覺得，她非常討厭 F 大。她就覺得那些教授都在帶壞我。對。她覺得是 F



大的問題，然後 F 大都是民進黨。我在猜啦。所以這件事情到我後來有點無法理解是，我大四畢業那年她來我系上的小畢業。可是我其實心裡非常矛盾。就是，你聽了一個人跟你講了三年快四年她非常討厭 F 大、非常討厭社會系，然後，她要去你的小畢業。對。當然，你說在情緒上，我可以理解對她來說那是一個，她……（開始啜泣）她自己養大的……

所謂「同溫層」的現象在有學歷差距的父母和子女之間製造出隔閡，溝通的困難時常不會展現成顯性的衝突，例如前述一方積極的想說服另一方的狀況；有些衝突以隱性的、溫和的方式展現，卻也負面影響了親子間的關係。隱性的衝突表現為親子間的疏離與隔閡感，主要發生在父母基本上對子女的表現概括性的肯定，並不介入的狀況。

就讀博士班的雷恩無奈地說，學術工作和父母從事的勞動工作的距離太遠，讓父母很難想像自己在做什麼，自己也很難向父母分享，話不投機讓彼此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疏離。雷恩和父母分享博士生活時，往往很難得到理解：

其實我有講，博士生就是要寫論文，然後發 paper 啊，這不是很基本的事情嗎？可是他們其實不會了解說這個重要性在哪裡。他們就是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大學生的事情。可是他們沒辦法體會到說，寫論文，或是去發表，然後評你的研究著作這件事情是什麼樣的概念。他們絕對想像不到。

雷恩回想起高中以前的生活，他發現上大學之後和父母之間的交流越來越不頻繁。因為擔心揭發彼此之間的知識落差反而造成衝突，雷恩避免傷和氣的去表明自己和父母不同的認知，反而也減少了彼此的交流。雷恩舉例某次和父母在餐桌上看電視看到關於同性婚姻報導時的互動場景：



我從高中一個封閉的環境，就是整天唸書，整天寫考卷、整天補習，然後只要拿前三名，他們就會覺得很開心，這種封閉的思想。至少他們知道成績是什麼，可以拿出來看。可是，上大學以後，我自己台北接觸的事情變多了，然後上的課也變多，其實，我覺得我跟他們之間的知識落差已經差到一個，不知道要講什麼（的程度）。現在電視上在討論同性婚姻的議題，他們看到電視新聞的時候就會說，男生跟男生怎麼可以結婚？或是他們可以在一起啊，可是他們可以不要結婚啊。然後我可能就會想要試著說，可是兩個人相愛（彼此）之間可以有一些權利的保障啊之類的。這種時候，那個話就也知道要怎麼接下去，你要繼續跟他抗辯嗎？或是說你要繼續說服他嗎？可是其實沒有必要說服他，因為，你已經預期到他可能根本不會改變他的想法，或是，除非我自己也是同性戀，要逼他們改變他們的想法。可是因為其實我不是，然後其實說老實話，同性婚姻對我自己來說，其實也不是一個最直接的利益衝突的事情，所以說，其實就那也沒什麼話好聊，因為他們可能要跟我討論的是新聞上的議題。可是其實，我跟他們的想法已經不一樣，因為我知道說，新聞可能有一些是帶有很主觀的立場，不管是政黨或是一些想法，可是這種時候，我自己內心的最直接的感受是，欸，我自己在大學裡面學到的東西是這些，如果我分享給你，可是你又不接受，你可能還會不愉快，那我有必要造成這種在餐桌上的衝突，或是說，衝突的可能，或是說我要讓這個餐桌的話題冷下來嗎？那不如我就乾脆不要說話好了。這樣子，其實也是一個相處的方式。

與雷恩相似，就讀碩士班的小波表示，他的家人對於會讀書基本上也是抱著



肯定的心態，一向鼓勵小波繼續完成學業。計畫未來要繼續讀博士的小波煩惱著自己越是往上唸，與家人的關係就越是疏遠：

你就沒有什麼能力轉變它。因為你會知道說這個就只能是這樣子。

就是你讀越高，跟他們的生活就是越來越遠。你難道要跟他們分享

你在研究什麼嗎？不可能哪。

尤其在台灣的學術環境裡，讀博士往往意味著出國留學，像雷恩一樣因為逕讀博士的獎學金而選擇在台灣攻讀博士的人尚不在多數。出國留學不只是心理的疏遠，也是地理上的疏遠，長期的在國外也是時間上的疏遠，這也影響到父母對於讀博士的接受程度。像是小波曾經和母親提到：

我跟她講說，「你知道我出國唸的話，我要唸多久嗎？」她就說，

「多久？」我就說，「可能要七、八年」她就說，「啊？那你還真的要出去唸嗎？」所以她可能原本是不知道博士要唸這麼久。她可能以為博士就是唸兩、三年這樣子。但她知道要唸這麼久的時候，她就還是有一點覺得，不能說不贊成，但至少，不像以前那樣子，「好啊，你要去唸就去唸啊」的那種感覺。

父母本來原則上肯定子女的學業表現、肯定子女繼續取得更高的學歷。然而，隨著子女唸到大學，甚至研究所，資訊落差逐漸擴大，造成疏離與隔閡感。如此的非意圖後果，從而成為親子關係的危機。

#### 四、小結

本章分析在低學歷的父母與高學歷的子女之間，「學歷」作為一種文化資本，如何產生出潛在與外顯的親子關係衝突。在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理論中，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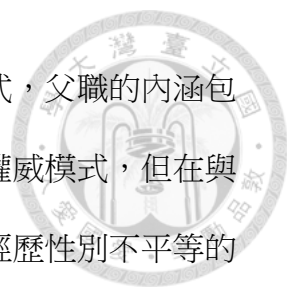


將文化資本分為身體化、客體化及制度化三種形式。在此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指出學歷同時帶給個人的「身體化」的文化資本與後兩種狀態的文化資本並非等值，其轉換為經濟資本的轉換率有所落差。因此，我將學歷的身體化的文化資本向度稱為「學歷的實質內涵」，學歷的客體化及制度化向度則稱為「學歷的象徵地位」。我認為，低學歷父母與高學歷子女之間，由於對於內在於學歷中的象徵地位與實質內涵的重視程度相異，於是產生衝突。

對於低學歷父母而言，經濟資本轉換率較高的學歷的象徵地位更有價值。因此，父母肯認，甚至向他人炫耀子女的高學歷，並且將擁有高學歷的子女當作自己的願望代理人。然而，許多子女在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習得的身體化文化資本，例如：價值觀、品味、文化知能、技能等，讓子女們更為珍視，甚至對有些人而言，這些身體化文化資本即使轉換成經濟資本的轉換率較低，依然很有價值。但這樣的價值卻未能得到低學歷父母的肯認。

因此，學歷差距帶來的親子關係衝突可以分成兩種主要的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因為父母對於學歷的象徵地位的高度肯認，反過來暴露了父母自己身上的「隱性階級傷痕」，威脅了父母的教養權威地位，產生出親子之間的衝突。第二種類型則是因為父母對於學歷的實質內涵質疑，由於經濟資本轉換率較低，從而貶抑身體化的文化資本的價值，重視自己身體化文化資本的子女感到自己和父母價值觀的對立，難以和父母溝通、得到父母的承認。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家庭的父母之間，以及父親和母親之間，都存在著異質性。從事自營業的家庭因為有「家業」存在，家裡的工作如何分配給家屬、家業要由誰繼承會成為重要議題，此時高學歷子女因為受期待能從事更高階的工作，而有時能得到部分的豁免權；從事藍領勞工階級工作的家庭則容易出現「怕做工」的心態，不希望子女從事和自己一樣的體力活，而督促子女爭取穩定的工



作。父親和母親也因為相異的性別經驗而展現出不同的教養模式，父職的內涵包括了對外的代表性和對內的家庭秩序支配，主導了父親的教養權威模式，但在與子女的學歷差距下成為潛在衝突的來源；母親則可能因年幼時經歷性別不平等的家庭資源分配，錯失讀書機會，而將讀書的渴望投射在子女身上，希求子女代理實現讀書夢。

在本章的基礎上，下一章將探討在經濟不穩定家庭中，把學歷視為階級向上流動的重要管道的觀念，如何進一步危及低學歷父母與高學歷子女之間的親子關係，其壓力產生的焦慮甚至動搖高學歷子女的自我信念。



### 第三章 像天堂的懸崖：經濟困難家庭子女的侷限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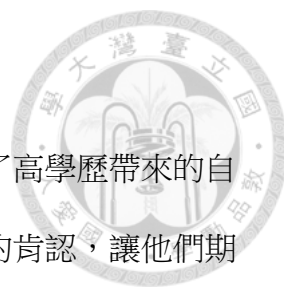


在我的受訪者中，許多處在經濟困難的家庭的高學歷子女，都期許自己能以高學歷換取階級向上流動，卻發現教育向上流動本身並沒有真的那麼保證階級向上流動。例如甫從大學畢業，兼差設計遊戲和寫小說維持生計的克洛。他的父親是計程車司機，母親則是清潔隊的隊員。克洛父母的年收入合計不到 60 萬，並具有低收入戶身分。在貧窮的環境中成長，克洛具有很強的社會底層階級意識。對於自己承擔父母給予的透過教育向上流動的期許，他更直接對著我控訴學歷至上社會給的「假希望」：

我們這代的年輕人還需要用血、用淚去換，甚至用更可怕的代價去換，才有辦法換到勉強生存，生存條件甚至比我父母當年的機會還要更寡的時候，我不認為是我的父母他們單一個體的錯，但是是這個社會結構出了嚴重的問題。它給了我們這個尤其是越底層的人的想像，就是越讀書越能翻身這個想像，它給的這個假希望給太大了、太誇張了。

克洛說，在他進大學、開始到媒體業兼職工作以來，克洛就開始看穿這個社會的真相，以及他口中所謂的「假希望」，於是他早早認賠殺出。關於克洛的故事，在本章第三節更詳細的介紹，在此導言中暫且先帶過。

在前一章，我分析了學歷作為文化資本，其內在的象徵面向與實質面向如何產生弔詭，造成低學歷父母與高學歷子女之間的齟齬。然而，在我的受訪者中，經濟狀況較穩定的小康家庭裡，子女通常比較能夠迴避與父母相處來減少親子衝突的發生。相對之下，經濟狀況不穩定的勞工階級或貧窮的家庭中，由於高學歷子女承載著要帶動家人向上流動的責任與期望，迫使子女更需要去正面面對父



母，從而承擔更多的焦慮與不安。

即便如此，這些家庭經濟狀況較不安定的子女，仍然共享了高學歷帶來的自我效能感。如同前一章中描述的，高學歷給予他們一定程度上的肯認，讓他們期許自己未來可以從事體面的工作、追求自己的價值，也讓他們的父母期許他們可以達成階級向上流動。然而，正是這樣的自我期許及父母的期許和現實的困難碰撞產生的落差感，讓他們感到備受侷限與不平。

因此，在本章中，我將聚焦在父母低學歷、子女高學歷的家庭中，家庭經濟狀況困難的個案，探討子女向上流動過程中的矛盾。第一節中，我會說明家庭經濟困難的子女所面臨的向上流動心理困境。一方面，由於高學業成就給予他們的自我效能感，他們在經濟能力上確實的向上流動和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之間掙扎；另一方面，家庭經濟的限制讓他們不得不優先考量家庭經濟狀況來安排生涯規劃，從而產生不安與焦慮的情緒。第二節裡，我會闡明高學歷子女背負著拯救父母脫貧的壓力下，開始質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帶動家庭向上流動，甚至進一步質疑階級翻身可能是學歷社會所給予的虛幻的期望。

### 一、向上流動的心理困境

獲得高學歷的經濟困難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往往乘載著階級翻身的期望，然而，實現向上流動的路途上存在著一些會困住他們的心理困境。首先，職涯選擇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尤其高學歷者往往認為自己有更多選擇，要選擇自己的志趣，還是選擇明確讓家庭覺得成功向上流動的工作，是向上流動時的第一個難題。其次，由於家庭的經濟狀況不安定，穩定家庭經濟往往成為子女們需要優先考量的課題，但也因此產生了不安與焦慮的風險感。



### (一)「做你所愛」的虛渺

在受訪的子女中，不乏和我侃侃談起自己曾經想要追求的理想的受訪者。但面對現實的難題，尤其是經濟困難家庭的子女，有些人在不得不然的狀態下，無奈地選擇擱置或拋下自己原先的理想。

小威和我約在一家咖啡廳裡訪談。在嘈雜的咖啡機聲響，以及因客滿而在耳邊不斷交錯飛過的鄰座聊天聲中，小威旁若無人的向我傾訴父親反覆質問未來職涯發展帶給他的龐大壓力。

小威的父母在他國小的時候破產，有被法院查封的經驗。財務狀況的破綻下，小威的父母在他小學五年級時離婚，隨父居的小威進入了單親家庭的生活。小威的父母都從事收入不高的體力勞動。父親是醫院、安養院的接駁車司機，而母親是早餐店的服務員。父母在離婚後都沒有再婚，小威也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然而，家中經濟狀況的侷限加諸他的期待與壓力，遠超出身為獨生子所獲得的寵愛。

小威曾經想要繼續升學，碩士畢業後出國唸博士。然而，未來潛在的風險對小威家而言也無法承受。小威說，如果出國讀博士的話，「回國之後還不一定能找到工作，那這件事情對他們（父母）來講風險就非常大」。另一方面，趕快找到穩定工作的期待，也擠壓了小威對自己未來的想像。由於只要遇到父親，他就會有意無意提起未來要做什麼工作的話題，因此在台北唸研究所的小威並不喜歡回到台南的家裡。對父親而言，考公職是穩定且有保障的代名詞，因此總是催促小威去考公務員。當初升大學時，小威的志向是文學，但出於父親的期待，妥協之後選擇了父親相信可以考外交官的外文系。然而，因為對社會議題關心而往傳



播科系的研究所升學的決定，卻是逸脫了父親的期待。

對小威而言，並非是不想要穩定且有保障的工作，而是在職涯發展的評估要素中，工作能夠提供的經濟安全不是全部。而是還要評估自己的能力，以及要進入某一個職業選擇時需要付出的成本和需要承擔的風險。此外，志趣也是其中一項要素，這驅使了關心社會議題的小威進入傳播科系的研究所自我發展，也曾想望從事 NGO 的工作，只是在經濟相當不安定的家庭裡，不穩定的 NGO 工作無法成為他眼前的選項。

黛比則是曾經想要唸研究所，卻因為得不到家庭的支持，現實上難以負荷，而選擇放棄升學的打算。她的家庭結構除了父母和自己以外，還有一個弟弟。父母對弟弟的偏袒是黛比在訪談中反覆聚焦的主要議題，屢次講到情緒激動的她心中的不平之冤深刻的傳達，令我印象十分深刻。我身為也是有姊姊的弟弟，在黛比抱怨時，不時感到彷彿是自己的姊姊在向自己訴苦般，有一種身為兒子的內疚。談到弟弟可以去補習，準備考研究所；自己當年大學畢業，想考研究所時，卻因為無法自己負擔學費而不得不放棄升學時，黛比告訴我她心裡的不平衡：

一方面也是因為經濟因素。因為，我爸媽會讓我們讀到大學，但是大學之後我們要自己想辦法。對我來說，我當然會想要讀研究所。可是，對那時候的我來說，那不是我能負荷的。因為如果我要考研究所的話，就是我要去弄學貸。可是我又不是那種喜歡欠錢還錢的人。所以問我想不想（讀研究所），當然想。可是，因為我跟我弟我真的很不爽，所以我不知道他那時候大學畢業的時候，原本好像有想要考研究所，但是我不知道。因為我爸媽跟我弟之間的事情，他們不會跟我講很清楚，所以這些可能只是我的猜測，就是那時候我弟有去補習，但是我不知道他去補習的這些錢到底是誰付的。然



後，甚至說如果他真的去讀研究所，研究所的學費是他自己付的，

還是我爸付的，我不知道。所以我那時候心裡有點不平衡。

瑞雯成長於經濟狀況不穩定的隨母單親家庭中，母親與父親在她小時候離婚。但在年幼時，母親為了賺錢去中國工作的期間，由父方的祖父母養育。因此，瑞雯的孝親議題圍繞在母親以及父方祖父母三人身上。在考上頂尖大學的法律系之後，瑞雯明顯地察覺到自己的家庭狀況如何侷限了自己的機會。她發現自己的家庭好像幫不上自己什麼忙：

比如有時候聽到，有些人甚至可能回去問他爸媽法律上的問題，或

是，要出國了、要交換了，就是有人會，甚至有人考不上律師，他也

不想唸，但是爸媽就安排讓他出國唸書等等。唉，對。

不過，其實考律師執照也是瑞雯在家庭壓力下不得已的決定。當初，在入學後她很快發現法律系與自己的期待有落差，短暫休學尋找自己的方向，發現自己對表演藝術的濃厚興趣。但最後瑞雯仍發現自己的處境沒辦法只為自己而做生涯選擇：

因為家庭讓我覺得有一個比較遺憾的事情是，我其實滿明確知道自己

對藝術很有興趣，但我知道是不太可能從事那方面的事情。而


且，我覺得那個對錢的需求是，就那個錢的壓力是已經成為一種慣

性了。可能你從小就已經習慣、已經知道會因為這個因素而過著很

不穩定的生活，所以會有那個需求覺得一定要那樣（從事有穩定收

入的工作）。

這些第一代大學生子女所面對的困境是，他們曾經相信自己有能力、有資格可以追求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像是升學、出國、從事自己真的有興趣的工作等等。但是，當經濟的現實壓力來臨，他們發現這種「做你所愛」的價值觀反而讓



他們感到挫折。Quart (2019) 引用了芝加哥大學教授 Lauren Berlant 所提出的概念「殘酷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 指涉這個現象，她指出「無論是『向上流動、工作保障、政治與社會平等、愉快且持久的親密關係』，我們的個人安穩及未來已經殘破不堪，而我們卻依舊相信自己可以『做你所愛』，即便美國已經沒辦法再幫助我們從生活與工作中『獲得正面回饋』」(Quart 2019: 53)。而這樣的現象，在後工業化時代的台灣社會也一樣如此。更多人想要透過學歷向上流動的時候，這樣的樂觀主義反而更把人們困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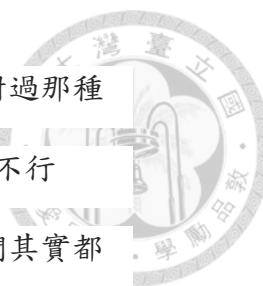
## (二) 經濟困難下的風險意識

在經濟狀況困難的家庭中成長，容易養成子女害怕風險、焦慮於家庭中經濟狀況的風吹草動的脆弱心理。因此形成的結構限制是，即便子女透過教育取得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或許有可能轉變家庭的經濟劣勢。但是，搭上向上流動機會的初始風險讓子女卻步的話，就會錯失這個翻身機會。

在本節中，我將藉由受訪者的經驗，詳述家庭經濟狀況不穩定如何形塑出子女的風險意識。首先，由於這些子女需要在優先考量家庭經濟的前提下，才能想像與實踐自己的未來藍圖。因此，穩定家庭經濟就成了侷限子女生涯發展的先制條件。然而，經濟狀況不穩定還可能帶來的難題是，因為父母有限度的揭露經濟狀況，子女甚至連家裡是不是真的很窮、有多窮都不清楚。不透明之下反而激起更多的不安，使得子女可能陷入無止境填補無底洞的焦慮中。

前一小節提到過的小威父母負債的經驗影響了他的借貸觀念。即便破產的是父母而不是自己，他仍然只敢看眼前的收入，對未來的規劃沒有貸款的選項，使他放棄了如留學等所費不貲的夢想：

我大概知道有一些學生是利用貸款的方式去出國留學之類的。那因



為我們家其實是已經是破產的狀態的。我們是有被法院查封過那種狀態。所以我們不可能再去借錢。(宇修：是你們家的人都不行嗎?)對。我們家的人都不行。不管是我爸還是我媽，他們其實都是負債的狀態，我們沒有辦法再去借錢。因為我們也破產了。所以在信用額度上可能已經花光了。但是相對來講我自己、我自己可能也不會願意去貸款。我自己本身也不敢去貸款。因為我覺得，因為我滿擔心之後還不起的。他們可能也不希望我這樣子，因為他們到最後都是負債的狀況。

此外，為了穩定家裡的經濟狀況，小威的生活中必須先嵌入維持家庭收入的基本要求，在此條件下小威不可能專心的從事任何一件他想做的事。例如，小威提到在碩士班時期，為了兼顧收入很難專心寫論文：

我覺得一切其實都不算是非常硬性逼迫我要怎樣。可是他們(父母)會告訴我，經濟條件就是那樣，叫我不要做太多預期外的事情。像如果我跟我爸說，我這個學期我都不要工作，我只要專心寫論文或去投研討會之類的，他一定會覺得這樣不行。他會覺得說，你要課業跟收入都要兼顧好。因為他沒有辦法養我、沒有辦法讓我專心只做一件事情。相對起來是這樣。我覺得所謂的(父母對自己的)限制都是外部條件比較多。

如同前一小節提過的，小威的父親一直以來都很希望小威可以考上公務員。然而，在小威的眼裡，把考公職當作唯一出路既是父親對他的能力與志向的不理解，也是父親生命經驗的狹隘，而低估了做一個生涯選擇要面臨哪些挑戰與風險：

我其實跟他說的是，我不太在乎我(將來)的工作內容是什麼，但是



要考上公務員之前，要做的準備跟要投入的金錢都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有好好跟他解釋過。但因為他沒有走過這條路，所以他其實不太能理解。

因為小威的父親誤認為，考公務員就是讀書、準備考試而已，而讀書、準備考試是很簡單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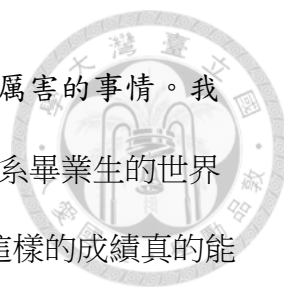
然而，小威的父親對於考公務員的執著，也反映出他無法想像小威的外文和傳播專業究竟能夠從事怎樣的工作，確保怎樣的未來，以讓窮困的家庭階級翻身。每當父親酗酒，這樣的焦慮經常轉化成抱怨與痛罵，激起父子間的衝突：

我好像有跟他說，我們都過苦日子過這麼久了，我已經不想要再窮下去了。因為他其實幫我規劃的道路，沒有他想像中那麼輕鬆。就比如說我剛講的，考公務人員，其實當中也是要投入很多金錢跟時間，而且是要一邊上班一邊唸書這種狀況。我跟他說，我不想要再這麼辛苦了。我不想要再一直這樣窮下去了。他就開始破口大罵。然後我也因為當時他各方面一直不斷地否定我這個不會、那個也不會之類的，我當時就是真的忍不住，就在他面前哭出來。然後那一次最嚴重是因為我晚上還要跟我同學討論報告。我哭到在我騎車的中途，我的眼淚還在流。

然而，小威心中的糾結，他都無法和一心盼望他考公務員的父親討論，只能另謀替代方案緩解父親的步步進逼。關於升學就讀研究所的選擇，小威以兼職從事媒體業編輯賺取外快自給自足的方式，讓父親暫時接受。

此外，小威也把父親對考國考的期待轉化成至少考個證照，並以「把多益考到 900 分」當成雙方的共識。對於父親來說，證照比起小威在學校裡習得的抽象知識來得更實際、更能夠說服他能夠拿來在風雨飄搖的勞動市場中站穩腳步。不





過，小威卻笑著說，「他觀念上好像覺得，多益 900 分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我其實也沒有打算戳破他這個現實」。在小威的眼裡，在頂大外文系畢業生的世界裡，多益 900 分根本有如過江之鯽，不足掛齒。小威也不相信這樣的成績真的能夠在勞動市場上贏得多少優勢。但利用父親對於多益證照價值的認識不足卻可以讓小威在龐大壓力下稍微獲得喘息空間。

在家庭資源不足的前提下，父母抱有性別不平等的資源分配觀念，也會影響父母對子女的期待。不同於小威被寄予承擔家庭經濟責任的厚望，身為女兒的黛比面臨的則是被當作「遲早要離開這個家的人」的差別待遇。黛比的父親是計程車司機，但已經是半退休狀態，偶爾才會去跑一下車。母親則是在電子工廠從事作業員的工作。勞工階級的背景使得家裡資源很有限。

對黛比而言最忿忿不平的就是弟弟交了女朋友後，總是把女朋友帶回家。黛比受不了家裡一直有個外人在，但父母卻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還暗示黛比可以自己搬出去。單身且暫時沒有找對象打算的黛比覺得受盡委屈，收入不算豐厚的自己也沒有本事說搬出去就搬出去。更別說黛比完全不能接受因為自己是女兒，所以要自己搬出去，而不是弟弟和女朋友搬出去：

他們（父母）不會這樣明確的講（要求黛比搬出去）。但是會有暗示，比方說，我媽就會跟我說，你就買房子搬出去住。但是我就會跟她說，你真的覺得我買得起房子嗎？而且就是我只有一個人，為什麼是我去買？他們有兩個人，為什麼不是他們去買？今天是他們結婚，是我要搬出去！？為什麼他們結婚是我要搬出去？他們結婚，他們要搬出去啊。如果今天我結婚，就是我搬出去啊。

黛比直言不諱地道出她的認知中，父母怎麼看待家裡的資源和兩個子女：

因為老實說我家就是一層公寓，然後一個頂樓違建。資源就是這麼



多。那，有兩個小孩，你要怎麼把這些既有的資源分配給兩個小孩子？一方面傳統就是覺得家產要留給男生。所以，他們一方面又覺得說女生一定會結婚、一定會嫁出去。他們沒想到他們生的這兩個小孩子將來會有彼此不合、女生沒有結婚、男生有另外一半。所以變成說就是，目前的這些既有資源因為再加上我跟我弟的關係，還有我本身的交往狀態，讓怎麼分配這些資源變得更困難。

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父母施加黛比自己搬出去的壓力。但另一方面，父母也會擔心黛比老後自己一人沒人照顧。兩者加起來即是父母對已經31歲的黛比早點找到對象、早點結婚的期待壓力。這讓本來就已經有不小的生活壓力的黛比更是焦慮倍增。對她而言，等同是因為自己是女兒，在經濟匱乏的家庭裡就更必須受到犧牲，承擔更大的壓力。

相較於明確認知到自己家境的匱乏，而自知不得不奉獻自己貢獻家計的子女，有另一群子女甚至不清楚自己家是不是真的很窮，或是到底有多窮的不穩定狀態。在不清楚、僅有似有若無的認知下，風險感反而可能更是加劇，因為子女彷彿知道有一個坑在那裡要填，卻不能預期投注多少的資源才能補起填滿那個坑，在心中無底洞式的想像讓子女們十分焦慮不安。

例如，前一小節中提及的雷恩即是這樣的子女。在訪談當天，我請雷恩來社會系館的研究生聯誼室。與我初次見面的雷恩，恭恭敬敬的，回答起問題有點木訥。但同是研究生的雷恩以一種研究生互助的心態受訪，儘可能的誠懇向我娓娓道出家庭的種種狀況。雷恩的父親當貨櫃車司機，母親則是偶爾兼差當家務幫傭，家裡的收入來源並不豐沛。然而，詳細的財務狀況雷恩自己也不清楚，雷恩面臨的經濟不穩定風險感則是一種「好像很窮，但不知道實際上有多窮」的不確定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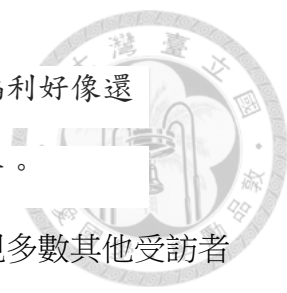


我一直覺得家裡，其實經濟狀況不好，可是我家沒有什麼低收入戶證明這種，也沒有中低收入。可是，因為我爸媽在我小時候有吵過一次大架。就是那種大架是什麼，我爸就是不知道去哪邊欠了一些債，然後我媽就對他大怒，然後，那時候好像還把房子拿去貸款之類的。然後我那時候印象就有點印象深刻說，我家好像沒錢了，怎麼辦？之類的。那好像是小五還小六的時候吧。

童年的深刻經驗讓雷恩一直以來都對家裡有「好像很窮」的認知，讓雷恩在消費上非常節制，也不敢開口詢問細節，或去做什麼多花錢的事，擔憂會再次引起家庭失和。但他也因此選擇過節儉的生活，盡量不給家裡添麻煩，從進大學起就立下經濟獨立的目標，盡可能打工以避免經濟上依賴父母。父母從事勞動性工作的雷恩直到長大後才慢慢察覺，似乎沒有窮到那種「家破人亡」的程度，雖然經濟條件不寬裕是個事實。

但是，從小養成的經濟受限的行動邏輯依然存在雷恩的身上。例如，在工作選擇上，雷恩對於不夠穩定的工作的疑慮很高，心態上容易傾向於把穩定的工作排在優先順位，限縮了他依自己的志向做生涯抉擇的空間。在大學畢業後某次和同學聚會時，雖然發現不少人都進入民間企業工作，對雷恩而言卻心裡不太能接受：

我有些朋友是大學可能畢業完，找一個工作，之後可能工作一年還兩年後就換工作。我那個時候就會覺得說，其實我有一個很深的那種想法，好像我曾經被誰影響過，可能就是被我家庭，就是說，當你找到一份工作的時候，你應該要從頭做到尾、做一輩子。然後公務員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符合我們心中對一個穩定的職業的一個想像：可以做到退休，然後有國家的保障。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個詳細的



福利是什麼，可是，在我的一個印象裡面，就是公務員的福利好像還

不錯，很穩定，然後只要考上了，就一輩子不愁吃穿這樣子。

其實不只是雷恩，父母殷切期盼子女考公務員的狀況也出現多數其他受訪者的家庭中。彷彿樂團「老王樂隊」的歌曲<sup>5</sup>中，以無奈厭世的旋律和語氣反覆吟誦著的歌詞：

前方路一條 / 認真讀書繼續考 / 穩定生活多美好 / 三年五年高普考

在經濟條件有困難的勞工階級家庭中，當父母一方面無法想像子女的學科專業與能力可以從事怎樣的行業，另一方面又殷切期盼子女可以階級向上爬升時，以鐵飯碗為象徵的公務員就是父母想要的「穩定工作」的理想型態。同時，父母也傾向於想像對學業成就表現好的子女而言，考試不會是一件困難的事。像是前一小節的小威那樣對父親坦言考公務員沒有那麼輕鬆，結果換來的是父親的焦慮轉化成了羞辱與否定，激起了親子間的衝突；雷恩在父母的不理解中，面對的處境則是一種疏離與陌生的感受。雷恩描述他的家庭生活時，他有點尷尬地形容：

「我們之間其實不會有什麼我想像中那種很緊密，或是會出現在故事裡面很甜蜜的那種交流」。以子女為中心的（child-centered）家庭生活沒有出現在我的受訪者們的描述中。

瑞雯家的經濟困難來自於年幼時的破產與父母離異，和小威雷同。在幼稚園時，瑞雯遭遇了父母的房子因負債而被法拍。母親之後從事業務性質的工作，收入也不穩定，偶爾會透過投資、炒股票等突然賺一筆。雖然瑞雯表示，這些通常最後都會虧錢，對瑞雯反而一直都是隱憂。例如，瑞雯提及了母親投資有時會扯上訟累，讓她要擔心自己受到牽連，結果卻被母親反過來檢討性傾向的議題：

有一次讓我有點生氣的是，我剛剛提到我媽會做投資嘛，然後加上

<sup>5</sup> 老王樂隊，2017，〈穩定生活多美好 三年五年高普考〉。收錄於專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她之前被告，她之前做期貨就是用我的帳號。因為我開始準備律師考試的時候，我就跟她說，如果我之後要當律師或法官的話，有這些經歷可能對我不太好。因為有一些倫理的要求嘛。所以我就希望她可以把錢轉回她自己的帳號。然後另外一部分我也是想真的確認她身上沒有官司的問題。然後，那時候跟她講這件事情，結果她就回我說，法官可以同性戀嗎？這樣是不是也不好？我忘了她用詞是什麼，因為她是很小聲問我說，那時候是我去市場找她，她在工作的時候。反正她就這樣偷偷問我。然後我心裡就是，後來我就覺得這是奇事吧！但我後來因為也跟女朋友分手，我就也沒有再去跟她討論這件事情。

當瑞雯擔憂的是經濟狀況的危機時，母親反而追究的是瑞雯交女朋友的事。母親難以就事論事的討論方式，讓瑞雯很難去好好與母親討論家庭經濟議題。

高中的時候，瑞雯還因為自己要在暑假幫舅舅開的早餐店打工，被家境較好的好友質疑「為什麼你媽要讓你做那種浪費時間的事情？」，而和好友產生了小摩擦。上大學後，在家裡經濟狀況最差的那年，瑞雯選擇暫時休學去工作，撐住家裡度過難關，也因此延後了自己的大學畢業時程。在復學之後，瑞雯仍然維持半工半讀的狀態，也藉此避免跟家人拿錢。直到訪談前的近期，她才決定為了自己先專心在準備律師考試上，減緩自己的打工賺錢壓力，重新開始和母親和祖父母拿生活費：

因為我原本是不想跟他拿錢，想繼續做這個工作存錢。但是到後來就是，因為覺得不想要再，就是雖然這個情況是可以照顧自己，可是其實沒有辦法存什麼錢。然後，阿公阿嬤又，那陣子好像他們開始借錢給別人，我就覺得很焦慮，會希望自己趕快結束（律師）考試、找到



工作，然後去處理他們的問題。所以我就決定今年開始考試。然後前

一陣子，我媽的狀況也不太好，就是也是沒什麼錢。

男主外、女主內的養家邏輯，有時候也會造成家庭的經濟狀況不穩定的後果。例如，在第二章提及過的承擔母親願望代理人壓力的蒂蒂，家裡是一個近似母方單親的家庭結構。但母親其實並沒有和父親離婚，只能說「算是分居」。父親在蒂蒂的生命中處於一個飄泊不定的狀態，蒂蒂常常不清楚他人在哪、在做什麼工作、錢從哪來的，只是大概知道父親有在以賭博賺錢，以及從事一些地下經濟活動。蒂蒂無奈地說：

當我媽說「你爸消失」的時候，我會覺得那個危機感噹噹噹噹那個燈就亮了。但，其實不會到很窮。很窮的時候只有……一直搬家的時候。國小的時候。那時候很小。然後到我國中、高中我都覺得還好。但是，我自己會一直很擔心家裡面的狀況。因為我不知道家裡面的錢打哪來。

蒂蒂舉了一個例子，是父親以前曾經因為賭賽鴿，賭到家裡貴重物品都拿去變賣，到處跟親戚借錢，她形容那時候的經驗就是「恐怖」、「很危險」。蒂蒂詳細向我談了當時父親因賭賽鴿慘輸後的處境：

他，那時候賽鴿的時候輸很慘。然後我媽去作保，去當他的保人這樣子。那時候應該是我高中的時候，我第一次覺得，很危險，就那種恐懼感是…我媽不能不當他的保人。因為我爸會給我們家錢。（媽媽）不當（保人）就沒錢。但是，其實那錢不多。就是通常我媽…有時候也不敢去（跟爸爸）要錢，或叫我去要。因為我爸比較喜歡我。然後我就會跟我爸說，現在這學費幹嘛幹嘛的。高中以前，國高中的時候。然後我爸就會說好，然後就會匯錢給我媽。然後也有



時候是我爸會突然音訊全無，就是會突然沒有消息，然後我媽就會去找我阿姨，我阿姨就會幫忙我家這樣子。然後我媽就可能會去做飯糰。就一不穩定的時候就去做飯糰。但現在都沒有在做飯糰。

即便如此經濟來源不穩定，母親又與父親分居，卻沒辦法靠母親出去找有穩定收入的工作賺錢，只能偷偷以像是前面提到的賣飯糰，或去夜市賣手工娃娃的方式賺錢。因為父親的性別意識型態下，非常排斥抗拒母親出去找工作：

我爸還是會給我們家錢啊。他還是有扶養我跟我妹的義務啊。但我爸又會不、想、要、我、媽、去、工、作。我爸是那種很傳統、很傳統就是，重男輕女，欸也沒有，他重男輕女倒是還好一點，他對我跟我妹不會到那種重男輕女。他會對我跟我妹說，喔，「去讀書、去讀書」，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對我媽就不是。對我媽就是，「啊哩查某人讀瞎咪冊？（你女人讀什麼書）」

甚至會要求母親扮演好「家庭主婦」的角色，父親才肯拿錢回來給家裡用，蒂蒂覺得對父親而言，媽媽比起母親，彷彿更像是爸爸買的「台傭」：

我爸就是會（要求）我媽待在家裡面照顧我們，接我或是我妹上下學。但我沒有啦，我都自己一個人（上下學）。只有這樣子我爸才會給我錢。我爸那時候是跟我媽說，「如果你要出去工作的話，你自己養活自己就好啦！不用我啦！」這樣。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媽好像是我爸買的一個什麼…台傭？對。就他不准我媽出去工作。但其實我媽有（打零工）啦。

在這樣的條件下，蒂蒂和小威、瑞雯類似，也有對於錢立即、穩定需要的意識。即便母親說，不需要她管家裡的錢的問題，蒂蒂仍然有想要去賺錢貼補家用的念頭：



我媽會說她不需要（我管家裡的錢），但我又感覺到這個家可能需要我啊。因為我可能覺得我身邊的人都在工作啦，然後我想要快速地擁有錢，我想要那個錢就是在我手上。我要握得到它們。或是我至少在我的存簿看得到那些數字。但是我沒有。我不斷地在消費。不斷的在花錢。賺的錢又花光。

持續的經濟困窘，使得蒂蒂的日常生活為了貼補家用過得拮据：

那個經濟是，對，我可以養活我自己。然後我也可以就是，我…我可以就是自己吃，就是像吃吐司啊、吃泡麵啊，我覺得都 OK，就是，我在吃上面我可以很省。而且我平常沒什麼物慾，頂多偶爾想要看個電影奢侈一下。可是如果說我把這些時間拿來賺錢呢，那我就可以貼補家用了欸。就是我就不用聽我媽說這個月又怎樣怎樣怎樣了，然後又要跟誰誰誰借錢了。

對子女來說，由於客觀上難以自外於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況之外，有責任要去分擔家計；但是在難以清楚認知家庭的財務狀況，或是家庭財務狀況超出自己控制範圍的波動劇烈，造成子女的不安與焦慮感。同樣的，在經濟不穩定的家庭裡，為了穩定家庭經濟而自我犧牲的狀況仍在發生，限制了子女的生涯發展可能性。

雖然家庭的經濟困窘往往限制了子女追求自我發展的機會，但是也有時反而因為也壓縮了父母對子女的期待，給予子女一些不必符合理想生涯想像的空間。例如，家裡從事農業，經濟條件緊縮的小芬說，雖然已經接近 30 歲，被父母逼婚的壓力卻不大，原因是因為父母擔心如果有了對象，對方沒辦法接受小芬家的家境不好：

父母會問說，怎麼最近不找個穩定的對象。就是可能，之前都斷斷





續續的嘛。他可能就會覺得說，你也快三十歲了，你應該要有個穩定的對象。可是我媽媽，後來自己也是有講說，就是家裡的狀況是這樣（不好），如果你去找另外一半，可能人家對我們家的觀感也會影響很大。她就很怕說，會影響到你的夫妻之間的生活。所以就是，媽媽後來也會覺得，心裡很急，可是又會覺得家裡的狀況一直沒有到很好。就是沒有也沒有關係。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家庭收入不豐沛的雷恩身上。雷恩表示，父母基本上沒怎麼問過結婚之類的事情：

一個原因可能是覺得，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也沒什麼資格跟人家談結婚的事情。我覺得他們可能會有這種想法。像我媽有一次我記得，有一次跟我講聘禮的事情，說聘禮很貴啊什麼的。然後我就想說，其實現在很多人，我現在知道，就是男女雙方互相約定說要不要聘禮這件事情。然後我就覺得，其實對於結婚這件事來說，其實也許他們有點傳統，然後也沒有那麼的浪漫。

在這一小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家庭經濟狀況的匱乏如何侷限了子女的生涯發展。為了成全父母階級向上流動的期待，高學歷子女有必要將穩定家庭經濟優先置入自己的生涯發展考量中，從而限制了自己的發展可能性，也形成不小的經濟壓力。相對於經濟條件小康以上的家庭，經濟匱乏家庭的子女可以說是在起跑點就多背了一袋沙包。但父母的期待並不會無限上綱，由於求助者身分的道德低位，有時反而也限縮了父母對子女期待的力道，轉為更隱晦或鬆手的態度。

## 二、拯救者的困境：階級翻身的期待與現實



在台灣的家庭主義代間關係的邏輯下，父母的經濟條件困窘，子女往往在倫理和情感上需要肩負起父母處境的責任。即便父母或任何人都不明講，子女都仍容易內化一套「自己與父母的榮辱一致」的心態。當自己身為高學歷的子女，得到父母或社會期許階級向上流動的潛在可能性，就受期待披上英雄的斗篷，為改善家境而付出努力。

然而，當子女獲得高學歷，準備要進入勞動市場的時候，現實的考驗就來臨了：高學歷真的保證得了子女能夠扛起家庭的重擔階級翻身嗎？在前一章，我已經提及高學歷所蘊含的地位象徵，讓第一代大學生的父母和他們自己都感受到相當程度的肯定與承認。對他們而言，身為第一代大學生，將來晉升中上階級是社會某種程度上「理應」藉由第一代大學生獲得的高學歷應許他們的獎勵。然而，即便高學歷可能帶給第一代大學生改變家境的潛力，潛力依舊不等於能力，尤其當子女實際面臨困境時，他們不見得能發揮出自己的潛力，此時反而會認為自己失能、無能而感到挫折。

另一方面，誠如前一節所述，其實在這樣的階級背景下，子女承擔的壓力是十分沉重的，所面臨的侷限感與不安也十分嚴峻。因此，高學歷子女不一定甘願當拯救父母的英雄，可能選擇逃避。當眼見成為拯救父母的階級向上流動神話幻滅時，有些高學歷子女會反思自己在學歷至上社會當中，被賦予的期待是否其實是一種「假希望」，而對教育向上流動帶來階級向上流動的通俗想像提出犀利的批判。

#### (一) 對階級翻身能力的自我懷疑

當家庭經濟困難的第一代大學生越是到需要面臨所謂「現實」的經濟與就業



環境的時候，他們就越是容易憂慮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高學歷所承諾的「能力」，能夠階級翻身，幫助父母脫離貧困。

對於蒂蒂來說，救媽媽是一段銘心刻骨的心理歷程。在前一章中，我提過蒂蒂其實並不是自願一直往上唸，而是在代理實現母親的讀書夢。蒂蒂知道自己相對於母親是有能力唸書的，但越是往上唸，蒂蒂其實越是懷疑自己能力不足，以至於研究所生活過得相當坎坷挫折。同時，由於曾經和母親激烈的吵架造成「大決裂」，以至於母女間難以坐下來敞開心胸對話。可是，心中想要救母親的念頭又一直縈繞不去，成為她進退維谷的心理矛盾：

我覺得除了我的伴侶之外，我媽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有時候我會覺得我要把她救起來，對，我要救她。就是…我覺得我要救她。因為我覺得她可能過得很痛苦。因為她不敢在我面前哭。然後，她之前不知道看了什麼片子，就是國片吧還是什麼，那種很慘的片。然後我媽哭得唏哩嘩啦的，跟我妹一起看。然後還跟我妹說，不可以跟我講。我媽不會在我面前流眼淚，幾乎沒有。但是那個大決裂有，對。但是大決裂之後我幾乎沒有印象，她幾乎沒有在我面前哭。大決裂之前哭是我外婆去世的時候。那時候我媽跟我講了一句話說，我媽就說，「我媽從來沒有穿過一件好的衣服。沒想到穿到一件好衣服的時候，是已經躺在棺材裡的時候」。就我媽對我講。當下我就覺得…好難過喔。而且那時候我才國小而已。就那種難過很深沉。就是我現在就是想到我媽，時常想到我媽講的那句話。然後我就會想到，我什麼時候才可以給我媽好日子過？就是難道也要等到她…就是穿壽衣的時候嗎？對啊。可是我又好像沒有那個本錢讓她過好日子。我自己也都過不好了啊。



即便蒂蒂心中深刻的想望是能夠把母親從貧困之中「救出」，但這樣的想望又會反覆地面臨自我質疑，好像繼續努力讀書就有潛力救她，但又覺得自己實際上沒有能力救她，懷疑自己沒有資格，心中一再糾結：

救她當然是…但我沒辦法救她，我沒資格救她。但是讀書這件事情是我可以讓她開心的。救她是…我沒有辦法救她了。雖然我想救她，我要救她沒錯，對，我要救她。可能就是…可能頂多就是金錢上吧。因為我知道我沒有辦法用真感情對我媽。我覺得我沒辦法。就在那大決裂之後我們甚至不說晚安了。然後，不再有一些親密的肢體接觸了。

蒂蒂糾結的關鍵在於，她雖然知道對母親來說，能夠讀書是讓母親開心的，而且是因為母親相信蒂蒂讀書可以改變家境。但蒂蒂心裡卻不相信這件事，她知道自己去讀書，但是去讀書不代表自己可以「救母親」，因為要真的成為中上階級，才能夠改變母親的經濟困境。對蒂蒂而言，讀書這件事隱含的內在衝突就在於此，於是越是讀書，反而越讓蒂蒂不敢相信自己有那個資格、有那個能力能夠階級翻身。

因此，即使有拯救父母的意願，越是成長到接近要承擔起那個責任的時刻，越是容易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那個能力，將父母從努力一輩子都未能脫離的貧困處境中拉出。前一節中提過的瑞雯就無奈地說：

以前可能覺得是很遠以後的事情，而且會覺得自己好像有能力可以做這件事情（養母親和阿公阿嬤）。但現在越來越近就覺得，自己可能不一定有能力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誠如本章中所述，在父母低學歷的經濟困難家庭裡，子女的學業表現突出往往會燃起父母，甚至子女自身階級向上流動的希望之火。因為人們相信，會讀



書、取得好的學歷，代表著未來光明的前程，以及階級翻身的美夢成真。然而，隨著子女長大成人，他們往往逐漸發現現實不像是童話故事，不是只要會讀書就可以輕易階級翻身。瑞雯帶著半戲謔的語氣談起：

我那時候（高中以前）就很明確就覺得，自己一定要唸台大，才找得到工作（大笑）。……我覺得以前，真的比較相信，就是好像，拿到一些好的標籤之後，好像人生就會少了一些困難，或是那樣子就代表你是一個成功的人。但現在不會這樣想。現在會覺得，人生最重要的也不是成不成功這件事情。或是人生不是階段性，而是一個一直進展的過程。

瑞雯在上大學以前，曾經相信進入最頂尖的大學、獲得最好的身分標籤，人生就會一帆風順。但真的進入頂尖大學之後，她反而不再相信階級翻身是一段線性的過程，頂尖大學的學歷也沒有真的必然保證什麼，人生依然是需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拚的過程。

在我的受訪者中，有部分像是蒂蒂或是瑞雯這樣的子女，傾向反求諸己，懷疑高學歷沒有真的等同於他們所具備的能力，或是蒂蒂所說的「資格」。也有一些受訪者像是下一小節中我所要談的，他們質疑他們一直以來相信社會應許高學歷的報酬，是不是其實在現今社會環境下，到頭來是一場空。

## （二）質疑階級翻身的幻夢

取得頂尖大學的學歷，實際上並不等於拿到一張晉升菁英階級的人場券。勞工階級的出身不會輕易磨滅，尤其是父母越是貧窮、越是經濟不穩定，子女就越難以自顧自地飛往自己心之所向的天空翱翔。勞工階級背景就像是一道透明的



牆，當子女努力往上飛時，直到有一天終於不慎撞上，才發現自己始終不屬於天上世界（菁英階級）的一份子，甚至開始懷疑為何當初人們要讚許自己有一雙好像能飛的翅膀。

在海倫的認知裡，她藉由家族史的敘事理解，對於階級流動的可能性產生懷疑。父母從事清潔勞動工作的海倫，憑藉著自己的才能與智識，不僅取得頂尖大學的學歷，在社會運動及 NGO 有活躍表現，也是家人遇到麻煩事時重要的諮詢對象。但是，由於海倫家的祖先後代分成了不同姓的兩家，而另一家正好繼承到台北市的黃金地段土地，後代子孫過著富裕的生活。未能得到祖蔭的海倫父親，則一直從事著幫該家人持有的大樓倒垃圾賺錢的工作，而且海倫和兩個兄姊從小到大都一直要幫忙父親一起倒垃圾，這讓海倫始終耿耿於懷。

即便至今，家裡的經濟條件已經較有改善，父親還是繼續做著這份倒垃圾的工作。每當海倫去幫忙倒完垃圾，都必須透過洗澡除去身上的臭味，也同時象徵性地除去階級恥感：

對他來說，這就是也是一筆收入來源啊。他還是也是靠多兼一份差，才可以讓我們這樣活下來。可是我這件事的確在三個小孩裡面都是滿厭惡的。甚至，我會有一種深深的感覺是，即便我書唸了這麼高，我還是持續去幫他倒垃圾的時候，我會有一種感覺是，我永遠沒有辦法翻轉我的階級。那個感覺是很無力的。就是我永遠還是，繼承他這個階級。就算唸了那麼多書、唸到這麼高，我還是得幫忙倒垃圾。這已經不是一個孝順的心態了，就是一個…天生就會，好像，努力唸書也沒有辦法改變。所以這件事我很抗拒，甚至我每次回去，因為垃圾會有味道，我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因為我會覺得，就算我的伴侶，在我做完倒垃圾也不可以碰我。



在本章序言中提到的克洛，由於整個家族學歷都很低，甚至祖父母輩還有文盲。因此，家族對於小孩的教育期望基本上並不高，小時候的他甚至半開玩笑的把升上好大學看成進入「另一個天堂」：

我本身就對於升學這件事情，本來就沒有放太多希望。我曾經開過一個玩笑就是說，我們國中啊考高中，老師都說啊，第一志願是、考上高中就是天堂了。但其實啊，高中因為還要考大學，所以其實高中存在的意義是讓你去追尋「另一個天堂」。那陣子剛好就是王力宏出一首歌叫「另一個天堂」。

克洛所談的「另一個天堂」呼應了本章的標題，獲得高學歷的經濟弱勢子女就彷彿站上像是天堂的懸崖，好像階級向上流動就在眼前，一觸可及，往前一步卻發現自己站在懸崖邊，岌岌可危，隨時可能向下墜落。

克洛進一步繼續談到父母給予的「取得好學歷就等同於取得好工作」的想像，如何在他自己進了大學、認識社會之後一步步破滅，卻又難以讓父母理解自己心中幻滅的緣由：

他們會覺得學歷這種東西很有用。會讀書的小孩子，怎麼可能找不到一個好的工作？雖然他們後來也是知道，尤其是我爸、我媽他們多多少少都知道，還是有跟社會接觸，知道現在工作真的不好找。尤其是我讀文科的。所以，他們就是希望我努力撐完，然後進電視臺工作，這樣就好。但是，我跟他們比較斷裂的一個東西就變成就是說，我上了大學之後就更加體會到，而且是臺北，不管是政治啊、經濟啊，還有很多就是社會的運動，這些東西的脈動。這些東西在臺中可能都是一片風平浪靜。可是，對我們來講，卻是第一線。例如說太陽花衝進立法院的時候，我也有衝進去。……更大的



割裂點就是在就是說，他們有一段時間會覺得就是說，我怎麼會這麼悲觀、悲觀到就是，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那是 318 過後，大概 2014 年 5 月吧，我在宿舍裡面，自己有一天突然默默的算著，連勝文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董事長，可是我呢，我想想看喔，我 22k，假設呢，我以後出社會之後，一個月花 10000 塊在房租上面，我吃飯用度也花 10000 塊，我只剩下 2000 塊。然後假設這 2000 塊我還可以實領，我不用扣任何的東西，那時候我還沒算到這些東西。那就算這樣子，我可能就已經生活很困難了。那如果說我一個月領 22k，然後不吃不喝什麼東西，過著像神仙一樣的生活。我累積一整年下來，實際的所得是多少呢？然後我要累積多少年，我才有辦法得到一棟房子，或是得到一個體面的生活呢？

雖然克洛所描述的狀況，也許是當代年輕人所共同面臨的青年貧窮困境<sup>6</sup>。但是，由於克洛出身貧窮、曾經靠著相信能夠靠讀書進到「另一個天堂」而一路考上頂尖大學，直到上大學、開始工作之後，才發現學歷並不是一切，希望和失望的懸殊落差造成更大的打擊。再加上父母依然抱著素樸的「會讀書就有好工作」的想像，使得克洛面臨的困境難以得到父母同理，獨自面對失落讓克洛憂鬱症的困擾更形加劇。因此，克洛才如序言中的引文，控訴學歷至上社會給的「假希望」太大了。

因為父親早逝而家庭經濟條件欠佳，現在仍是中低收入戶的安尼，不同於克洛在進大學後才領悟「假希望」，反而在年幼時就展現出早熟的特質，看穿了學歷至上社會的黑暗。安尼在國小時，以邱妙津的《鱷魚手記》當作讀書心得報告

---

<sup>6</sup> 張宜君（2017）的研究可以呼應文中克洛對於不同世代工作機會與勞動報酬的不均等的描述。該研究指出，「年輕世代勞動者接受高等教育比年長世代的勞動者低」（張宜君 2017: 91）。





的讀物，她印象深刻自己引用了書中一句很經典的話：

在這個城市，人們活著只為了被製成考試和賺錢的罐頭，但十八歲的我，在高級罐頭工廠考試類的生產線上，也已經被加工了三年，雖然裡面全是腐肉。

安尼以世故的口吻接著說：

我才不想要當跟大家一樣的罐頭呢。我覺得我爸早死的這件事情也影響到我的人生觀是，如果我真的有一天我突然死掉的當下，我的人生跑馬燈跑出來的時候，我問我自己，你這輩子到底幹什麼東西的時候，我不希望我沒有答案。我很常在思考死掉這件事情。我很常在思考我死掉的那個當下是怎樣。或是哪一天，我會怎麼樣死掉之類的。

對於階級翻身這件事，安尼看得比克洛還來得更市儈。從上大學以來，她就拚命的打工，當家教、修電腦、組電腦、賣電腦，甚至還習得平面設計的技能來賺外快。全盛時期一個月可以賺到5萬。雖然代價是整個學期修的學分只過了一半多一點，剩下全被當了。因為對安尼而言，學歷並不能保證階級翻身，比起學分她更在意自己怎麼經營人脈、怎麼累積技能。安尼雖然不唸會計系，但自己默默上了一堆會計系的課，又找了會計事務所的實習，她把會計的技能，而不是自己的本科學歷當作自己未來發展的前程。

階級翻身的是學歷至上社會中，透過教育機會給予低階級出身的人的夢想。然而，取得高學歷真的就能夠如願階級翻身嗎？其實故事並不是如此的單純。在受高等教育後，市場社會中的現實並不允許高學歷輕易的轉換成報酬。當進入市場社會競爭時，勞工階級或貧窮的階級背景仍然會如同從背後伸向這些高學歷子女的手，拉住他們的衣角，提醒他們不要忘記自己的階級出身，同時也讓躋身中

產階級的路走得更加艱辛。



### 三、小結

在台灣，進入好大學取得高學歷，往往被認為是意味著通往人生的康莊大道。尤其在低學歷父母的家庭裡，高學歷的子女往往是父母的驕傲與期望的寄託。在前一章中提及的學歷情結，在本章中的經濟困難家庭裡，進一步變成高學歷子女沉重的負擔，甚至讓他們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資格擔起這個角色，為父母、為家人脫貧。

首先，曾經滄海難為水，高學業能力讓第一代大學生子女們得到想像自己「做自己所愛」的機會，但是經濟困難的現實卻又把他們拉回，使他們掙扎糾結。再者，在經濟困難家庭中的子女很容易產生風險意識，侷限自己生涯發展的可能性，把穩定家庭的經濟擺在優先順位，但卻同時可能為了不知道何時能填滿的不透明的無底洞而不安。據此，對於自己是否能勝任拯救父母的角色，子女也開始感到焦慮、自我懷疑。市場社會的現實最終也不會直接給予高學歷預想的那麼多的特權，尤其對於高等教育報酬減少的青年世代，青年貧窮的議題險峻，這些子女們更容易質疑階級翻身是不是只是學歷至上社會所給的「假希望」。

在本章與前一章分述低學歷父母家庭裡高學歷子女的困境的兩個面向後，在下一個章節，我將分析這些子女們會採取怎樣的策略性行動來因應困境，調和自己和父母的親子關係，以及為自己的生涯發展製造可能性空間。

#### 第四章 協商理想親子關係：子女親子互動中的距離策略



在前兩章中，我分析了高學歷子女的認知中與低學歷父母之間的學歷差距，如何在親子間的互動中成為溝通的阻礙，讓親子之間難以互相理解和認同；以及在這些家庭之中，經濟困難的家庭裡，對子女透過教育達成階級翻身的期許如何成為子女的龐大焦慮源，甚至質疑教育是否真的有促成階級翻身的效果。分析完以上兩個面向的子女困境後，在本章中，我將進一步分析這些子女如何想像理想中的親子關係與現實的落差？他們又會採取怎樣的互動策略來因應調適？親子之間會如何重新協商出新的互動秩序？

面對有學歷差距的親子溝通困境，子女並不會被動地承受，而會主動採取互動策略來因應，以改善親子關係品質，或是避免親子關係的惡化對彼此造成負面影響。例如在蒂蒂的眼裡，隨著她教育程度越來越高，年紀漸長，她越來越會站在一個高度看母親。在吵架時，母親的情緒往往表現得十分激動，但蒂蒂反而越來越習得用冷靜以待的態度反應，試著把衝突從情緒的正面碰撞，拉到理性的討論是非。然而，其結果常常是更激怒母親：

我就說，「好，我下次會改。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在說什麼了。可以了」。然後我媽就說，「你現在是什麼態度？今仔是啥物情形啊？（現在是什麼情形啊）」。然後我就說，「你可以先冷靜下來嗎？」噢，這句話千萬不能講。我一講「你先冷靜下來」我媽就會更火大。然後我就會忍不住地跟她說，「你要不要想一下你剛剛到底在幹嘛？你的情緒，還有你整個人反應會不會太誇張？」我就這樣講。我媽又在更 *lih-kông*（抓狂）。我媽有時候還會被我氣哭。因為我不斷的就是，她可能想要掀起我的情緒，不管我生氣也好，或是她想看我哭。但我



就是沒有。

其實，在我的訪談中，這種由子女發起的就事論事、理性溝通的對話方式，常常會非意圖地刺激到父母，反過來彰顯出不擅長用這種方式說話的父母的情緒化與幼稚，製造出親子之間的階級隔閡。

察覺到自己就算正面積極地和父母溝通與說服，也沒辦法或是不太可能有效地把父母拉到自己習慣的言說場域的時候，許多子女會採取消極的區隔策略，把父母隔絕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之外。子女常常以各種說辭來蒙混過關，不讓父母進一步深入了解自己，例如身為女同志的蒂蒂就以「單身是自我培力」、「我不想那麼早被困住」等等的論調，強調現代女性單身也可以過得很好，以緩和母親對於怎麼不交男朋友的質疑。同時，這也是因為蒂蒂深知母親的處境：父親長期漂泊在外，母親近乎以單親的模式扶養蒂蒂，卻又沒有求職的自由<sup>7</sup>，婚姻對母親而言是一段人生的箝制。蒂蒂悠悠地談起：

我還是這個論調。同時也是避免我媽覺得我是同性戀，雖然她可能有發現，或她還在（懷疑），怎樣我不知道。但我就是會用一種，單身主義的那種，對啊。我會覺得我單身沒什麼不好。我這樣過得很快樂。我會強調「快樂」、強調「自由」、強調「我還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對。因為我媽一定深刻體會到（宇修：沒辦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對。

然而，將母親隔絕在自己的女同志世界之外，導致母親沒辦法同理蒂蒂的同志認同形成的過程，也無法共享與女友相處的點點滴滴，疏遠了親子關係。在有些子女遭遇嚴酷的生涯難題時，沒辦法好好和父母分享加劇了他們的無助，關於這一點可以在本章中進一步看到。

---

<sup>7</sup> 詳第二章第二節第二小節中對於蒂蒂母親處境的說明。



從蒂蒂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子女採取的兩種形式策略：積極納入和消極排除，我將在本章中，進一步闡明子女們如何採取這兩種形式的互動策略，以及親子之間又如何依此協商出彼此之間的互動秩序。然而這些子女的互動策略並不僅僅是一般的親子間的折衝，而是建立在第一代大學生子女想像的理想親子關係的前提下，與實際的親子關係的磨合。

在本章中，我將詳細分析社會階級如何透過第一代大學生子女對於理想親子關係的想像，折射到他們應對與父母之間的相處的機制，並指出階級化的親子距離策略如何對親子關係產生非預期的後果。在第一節中，我會揭示子女們的理想親子關係如何體現出學歷所象徵的階級秩序。第二節則是進一步闡明他們如何將這兩種親子距離策略階級化。

### 一、中產階級中心的理想親子關係想像

親子關係並沒有理想的腳本，也不容易經常觀察到別人家庭的親子互動，但人們會透過從周遭同儕的敘事或是偶爾和同儕的家庭相遇，產生對於理想親子關係的想像，並以此檢討自己與父母關係的「不理想」。然而，對於親子關係的理想投射，往往同時受到社會結構力量的左右。如同藍佩嘉（2019）指出不同社會階級的父母會在親職場域中想像其他階級的父母的教養策略，而採取不同的教養方式作為其保安策略。第一代大學生子女們對於理想親子關係，也展現出階級化的想像。

出身於南部農家的小芬上了大學之後，得以認識來自台灣不同地方、不同階級背景的家庭出身的同學及朋友。在小芬的眼裡，大學的朋友和父母之間有著更親密、更有助益的關係：



(同學家的)氣氛的話，都算滿融洽。可能同學可以跟爸爸媽媽鬥嘴的那一種。然後可以聊很多、很多、很多私事，不是關於自己的事都可以聊。然後工作上、課業上有困難的時候，他們的爸爸媽媽還可以幫助他們。我就是覺得，有可能，因為我有很多同學的爸爸媽媽他們本身就是公務人員或是老師，或是，因為我大學朋友很多都是台北人。就是，家庭狀況比較 ok。所以他們可能會一起出去玩，就會比較融洽。然後，會覺得就是北部的爸爸媽媽，我不確定是不是只有北部啦，就是我覺得就是那些是公務人員或老師的那些朋友的爸爸或媽媽，會花比較多時間在家庭上面。可能因為工作時間是固定的吧。就是很穩定。所以他們是假日有空閒，然後晚上又很空閒，所以他們就可以帶他們一起出去玩，或者是可以花時間陪伴他們。然後又可以教他們功課。

小芬以「家庭狀況比較 ok」來形容她眼裡看到的那些「公教人員的」、「北部的」父母。她相信這些父母比較有空閒時間願意花在子女身上，因此他們和子女有更親密的關係。同時，公教人員的背景也讓他們更能在子女的工作和課業上提供協助。話鋒一轉，小芬解釋因為農忙的緣故，務農的父母和自己的關係顯得缺乏交集：

可是我爸爸媽媽不太一樣。因為我們家是務農的，所以，他們很常就出門。然後很晚才回來。可是那時候晚上的時候我可能去補習，然後我回來就要睡覺了。然後因為他們隔天要去務農，所以他們也很早睡覺。因為我們家大概七點多、八點多，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就都在睡覺。鄉下都這樣。滿早的。後來因為有看電視，他們就比較晚。可是還是很早睡。然後六日他們也要去田裡，然後可能我們可



能要去田裡幫忙。所以我們生活空間都是在我們家附近。

上大學的經驗讓小芬得以認識來自都市、來自中產階級的同儕，讓她得以想像另一個社會階層裡，有些家庭經營著和自己的家庭完全不同的親子關係。在伊可的經驗裡，她則是實際和男友的家人相處過。看到男友親子關係像是朋友、父母家事分工平衡，她視之為理想，並歸因於男友家庭的高教育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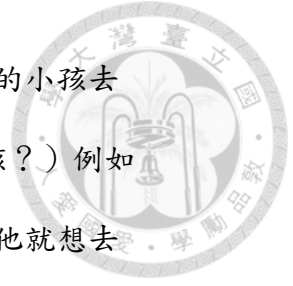
噢，我男朋友的家庭就是一個，嗯…非常…就是我理想中的家庭。

就是，爸媽跟小孩們都是好朋友，然後，他們坐在一起，爸媽會一起做家事，爸爸媽媽都有。當然我覺得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男朋友的爸媽都是高教育份子。而且，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然後他們都是在社會上做一份滿高等的職業。所以他們家的小孩也都是，教育程度很高，然後，嗯，他的阿公阿嬤也是教育程度很高啦。

在這些第一代大學生子女的視角下，中產階級家庭經驗對自己而言是陌生的，但又因為相信中產階級父母能夠給更多資源、也願意投入更多時間在子女身上，因此中產階級的親子關係會顯得更親密及能夠溝通。相形之下，當自己和父母之間原來就沒有建立起親密的關係，再加上因為相異的生活經驗難以共鳴，就會反過來將自己的親子關係經驗指認為不理想的。

因此，不同階級相遇的經驗會迸發出對於不同於自己家庭的「理想家庭」的想像，在我的訪談中，常常以一種經驗作為典型的階級相遇敘事：出國。對於許多第一代大學生子女而言，出國的機會並不容易，更別說還要選擇自己何時出國、要去哪個國家。安尼告訴我她和她「家住在忠孝東路四段旁」的好朋友，如果想要出國唸書，會有多麼不同的際遇：

我基本上有問過他「你跟你爸媽的觀念有沒有衝突？」他說滿少的，可能尊不尊重小孩意見…應該說，當你吃不飽你的選擇就變



少；如果你的經濟狀況好，你就有更多空間可以去容忍你的小孩去做其他決定。（宇修：所以你覺得他爸媽比較尊重他的小孩？）例如說他想要去日本唸碩班，他媽就問他為什麼不去美國？但他就想去日本，所以他媽就覺得想去日本就去日本吧。如果是我有出國機會，我媽不會讓我選擇去哪。甚至要我不要出國。

出國作為一種想像中代表著中產階級的經驗，也讓一些子女把理想的親子關係與想像中的「國外的」親子關係連結在一起。小波談起自己理想中的親子關係，他想像一種國外的、個人主義式的親密互動模式：

我覺得國外那種親子關係我還滿嚮往的。就是，你在各自生活的時候，比方說，當你出去工作，或是當你離開這個原生家庭的時候，你不會有什麼特別的連帶，你不會心中有那種，對於家裡的牽掛。因為像我現在就覺得說對家裡就是有牽掛在。這種牽掛讓我一些事情上就會有一點難以抉擇。像他們那樣子就是，比方說出，子女出社會之後就跟家裡面可以說，各自負各自的責任，各過各的生活，但當你在過年過節的時候還是可以碰面、然後還是可以很緊密，我覺得這樣對我來說就很好。

由於理想的親子關係建立在對於中產階級親子關係的想像，第一代大學生子女容易將自己原生家庭的不緊密、溝通層次的不一致，當作是不理想的親子關係，而成為想要改變或是想要脫離的對象。在下一節中，我將指出這些子女們如何採取階級化的親子距離策略，以積極納入的方式試圖將父母拉往自己的世界及自己理想的親子互動，或是以消極排除的方式試圖脫離自己認為不理想的親子關係。



## 二、階級化的親子距離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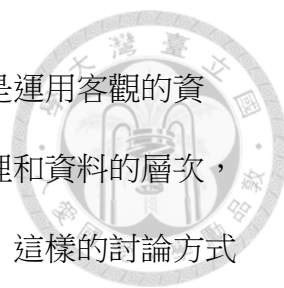
當指認自己與父母的關係為不理想的親子關係時，這些第一代大學生子女會採取兩種不同的互動策略，來重新協商親子關係。這兩種不同的互動策略，皆是在動員自身的階級資源以調整親子之間的距離，包括心理上的、社會關係的距離，也包括實質上的物理空間距離。第一種是積極納入的策略，展現為子女想要用自己的論述和認知模式讓父母理解、承認自己的觀點，或是採取自己溝通的模式，以讓父母進入自己的生活世界。第二種則是消極排除的策略，展現為子女運用資訊的落差，以話術來應付父母，或是乾脆讓父母無法知情，隔絕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之外。

這些互動策略雖然看似在任何類型的親子關係中都可能採用，但在第一代大學生的狀況中，尤其會將親子距離策略階級化。積極納入策略挪用的論述和資料往往對於低學歷的父母而言是陌生、不熟悉的，甚至會激起父母的階級羞恥感，以至於難以順利橋接父母與子女之間相異的生活世界。消極排除策略利用的資訊落差，則經常是奠基在中產階級比較能近用的資訊，但子女越是把父母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之外，反而越讓自己脫離家庭的安全網。

在本節中，我將詳細論述積極納入與消極排除兩種親子距離策略，以及指出第一代大學生子女如何將其階級化，並使得這些親子距離策略製造出更多的親子關係危機。

### (一) 積極納入：論述與資料的運用

面對父母詢問或介入自己的日常生活或生涯抉擇，或是父母的價值觀與自己



的價值觀迥異時，高學歷子女擅長使用論述，給具體的理由或是運用客觀的資料，來討論或說服父母同意自己。不過，把討論的戰場拉到論理和資料的層次，其實是有利於高學歷子女，對低學歷父母而言不熟悉的。因此，這樣的討論方式其實不利於溝通，往往會中斷溝通。其過程更像是子女非意圖的在做階級：彰顯自己的學識能力，暴露出父母的「不理性」或「情緒化」。

例如，對於愛咪而言，憂鬱症轉為躁鬱症是相當大的震撼，她很希望家人能夠理解自己的處境。然而，即便努力的查資料，印文章給母親和姊姊看，家人們仍然不接受躁鬱症的生理基礎，依然深信只是愛咪自己想法有問題，讓愛咪非常挫折：

躁症出現的時候，讓我很驚嚇的部分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我有無法控制的事。就是除了輕生以外，還有一種無法控制的東西，它讓我覺得很可怕。所以那個時間點，包括醫生跟我說從此以後都必須吃藥了，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就好像是一個宣判說，沒錯，從今天開始你就是一個精神病的病患。就是你真的被認證說你就是一輩子必須是一個病患。而且某個程度其實我要去申請身心障礙手冊我也可以申請喔（笑）。那對我自己的衝擊很大。然後又回頭去跟家裡溝通的時候，就變成家裡人他不能接受。他們覺得這完全是你自己想法的問題。他們覺得你自己鑽牛角尖。然後那時候，我說啦，我嘗試想要印一些文章給他們看，但是他們就是連看都不想看。

海倫則是經常相當積極的想要「糾正」父母錯誤的認知和觀念，不過結果常常是父母有聽但很難達到對等的談話。海倫以如果在電視上看到一起竊盜再犯的案例為例，會和母親發生怎樣的對話：

假設有一個人很窮，然後他去偷了麵包。所以他又再犯，又被關回



去。那她可能會說，「怎麼又去偷拿東西」(台語)，我就說，「啊你怎麼知道人家是真的很窮，說不定他出來找工作找了很久然後都沒有找到工作，然後不得已他才偷了一個麵包，才回去坐牢」。然後我媽就說，「噢，有可能」，或是就不講話。

這樣的假設狀況反映了其實當海倫以講理論述的方式討論時，和母親的對話反而是沒辦法一來一往的，只能單向的傳達。但這也不代表母親真的接納這樣的論點，更像是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父親的方面來說，海倫則是很不滿父親總是固定看同一台新聞台，會去遊說父親要有多元的新聞來源，甚至直接轉台。不過結果常常是父親回房間看自己的電視：

就我不爽我就會講。我就說你(爸爸)怎麼又在看這一台！然後，就，之前例如說318結束之後，我就說，「你可以不要看中天嗎？」我就這樣跟他講。我說，「你每一個(新聞台)都要看哪，你這樣子很偏頗」。然後後來，我們家就比較常看的是壹電視這樣子。……因為我們家有兩台電視，客廳有一台，然後房間有一台，他可能就會回房間自己看。

海倫深知自己的高學歷為自己換得了家裡的話語權，甚至讓她得以去譴責小時候常常打小孩，以至於和小孩之間有芥蒂的父親：

我說，「對啊，誰叫你要讓我唸那麼高、唸那麼多書」。其實我現在是可以這樣跟他們講話的。甚至那時候他在跟我抱怨說，我姊姊為什麼不能原諒他，就是小時候的事情。因為我姊姊對於我爸如果喝酒之後要跟她講話，我姊是會拒絕的。因為我姊姊會覺得他好像還是隨時要揮拳什麼的。……他說為什麼我跟哥哥都可以原諒他，但



是姊姊不行？然後我就說，「你從小打我們打得那麼兇，你憑什麼要我們原諒你？」我就這樣回他。我就是用這種口氣。然後那一次是我難得，應該第一次還第二次，看到我爸就是，很像很委屈還什麼的，就漲紅臉，覺得自己很羞愧的那種表情。然後他就不說話了。……對我們這三個小孩來說，這件事是很大的事情。就我們永遠都記在心裡。可是我以前沒有那個能力跟話語權去質疑我父母親。越到現在我就是我們家整個這樣的角色。

子女會運用論述能力來試圖讓父母理解或甚至肯定自己的認同與立場，還包含各種其他面向的觀念。例如伊可相信自己（和妹妹）獲得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犧牲了為家裡工作的哥哥和姊姊換來的。因此，她對於自己要反饋家庭，改變全家人的觀念和意識抱持強烈的責任感：

我覺得我，獲得的教育資源，已經比我哥哥跟我姊姊多很多。就我覺得，嗯…我跟我妹妹可以這樣讀書是因為有我哥哥跟我姊姊，他們留在家裡幫忙工作。就他們那個時候被我爸強迫留在家裡工作。那時候也是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太好。所以感覺有點犧牲他們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權利，來成就我們可以唸比較好的學校這樣。…如果我們接受了在學校學到的這些東西，回去跟他們分享之後，或者是跟他們說哪方面訊息，他們就會特別在生活中留意，可能他們在電視上看到，或者是在報紙上面看到的東西。我覺得這會慢慢改變他們。

伊可具體地舉例，對於各種議題，比起透過電視或報紙瑣碎的獲取片斷的資訊，不如系統性的學習，因此她會努力的跟家人（主要是父親）解釋，雖然也深刻地感受到溝通上的力不從心：



有陣子廢死的議題很，就是前幾年鬧得很兇。也不是鬧得很兇，就是很紅。大家就在討論這件事，他（父親）就會跟我說，這些人全部都要抓去判死刑。還有以前就是蔣中正還蔣經國的時代，如果偷竊的話，就要抓去哪裡槍斃之類的。他說，「這樣治安不是很好嗎？」我說，「不是這樣！」然後，我就會跟他講了一串之後，我覺得是沒有辦法、我很難，噢，但我也有點懶啦，我覺得這個要講太久了，而且，這件事情我覺得我也是花很多時間、很多力氣從學校裡面學到的。就是我沒有辦法這樣跟他說，他只會覺得我很奇怪然後都不聽他的話。大概是這樣。……像廢死這種，這種議題我就會很難跟他解釋。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花很多力氣去了解這些事。還有前陣子那個同婚也是啊。這些議題，我覺得這些議題真的是，在他們生活裡面他們只能從報紙跟電視上看到。但是這些資訊太瑣碎了。……新聞跟一些應該要系統性學習的東西不太一樣。

伊可甚至還和妹妹一起像是當起父親的老師一樣，教父親不要插嘴、發表意見要輪流舉手的理性溝通技巧：

像我跟我妹跟他講話的時候，如果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他突然插嘴的話，我妹就會說，「等一下！我們現在三個人輪流講話。如果有人要插嘴，就舉手」（大笑）我們就輪流講話。我妹就說，「你講完再換我再換她，這樣好不好？」然後，如果我爸插嘴的話，我妹就會跟他說，「你要不要讓我講完？我先講完。然後，你等一下再發表意見」。他就會說，「好，你講」。因為他覺得他是一個開明的爸爸，所以，呃，在某部分應該算是啦，只是他還是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所以我們覺得，我們跟他說，那你要不要讓我講完、要不要聽我講話



的時候，他會願意聽我們講話。就如果我們這樣要求，就跟他說你一直插嘴之類的，他會覺得，嗯！他會發現他這樣不好。願意聽我們講完他再提出他的反駁意見。

另一方面，對於生涯發展的事，伊可曾經很認真、詳盡地向父親解釋自己在做什麼、以後想要做什麼，結果發現父親只是想要關心一下女兒，沒有真的要了解那麼多，也沒有能力了解那麼多，其實只要看到女兒很有自己的規劃就安心了：

他（父親）這幾年在跟我討論我未來的生涯規劃之類的，他也會講到我不是真的很了解你學校學的什麼東西啊，還有那些制度什麼的。但是他只是想要跟我聊聊而已。我有解釋過給他聽。我有解釋過關於我現在在學的東西，還有我以後可以做什麼事，我會試著解釋給他聽。但其實我只有認真解釋過一遍啦。其實我覺得他還是不了解。因為那天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在我家客廳跟他講一整串我之後要幹嘛，就是我計畫未來的一年、未來兩年，我要唸什麼東西、考什麼東西，然後，到最後他就跟我說，「其實你跟我講那麼多，我還是不太懂啦。你決定好就好了啦。我可以幫你出錢出到你大學畢業」

專業背景是成人教育的小芬，則是因為對於成人發展的無限可能很有信心，而努力鼓勵習慣於農家生活的母親走出舒適圈，發展人生事業第二春。但是，母親的抗拒讓小芬有點動怒：

她覺得她一輩子都做農了，可是她就不會想要逃脫那個環境。可是因為我讀成教的，我就會覺得說，人生哪有什麼不可能。你就是學。噢，就是我媽媽，她是學會計的。所以她其實可以做會計那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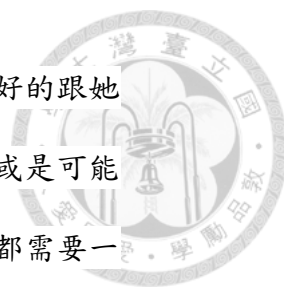
工作。不一定要大公司，那種小公司的，其實在台北都可以做，很容易找到工作，畢竟是商業。可是我媽媽她就會不想要嘗試。我覺得是他們會過於保守在自己的生活當中。可是我自己就會覺得，你的人生就這麼短，你為什麼不去嘗試各種東西？更何況，我又讀了成人教育，我會覺得說，這些八十幾歲、七十幾歲的人，他們都願意再回來讀書，你才五十幾歲你為什麼不嘗試？其實我最近其實我會有點氣我媽媽，我都會覺得說，你為什麼不再就是花一點心力去，轉換一下你自己的跑道。我會覺得你就覺得你一輩子好像只能在這個圈圈裡面，然後都不想要去逃脫。

小宇也是努力想要影響父母認知與價值觀的女兒。她說，相較於母親常常以「因為我就是這樣相信」為唯一理由論述，自己則比較「實證主義派」，總是會用清楚的論述和有根據的資料來和母親討論事情，但卻發現結果是更無法溝通：

因為這樣的溝通方式，會讓我更急切想要讓她知道說，不不不，我現在的論點是很重要的，是真的強過你那方的。可能就會搬出越來越多其實是超出她理解範圍的東西。譬如說，就開始落一些理論啊，或是落一些數據什麼，那些東西其實是離他們更遠的。但是就會覺得，好像搬出這個看起來更權威、更有根據的東西，就會讓她能接受。但其實，反而更沒辦法溝通。

這讓小宇深刻的反省自己的溝通方式，她想了一想，一方面，要把學術的東西轉換成一般人都能理解的白話本來就很費工夫；另一方面，也許母親要的本來也就不是正式的對談，而只是想聊聊天：

要把它變成白話這件事情，好像是整個學界都在努力的一件事情。好像也不是那麼輕易的能夠說，你隨時要跟她講話，你都有辦法轉



換的。反而是，你可能還要自己消化過很多，才有辦法好好的跟她講，不是可以即時的跟他說，我換成你懂的語言跟你講。或是可能要舉很多比較生活化，他比較熟悉的例子之類的。但這些都需要一些時間。很多時候就是，可能跟媽媽之間的對話就只是，當下只是想聊聊啊，就不會是一個正式的對談。

在本節中，我們可以看到高學歷子女如何運用論述能力與蒐集資料的方式，試圖讓父母了解甚至肯定自己的觀念和認同。其中包括精神疾病身分、同志身分，或是對社會議題的認知，都是對低學歷父母們陌生，但高學歷子女們努力想要讓父母理解的。但是，往往對於低學歷父母而言，這些論述與資料中的語彙並不熟悉，反而是再次鞏固了親子之間的階級差距，讓父母敬而遠之。

有時父母其實只是藉著子女的高學歷成就概括性的承認子女的能力，沒有要深入理解子女世界的意思，論述的內容沒辦法橋接親子間的距離，但子女侃侃而談的樣子就能夠讓父母比較放心。因此，這些子女的互動策略能夠讓親子關係的緊張緩和下來的並不是說服力的有無，而是父母能不能看到子女似乎過得快樂、有自信。

在下一節中，則會呈現出子女消極排除的互動策略，子女運用這種技巧，試圖將父母隔絕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之外，其實也是另一種階級劃界的實作。

## (二) 消極排除：應付與資訊控制

由於高學歷子女認為自己和父母之間的認知和價值有著懸殊差異，積極和父母溝通對他們而言相當費力，當子女們察覺到父母不會認可自己的時候，反而採取會是另一種互動策略：消極的將父母從自己的世界區隔出去，把自己的事務鎖





在自己的世界裡。這種一方面確保自己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要給父母一個表面的交代，阻止父母介入的做法，常常需要動用應付性的說辭和各種類型的距離控制。

找藉口蒙混過關的技巧，往往是子女善用自己和父母之間的資訊落差才能夠達成的，尤其是父母所熟悉的生活世界和自己的生活世界差距遙遠的時候，而這正是低學歷父母和高學歷子女所處的情境。像是瑞雯是個在大學時期投入學生權益運動的組織者，但她關於自己在做的倡議工作，對母親另有一套解釋方法：

比方說像大學法的事情，我可能就不會跟她講說我們覺得什麼事情很重要。不會跟她解釋說為什麼我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我會挑她覺得會重要的事情跟她講。我就跟她說，我們在做的是跟立法委員遊說、修法。聽起來就好像很像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就這樣跟她解釋，希望她不要再覺得我在浪費時間，這樣就好。我覺得上大學之後她問的也比較少，我覺得一部分可能跟她有點自卑自己沒有唸大學這件事情有關。就會比較少問學業上的事情。因為她，會有點怕…呢，可能會說很明確意識到她沒唸過大學這件事。

瑞雯敏銳地意識到討論自己在大學裡的活動，可能會勾起母親沒唸過大學的自卑心理，同時，也善用包裝的方式，強調「跟立委遊說」以顯示自己在做的倡議活動的高尚，一方面藉階級恥感避免母親追問，另一方面又彰顯自己在從事可敬的、值得被許可的行為，以讓母親接納。

就讀博士班的雷恩在要進博士班之前，一直努力試探父母的態度，他也早早預期可能會因為讀博士班的事掀起一波家庭革命。他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溫水煮青蛙式的讓父母接受：

其實也不是說，我一個決定說馬上要唸博士然後就告訴他們的。有



將近一年的時間，可能在我有時候講電話，或是有時候回家的時候，有稍微提到這件事是怎樣子，然後我想要怎樣、這件事可以幹嘛。因為它有獎學金，也不會跟你們牽扯到錢的問題。然後我沒有要出國，所以，也沒有在外面住宿的問題，然後它可以帶來什麼價值。其實價值這件事情是，我覺得是他們最難理解的吧。就是說，我覺得我那個時候的說辭是，「以後可以當大學教授不是很厲害嗎？」之類的。可是其實我知道說現在高教環境其實，要當大學教授沒有那麼容易，我自己心裡很清楚，可是我沒辦法跟他們講說，現在當大學教授很難，我只能跟他們講說，就是以後可以當大學教授啊，什麼的。我覺得大學教授至少對他們來說是個，高尚的職業，就是好職業。可是，我沒辦法跟他們再解釋說，其實很多人唸博士完是去業界或是高階主管或是其他的職業，這種事情。就是不用再浪費時間跟他們講，他們不會聽這樣子。

從開銷、要不要出國，一路到畢業後的出路，雷恩都想了一套說辭。但是，關於畢業後出路的說辭，雷恩卻沒有把心裡的實話說出來，和父母商量，而是選擇用一套父母可以接受的表面說辭來蒙混過關。雷恩坦承，這就是一種「話術」：

就其實我沒辦法承諾他們。我只是有跟他們說，喔，可以當大學教授。我沒有承諾他們我會當大學教授。就是，話術嘛。

但這套話術運用了父母對於博士、對於教授這個職業的陌生，以及對於教授這個職業聽起來很高尚的印象，將父母阻隔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袒護了自己的生涯選擇，但同時也把博士畢業後真實的就業煩惱留給自己去面對。

除了採用各種片面透露或話術來應付父母以外，有些子女預期到父母不可能接納自己的觀念或行動，而調整與父母的「距離」，創造屬於自己的隱私空間，



讓父母無從討論或介入。許多子女藉由錯開生活時間或不住在同一個空間的方式來迴避父母，例如早出晚歸，或是刻意就讀家鄉外縣市的學校、去家鄉外縣市工作等等。

另一種意義上的距離調整，則是在資訊共享的層次上的疏遠父母。例如小芬預期到自己的私人事務如果父母不會接受，就會直接選擇不講，甚至連關係還算和睦的姊姊和弟弟也一併納入不分享的範圍，以免傳給父母知情。小芬表示，這是因為上大學以後，就總是覺得父母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無法理解自己想表達什麼：

讀大學之後，我覺得變得很疏離。就是，會覺得他們好像不懂你想要什麼。然後，他沒有辦法跟你溝通。然後，會覺得他們做的事情是你沒有辦法認同，或是你覺得在討論過程當中很容易有摩擦。…  
…所以，大學之後，我就變得很不喜歡跟我的爸爸媽媽說我發生的任何事情。我都會講說，噢，學校需要簽名的時候，我就會說學校要簽名，然後聯絡你一下。我說我會把東西寄回家，然後，附回郵，你再寄回來給我。就是通常會是這種公事、比較重要的事情。那其他的事情我就會不會跟他們說。因為，他們沒辦法理解你想要表達的東西。然後，他們會覺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錯樣子。

為了避免自己的訊息走漏，管理社群網站的界線也是子女常採取的作法。Facebook 的運用，包括是否加父母好友、要不要將部分資訊屏蔽父母，是子女透過網路調整與父母距離的方法。像是和父親衝突很多的小威，直接表示「我也沒有把我的社群媒體或者什麼臉書那些給我爸」，將父親屏蔽在自己的社群網站連結之外。雷恩則是有加父母的好友，半被動的透露自己近況給父母，讓父母得以



默默關心：

我知道他們默默關心我，因為他們可能會說，有時候會看臉書或是看什麼之類的然後，因為我可能會 po 文他們就會看過。其實，我自己有反省說，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溝通方式，可是也沒辦法這樣子。

海倫在 Facebook 的距離調整上，則相對更像是半主動的傳達自己的事情。她說關於自己在幫忙同志 NGO 到外面演講多元性別的事，父母雖然不會過問細節，但因為在 Facebook 上都有發文，她覺得和父母之間是心照不宣：

他們都不知道我在幹嘛啊。他們知道我在演講啊，他們知道。但他們也不知道我實際上在幹嘛。(宇修：他們知道你在 H 組織?) 呃，他不知道 H 組織這個組織，不知道在幹嘛。(宇修：但是他知道它是在演講。你會去一些國中高中演講。) 對對對，「他問我說你在講什麼？」一開始我就會說，「呃，多元性別啊」。他就說，「什麼是多元性別啊？」我就說，嗯，就是，他也沒多問啦。那時候就是，不明不白的。反正我就是一個在臉書上很公開自己的人。所以後來他們就加我臉書。哦，好啊，那，就自己發現我在幹嘛。所以後來有點，心照不宣。

海倫甚至說，自己在臉書上也大肆公開自己是開放式關係的實踐者，也沒有在屏蔽父母。但父母也沒有過問，讓海倫諷刺地讚嘆「我們家不談事情到一種很厲害的境界」。

但是，採取消極排除的方式的負面後果是，由於父母對於子女的世界過於不知悉，更沒有理解、同理子女遇到的困難，分擔困擾或提供協助的機會。海倫在碩士班畢業後曾進銀行工作，但銀行的營利模式對海倫而言太過劫貧濟富，自己



非常難以和工作內容調和，以致於工作得非常痛苦，卻因為沒有和父母分享自己的心境，不只得不到同理，反被罵說為什麼要放棄高薪工作：

因為我一個月薪水是她（母親）兩個月薪水，我說我要辭職的時候，他們（父母）就說我瘋了。沒做多久，四個多月而已。因為我非常不喜歡那個體制。那時候就是一一直被罵：「你薪水這麼高，多少人想要」。因為那個也是海選進去的。2%還3%吧，很少人，經過三四關面試這樣子。進去以後發現我完全沒有辦法（適應）。啊我那時候要辭職的時候，他們都很無法理解。我就說我就是不開心啊。他們會唸，但是，他們也不能影響我的決定。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我都已經難過到我都快掛了，還要我繼續做這份工作。可是我沒有跟他們講我那時候的狀態。因為我那時候心理狀況不是很好。所以後來我辭職之後，我就去旅行。

辭職後的海倫一個人去了一趟無目的的海外旅行，情緒低潮的她甚至沒有買回程的機票，想找個契機在海外不為人知的自殺。但在旅行的曲折中，最終海倫還是決定回到台灣。直到海倫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發文章寫自己的心境，透過哥哥的轉達，父母才震驚地發現自己的女兒居然已經痛苦到想尋短：

我後來回台灣之後，我有寫一篇文章，就是關於我那時候自己心裡的狀態。然後我哥哥看了那篇文章以後才知道說，我那時候有想死的念頭，但是他們都不知道。所以我覺得對於他們（父母）來說，比較大的衝擊是，我不知道這個孩子怎麼了。我本來想要幫她分擔，但是我幫不了她什麼事。

高學歷的子女相對於低學歷的父母，表面上透過學業表現展現出很好的能力，似乎不需要讓父母擔心。由於預期到父母可能無法理解自己的觀念，子女如



果採取了消極的區隔策略，將父母阻隔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之外，當子女無所適從時，父母更無法伸出援手。就如同黛比描述自己在職場上其實遇到了困境，但以往一直表現出的自我效能感，讓父母無從為自己分憂：

他們只是要你有個工作。當我開始跟家裡說我想要離職、我想要換工作，他們就會說，你現在薪水那麼好，你不要換啊？bla bla。只有在我鬧說我要離職、換工作的時候，他們會勸我要多想一下。……因為他們覺得我從…就是讀書開始，就是都很明確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所以他們不會擔心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但是我現在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就是了。

在本節中呈現出的消極排除式的子女互動策略，在我的受訪者中，其實是最常見的策略。因為相較於積極說服，消極排除所要耗費的心力比較少，關鍵在於如何能夠維持好和父母之間的界線，避免父母穿透到自己的世界裡。但是，消極排除也是在劃分子女和父母之間的階級界線，讓彼此之間的心理距離、社會距離，甚至物理距離都更遙遠。因為區隔而無法分享困擾，反而也讓子女真的遭遇自己人生中的重大困境時，父母難以及時知情而提供協助，而可能有時無意造成子女額外壓力。

### (三) 同志子女的階級化出櫃策略

對於同志子女而言，如何對父母出櫃或掩飾自己的同志身分往往是親子關係課題的一大重心。而在本研究的同志受訪者的身上，他們彷彿是活在雙重衣櫃裡：一重是同志身分，另一重則是高教經驗帶來的價值觀與認同。因此，與他們與父母協商親子距離的策略，需要因應的是同志身分與高學歷身分這兩重與父母



相異的經驗。

在 11 位同志受訪者中，有 5 位和父母出櫃（其中 1 位僅和母親出櫃）<sup>8</sup>，5 位未出櫃。而剩下的 1 位則是小宇，她和父母保持心照不宣的關係，她說：

因為是比較陽剛的形象，所以其實滿明顯的。變成比較是他們其實應該是都知道，只是他們沒有正面地談這個話題。長久以來都是這樣，而且越來越發現他們真的是刻意的避開這個話題的感覺。像是你不是有問到說，可能會催婚或安排對象什麼之類的，這件事情有發生在我姊姊身上，他們有一直跟我姊姊說，「怎麼會沒有男朋友呢？要趕快嫁了」之類的，傳統觀念這樣。但是，在我身上完全沒有發生。他們完全沒有逼婚，一次都沒問過。就代表，他們應該是知道（笑）。

對，所以滿有趣的地方就是居然沒有在催促我。

小宇和姊姊的對照反映出父母對女兒的結婚期待的「一般」和「特殊」模式。在我的研究中，許多的女性受訪者和小宇的姊姊類似，到了這個年紀，往往經歷過父母催婚，甚至直接安排對象相親。但外型明顯展現出女同志 T 的形象的小宇非但沒有這個經驗，反而還感受到父母刻意的避諱，可能是心知肚明但還不想要說破、不想要接受女兒是同志的事實。

在出櫃子女的經驗裡，困難的總是如何讓父母能夠接受自己的同志身分。小瑩自陳用「訓練」的方式讓母親慢慢接受自己的同志身分：

我希望你可以接受所有人啊！我覺得我媽很棒啊！所以你在這方面應該也要很棒，所以我就一直訓練你啊，讓你覺得，啊，沒關係。喜歡

---

<sup>8</sup> 部分受訪者為單親家庭、重組家庭，或是與父母其中一方鮮少聯絡。在此指的「和父母出櫃」是指單親家庭的單親、重組家庭的原生父母，或是仍有在連絡的父母。



誰，或者是覺得自己是男是女都可以。我就說，像是你教我啊，我也  
要教你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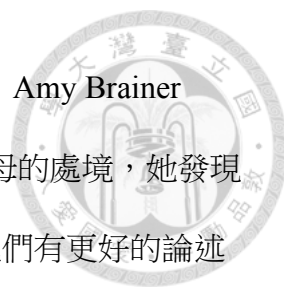
小瑩很自滿自己成功「訓練」母親接受同志，除了讓自己可以向母親表明自己的泛性戀身分外，也讓妹妹「無痛出櫃」。小瑩所採取的「訓練」策略也正反映出她想像中與母親的權力位階，正是因為她相信自己在性傾向、多元性別方面的知識勝過於母親，因此使得她可以站上「教育者」般的地位，教育自己的母親成為能夠接受同志的人。

活用自己的知識與資訊能力來說服父母接受自己同志身分的經驗也可以在海倫身上看到。為了向父母出櫃自己雙性戀的身分，海倫努力善用了自己在同志 NGO 習得的經驗以及對同志資訊的熟悉，來同理父母身為同志父母的處境，想辦法讓父母可以慢慢接納自己的雙性戀身分：

我那時候甚至把我可以的資料都蒐集好了。就是包含，《親愛爸媽我是同志》這本書，還有一些櫃父母的資訊我都有。甚至會跟他們說，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找一些跟你們一樣有這樣小孩的爸爸媽媽跟你們談。然後我媽就說，不要。她一開始覺得這件事滿丟臉的。就她不知道要找誰講，對。……因為那時候我，我覺得真的是我比較有資源，就是我就有跟我媽說，「我知道你一開始知道可能會覺得你是不是造了什麼孽、做了什麼錯，為什麼老天爺要這樣懲罰你，blah blah」。就是我把接觸過的那些父母的心聲都講出來。那時候我媽就瞬間從她的櫃子裡拿出她的日記。然後裡面寫的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媽媽有覺得自己被同理。就是這個小孩知道她在想什麼。

從海倫的故事中，除了看見她如何善用論述能力來掌控親子關係間的話語





權，還可以看到的是低學歷勞工階級家庭裡的同志子女的困境。Amy Brainer (2019) 在台灣進行深度的田野及訪談，考察同志子女和同志父母的處境，她發現這些容易獲得 NGO 資源的同志父母多半是中產階級的父母。他們有更好的論述能力和資訊接收能力，讓他們可以閱讀同志相關的資料，並且能夠撥時間參與 NGO 舉辦的活動，走出櫃父母<sup>9</sup>的處境。但由於 Brainer 滾雪球尋找受訪者的管道是透過 NGO，許多參與同志 NGO 的父母是比較有餘裕把閒暇時間投入非營利活動的中產階級，因此她承認自己的研究發現中可能有中產階級偏誤。

身為在同志 NGO 經驗豐富、反覆談過自己身為同志的生命故事的海倫，在訪談時對我表示，能夠將自己的階級經驗和同志經驗結合，和我分享自己的故事，是她之前都未曾有的際遇。海倫的故事中顯示出，她低學歷勞工階級的父母對於海倫積極想要給他們看的資料，在資訊獲取的習慣上是相當陌生的。而且他們也不習慣用論理的方式來討論同志經驗或同志父母經驗，就連表達情感的方式都顯得彳亍。

甚至當我詢問是否有可能訪談海倫的父母時，海倫婉拒的理由是她覺得父母基本上是消極的抗拒被納入海倫的世界，無論是高學歷的世界，或是同志的世界。她舉例說自己以前嘗試過而被父母消極抗拒的經驗：

因為我帶來一些什麼改變的話，我自己也覺得這不是我們家相處的模式。我們就各自歸各自的。因為之前也有問說，那時候（NGO 人員）問說要寫同志父母的東西，他們有說可不可以問我媽，我有稍微問說，「欸你想不想被問一下」，她就是一個完全拒絕的狀態。她就會說，「啊我現在沒有空欸」。就是有一種，我已經讓你在外面做

---

<sup>9</sup> 櫃父母指的是因為自己的同志子女出櫃，而感到很困擾、羞恥，反而把自己「關進櫃子」裡的父母。



你要做的事情，但你不要把我牽進去，的那種態度。所以我覺得（接受訪談）機率，不太可能，連我問他們有沒有要來熱線晚會也是一個，「那是你的事情，你為什麼要叫我」，就有點變成我逼他們去。

因此，海倫的出櫃策略相當技巧性，不是說之以理，而是動之以情，感性地談自己形成同志認同的過程。不過不僅如此，哥哥和姊姊也各自把自己在感情與婚姻生活上的困難拿出來談，紓解了緊張而針對海倫的同志身分的氣氛：

我爸就說，「你媽最擔心的還不是你們三個以後的未來」。我哥就很聰明啊，我哥就說，「現在是要談我們的未來是不是？好啊，那來啊，來談我」。他就把話題轉到他自己身上。然後我哥那時候的狀況是，他快三十歲，但他不想結婚。就是他跟他那個愛情長跑的女朋友不想結婚。然後，我哥又算長孫、長子這樣。但他又不想結婚。然後我爸媽就很擔心這件事情。然後，就換變聊我哥，聊一聊就變我姊。就我姊那時候也還沒結婚，我姊對自己的身體形象其實沒有自信的。就我姊姊稍微身體比較胖一點。所以她常常在感情上是容易被拒絕，或是被騙的那種。那時候她有一個男朋友，搞到後來她好像有點想自殺之類的。他們兩個都講完之後，發現就是，嗯～我的問題好像沒那麼嚴重！好像也不是什麼大問題這樣子。對。所以後來講完我姊之後就，好啦，今天就差不多到這，就這樣。就滿有趣的。其實那一場下來就覺得，其實我們家每個小孩都有各自的問題。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去好好談這件事情。然後反而因為我的同志身分，讓大家好像各自把一些自己的問題丟出來討論。

透過話題轉化的技巧，繞過正面的談論同志身分本身，反而揭露哥哥和姊姊身上



的異性戀非常規性，讓海倫出櫃的歷程避免了針鋒相對。同時，說故事也比理性探討什麼是同志、為什麼會「變成」同志或發現自己是同志，來得更讓欠缺理解同志的認知資源的低學歷父母容易聽進去。

對於沒有準備好或是沒有打算和父母出櫃的同志來說，他們面對的課題則是如何管控資訊落差以維持和父母之間的距離，避免自己「跌出櫃外」。像是本章開頭中提過的蒂蒂採取的是「單身女性自我培力」的論述，來規避母親追問何時找個男人嫁了的事。

之所以不出櫃，往往也與子女想像父母的價值觀中接受同志子女的可能性很低有關，而這樣的想像常常其實與本文中所述的第一代大學生理解父母的視框緊密連結。例如小威是一名沒有和父母出櫃的男同志，他告訴我說，因為父母離婚後和父親生活在一起，朝夕相處下他知道父親基本上對同志抱持反對的態度。另一方面，母親更是態度保守，還會不時問小威有沒有交女朋友、何時要結婚。因此，談到出櫃這件事，他認為父母都不是可以解釋的對象：

我有跟我已經跟家裡出過櫃的朋友討論過，但是……我覺得那是因為他們家裡的態度夠開放，才有辦法置入。但我爸媽是那種從小就已經灌輸我說，什麼東西不好、什麼東西不要變成那樣，的那種觀念，其實灌輸久了，我會越來越覺得他們不是那種可以解釋的對象。所以我會覺得說那種出過櫃的那些朋友，不是我可以參考的依據。然後，一樣跟我和家裡關係可能不太好的那些朋友，他們給我的建議又很理想。他們就覺得說，那就乾脆我們出來自己組一個公社之類的。可是那根本就不太可能（笑）。

小威比較的基準是自己的朋友。在小威的認知裡，他周遭的這些朋友們往往是家裡經濟有一定的水準的家庭，而小威覺得這樣的家庭父母比較開放。他進一步以



此作為理解自己父母為何比較保守的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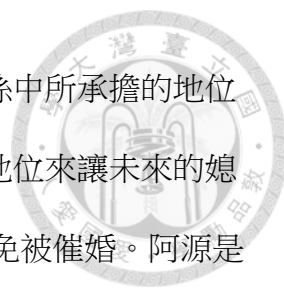
有一些家庭它是，他爸媽確實是完全放任自己的小孩要做什麼都可以。那他們家可能也有一定的經濟水準這樣子。尤其在我大學之後，我們系上滿多同學都是家境不錯的。那他們如果要出國唸書幹嘛的，基本上都可以很順利。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很羨慕他們說，當他們有資源的時候，他們其實可以更能夠去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因為自己家裡經濟狀況不好，我就必須要…呃，犧牲我一些時間去工作。也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好，我爸媽的態度都會比較保守一點。

在這些第一代大學生的同志子女的認知中，父母的保守與父母的階級位置相關聯，他們想像那些能夠順利出櫃的同儕的順利，來自於他們的父母的高階級位置讓他們的父母在價值觀上更能接受同志子女。

另一方面，正如海倫的故事中提過的，其實認識同志的管道，無論是同志教育的書籍或網路資訊，抑或是同志父母的小團體會談，往往都不是低學歷父母習慣的生活方式的一部份。因此，對於同志群體而言，要能夠跟父母出櫃，除了父母原來的保守態度外，父母有沒有認知資源來理解「同志」這樣的性少數群體也十分關鍵。當察覺父母態度保守時，這些認識同志的資源又不符合父母的認知架構，可能會讓低學歷父母的同志子女更難去向父母出櫃。

胡郁盈（2017）研究台灣女同志如何和父母協商自己的同志身分，她指出在台灣社會的華人家庭文化框架下，不能簡單的用「現身」、「不現身」（出櫃、不出櫃）這種過於個人主義的想像來理解同志子女與父母的處境。在胡郁盈的研究中，女同志女兒們反而會透過協商文化傳統中單身女兒的角色，來把自己的同志身分融入家庭「關係」的架構裡，超越單純的現身或不現身的二元對立。

呼應胡郁盈的研究發現，男同志其實一樣能夠動用「兒子」的角色來當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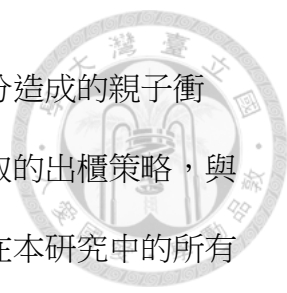


個應付的策略，延後父母對於結婚的催促。由於兒子在親屬關係中所承擔的地位是要未來扛起一個家的男主人，相應地要有一定的經濟與社會地位來讓未來的媳婦得以投靠，32 歲的受訪者阿源就利用了這樣的兒子角色來避免被催婚。阿源是個木訥寡言、訪談時經常以傻笑帶過的男同志。面對母親的要求，他說他大多數都能表面應付，盡量順著母親的意思做，即便只是敷衍。然而，就是結婚這件事他吞不下去。因為阿源是個偏向男同性戀的無性戀者，他完全沒有要找對象結婚的意思，更別說要找一個女性交往。但是，阿源表示，其實眼下母親還沒有到要那麼催促他結婚的時機：

她目前可能還是沒有放棄希望叫我去考公務員。所以，沒有考上之前就不會到結婚那一步。

正是因為母親對於男性的人生的階段性想像：先有穩定的工作，再找到好對象結婚，讓阿源可以用「還沒考上公務員」這樣的「工作還沒有安定下來」的理由，拖延母親對結婚的催促。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婚姻家庭想像中，沒有經濟基礎的男性在婚姻市場上的劣勢，反而成為男同志兒子可以用來避免自己面對婚姻壓力的應付說辭。尤其在勞工階級的家庭裡，父母能給的經濟基礎也不豐沛，自知當不了能出得起聘禮的夫家，在兒子有穩定工作以前也不好意思要求兒子找結婚對象。

由於第一代大學生中的同志子女們所經歷的出櫃議題同時夾雜著與父母間學歷差距的議題，使得他們為了對父母出櫃或不出櫃所採取的親子距離策略，同樣反映出其他第一代大學生所採取的兩種類型：積極納入與消極排除。例如在本節中，海倫試圖用自己所掌握的資料與論述能力去讓父母接受她的同志身分，展現了其積極納入的技巧；阿源善用兒子角色來延緩父母的逼婚，避免父母察覺自己的同志身分，則是展現出他採取的消極排除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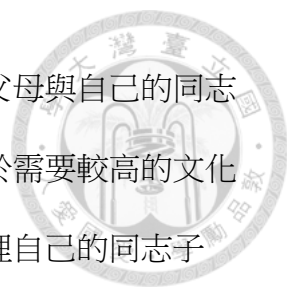
由於皆涉及價值觀與自我認同，一方面緩解或避免同志身分造成的親子衝突，另一方面又要捍衛自己所認同的價值、所認同的自我所採取的出櫃策略，與因應高學歷身分而來的親子距離策略相當類似。甚至可以說，在本研究中的所有受訪者們都在經歷各種程度上的「出櫃」難題。因此，同志研究中關於「出櫃」的討論，放在本研究的第一代大學生身上也有呼應之處，尤其在華人社會台灣的脈絡下，值得注意胡郁盈（2017）提醒的「關係」視角，看到「出櫃」不單純只會有自我認同的對抗式現身的形式，同時也要看到他們調整親屬關係中的角色與關係距離的協商過程。

### 三、小結

在本章中，我以第一代大學生對應父母的階級化親子距離策略，作為代間情感糾結在階級面向上的例證。這些子女對父母的情感糾結來自於一方面他們採取了中產階級中心的理想親子關係想像，對照出對於既有親子互動模式的不滿；另一方面，卻又為了改善或維持與父母的親密關係品質，採取兩種不同類型的親子距離策略。

我將子女的親子距離策略區分成積極納入與消極排除兩種類型。前者主要是以論述或資料來為自己創造理性溝通的環境，把父母拉進高學歷子女習慣的溝通模式。但是對於低學歷父母而言，卻是陌生不熟悉的，不僅不易被說服，甚至可能感覺到自卑感。後者則是以應付的說辭或距離控制的技巧，將父母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之外，以維護子女的自主空間。但是越是把父母推離自己的生活世界，當子女遭遇困境時，反而越難讓父母伸出援手。

同時，本章中也強調階級和性別的相互交織。高學歷同志子女容易運用父母



不熟悉的生活經驗，創造掩飾自己同志身分的說辭，或是控制父母與自己的同志生活世界的距離。但同時，也因為了解同志的資訊往往是傾向於需要較高的文化識讀能力才易於近用的資料，低學歷父母也就更難以認識與同理自己的同志子女，不易接受到現有的同志資源來走出櫃父母困境。此外，善用女性單身的自我培力的說辭，或是男性要先有安定工作再找對象的說辭，也是子女挪用階級經驗來做性別的例證。從交織的視點我們還要注意到的是理論的交互解釋，出櫃的經驗不僅發生在同志子女的身上，所有第一代大學生子女也都在經歷與父母不同程度的「出櫃」議題，協調著他們的自我認同、親屬角色與親子關係距離。

## 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從媒體與輿論中對勞工階級家庭出身的高學歷子女的描繪與想像出發，透過與 20 位第一代大學生的敘事訪談，探討這些第一代大學生在他們獲得了高學歷之後，在與父母的互動過程中，受高等教育的經驗如何形塑他們的親子關係，他們又如何與父母重新協商親子互動秩序。

不同於階級翻身的典型敘事，本研究發現第一代大學生在與父母的互動之中存在許多的糾結與內在困境。教育可以引領階級向上流動的美好童話故事遮掩了實際上的階級流動的過程存在更多的衝突與挫折。本文從親子關係切入第一代大學生的議題，而非學校教育歷程，能夠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第一代大學生所面臨的同時也是一個家庭議題：因為所謂的「第一代」，正意味著他們與原生家庭（父母）間的斷裂。父母的低學歷對子女產生的影響，不只是單方面的在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及社會資本的傳遞上的劣勢，而是即便在第一代大學生從大學畢業後，持續進行的親子互動中都會展現出與父母間學歷落差而心理疏離的困境。

在結論中，我將重新梳理本研究的研究發現，並說明本研究對於社會學研究的貢獻。在研究發現的基礎上，我也提出對於第一代大學生潛在的困境的政策修改方向。最後，本研究有許多力有未逮之處，須留待未來研究者解決。

###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的研究發現將分為兩個部分說明。首先，本研究以文化資本的角度理解學歷，發現由於學歷作為文化資本的不同面向受到的不同人不等量的承認，導致對學歷的肯認存在著內在的弔詭。並且，本研究從親子關係的角度切入，重新





理解教育向上流動對於第一代大學生的意義是什麼，以呈現他們的經驗與難題。其次，本研究在親子關係的互動過程中，指認出第一代大學生親子之間如何彼此展演性別，而展演性別的經驗如何和階級位置互相交織存在。

### (一) 高學歷的弔詭

台灣是一個學歷社會，追求更高的學歷往往被和追求更好的人生劃上等號。然而，在本研究中，從第一代大學生和父母的相處中發現，人們對高學歷的肯認內在還是存在著複雜的心態。

從文化資本的角度來觀察學歷，可以發現學歷同時具備比較偏向於交換價值的象徵的面向，和比較偏向於使用價值的實質的面向。對於第一代大學生的父母而言，他們對高學歷的承認，主要是對於前者的承認。他們期待子女透過獲取高學歷，未來可以從事更體面的工作、獲取更高更穩定的收入。然而，對於高學歷帶給子女的知識和技能，或是價值觀的改變，對父母來說不是那麼重要的，甚至如果因此違背父母的觀念，反而會成為親子衝突的起源。相對的，第一代大學生雖然也接受並期待高學歷帶來的市場價值，但在他們自己的經驗當中，高學歷帶來的實質面向的文化資本同樣重要，甚至對有些人而言是重新形塑他們的自我認同與價值的依據，這使得他們更有得到承認的意欲，而想要和父母溝通、說服。因此，學歷內在的複雜性，在第一代大學生與父母不同的認知下，會使其帶來的不見得是單純的「更好的人生」，同時也帶來了關係中的弔詭。

另一方面，對於中下階級經濟困窘的家庭而言，子女的高學歷往往乘載著帶動家庭階級向上流動的期望。子女在求學歷程中，因為學業能力得到肯定而原先預期自己可以有所成就，改善家境。但一方面在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可能會察



覺自己的志趣不見得和世俗期待的高成就職業相符；另一方面，需要優先考量穩定家庭經濟的壓力產生的焦慮與風險感，也成為子女奮力追求「更好的工作」的內在阻力。在這樣的處境下，當要出社會時，面對當代對青年不友善的勞動市場時，有些子女質疑階級向上流動的想像，感受到一種上當受騙感而受挫。

## （二）親子關係中性別與階級的相互交織

在家庭關係中，性別影響了資源分配的規則，也規範了不同家庭成員需要承擔的義務與責任。同樣是家長，父親往往擔當更多對外代表一個家庭，以及對內管理家庭秩序的角色，母親則往往擔任維繫家庭日常運作與照料家庭成員的角色；同樣是子女，兒子的任務往往關係到家庭的繼承，無論是接手家庭資源的權利，或是延續家庭發展的責任，女兒則相對的更常被賦予家庭成員間關係情緒調劑的工作。

在本研究中，親子關係的性別化展現在本研究的諸多敘事之中，更重要的是，我強調性別是與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中階級位置的影響相互交織的。首先，對於父母而言，子女超越自己的學歷造成的教養權力威脅，就有不同的意義。以父親的角度來說，高學歷的子女彰顯出自己低學歷的「隱性階級傷痕」，使他們的陽剛氣質容易受到貶損，而產生自卑或防衛性的對子女的批評；以母親的角度，他們則可以透過自己的子女代理自己唸書，贖回為自己年輕時因家庭性別歧視而失去的讀書夢。

其次，從子女的角度來看，當父母能提供的資源有限時，假如優先留給兒子而對女兒差別待遇，高學歷的女兒會更容易感到不平與不滿。此外，高學歷的女兒也因為背離了傳統的性別期待，成為「有能的女兒」，對於低學歷父親而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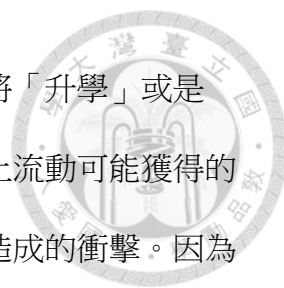


更嚴重的威脅與挑戰，變成親子之間衝突的來源。這反映了在父權議價上，並非越有資源，在協商談判上就越具有優勢。當父權與陽剛氣質受到威脅，尤其是來自於有資源的女性的威脅時，自保顏面的反挫作用反而會造成談判破局、關係緊張的後果。

此外，在性傾向的方面，子女維持親子距離的策略同樣展現出階級化的特徵。不同於 Brainer (2019) 指出有些同志子女會以「策略性的正常」來展現出同志高成就的一面迎取父母的認同，本文發現低學歷的背景讓父母更難以接受以中產階級為主要訴求對象的各種認識同志的資源，因此讓高學歷的同志子女即便取得資源，也缺乏能夠和父母溝通，讓父母認識、理解自己的同志身分的溝通模式。因此，他們的議題是如何「教育」父母成為能夠接受同志子女的父母，抑或是如何利用資訊落差來避免自己跌出櫃外。值得注意的是，對父母出櫃策略的性別差異，其實還反映出了「女兒」和「兒子」在親屬關係中的角色期待，同志女兒和同志兒子會根據其女兒角色和兒子角色展現出不同的策略。例如強調「單身是種培力，現代女性不必靠男人養」來避免催婚的女兒；或是藉由自己的工作、事業尚未穩定，沒有扛起一個家的本事，來迴避找對象壓力的兒子。從同志研究的理論視角，更可以回過頭來看到同樣面對自我認同的掙扎，第一代大學生子女們其實也都面臨著某種意義上的「出櫃」難題，協調著他們的自我認同、親屬角色與親子關係距離。

## 二、討論

### (一) 政策建議：檢視第一代大學生的學習與發展處境



在台灣社會中，從家庭、學校到職場，一連串的社會制度將「升學」或是「高學歷」視為每個人都應追尋的目標，只看到藉由教育的向上流動可能獲得的職場競爭力，卻沒有注意到對第一代大學生個人或是家庭關係造成的衝擊。因為社會流動並不只是單純的獲取更多經濟利益，同時也是個人經歷大規模的社會關係網絡重組的過程。

日本社會學者吉川徹長年研究日本的「學歷分隔社會」（吉川 2009）現象，也就是日本社會現在大約有一半的人大學畢業、一半的人沒有大學畢業，形成一個以大學畢業為分界線的二分社會。然而，父母們並非都傾向支持子女繼續往上讀，而是有大學畢業的父母傾向期待子女上大學，而沒有大學畢業的父母傾向不期待子女上大學。這樣的分隔其實並不一定意味著低學歷家庭處境不利，不利必須要搭配著職場對低學歷的制度性歧視才會構成。因此，吉川認為，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大都會、大企業上，同時也要看到地方社會、地方企業往往是高中學歷、沒有去大都會求學及就業的人工作的場域，而這些高中畢業在地方社會活躍發展的人，也應該要得到更多的制度性支持<sup>10</sup>。兩者的相互彌補，才能締造社會整體的繁榮。

因此，在檢討台灣的第一代大學生的難題時，並不能只當作是劣勢家庭的資本不充裕所致，同時也要看到我們社會的形式、制度（如：產業結構、職場用人選才）如何製造出這些困境，以探討如何不再以取得高學歷為唯一標準，讓低學歷家庭不必冒著遭遇親子關係隔閡的風險去競爭向上流動的道路。

## （二）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中相互同理如何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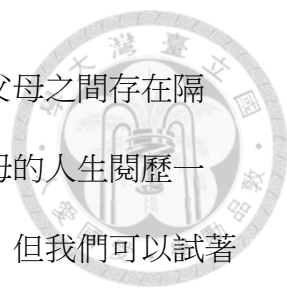
<sup>10</sup> 參考本篇報導：出世ナビ デンジバ Spotlight (2019) 「親が非大卒」の学生に奨学金 学歴固定化に一石。 <https://style.nikkei.com/article/DGXMZO48762380Q9A820C1EAC000/>（讀取日期：2019/10/31）。



對於已經進入大學的第一代大學生來說，未必會遭遇到本文中描述的親子關係隔閡，也未必需要採取本文中提到的親子距離策略。在本文中的親子關係隔閡，往往是來自於對高學歷的想像，或是經歷高等教育後對於理想親子關係的想像，與現實有所齟齬。然而，值得省思的是，我們為什麼會對高學歷、對親子關係投射這些想像？這些想像背後所反映的文化框架是什麼？

對於高學歷的想像反映的是在學歷社會當中，把高學歷當成是而且只當成是獲得在勞動市場有更高的議價權的籌碼。這樣的想像一方面忽略了獲得高學歷的過程中，高等教育對一個人才的多元培養，實際上會如何從內而外重新形塑一個人；另一方面則是抹煞了勞動市場中評估一個人應該考量的各種具體能力，簡略地化約成用學歷來當作主要基準。學歷並不是積分比賽，應該在審慎考量一個人的才能、興趣與志向的基礎上，決定應該接受到什麼程度、多長期的正規教育，而不是一律學歷越高越好。

至於第一代大學生對於理想親子關係的想像，如第四章提過的，由於在進入高等教育體系的過程中，他們接收到同儕和菁英文化中中產階級中心的親子關係想像，而過度貶抑了自己原生家庭的親子關係。首先，比較多親密互動、比較多言語溝通、父母比較熟悉子女的學習和職涯的家庭，不見得親子關係一定比較和睦；反而可能因為互動方式過於緊密、資訊過於重疊，增加了衝突的機會，縮減了彼此可以相安無事的安全距離。再者，中產階級中心的親子關係想像也未必真的是中產階級家庭的親子關係模式，可能只是一種投射出來的理想化腳本。其實，勞工階級家庭的父母就算或許不能完全理解高學歷子女的生活世界，但是他們也相對不會密集介入子女的生活。如果能保持對子女的信任，彼此互相告知生活平安無虞，也可以經營和睦的親子關係。



在完成本論文的訪談與分析之後，我想告訴感受到自己和父母之間存在隔閡、難以溝通的第一代大學生子女們，我們可以試著多信任父母的人生閱歷一點，雖然父母可能很難用我們的思考方式和語言來和我們溝通，但我們可以試著理解父母的思考方式和語言，用父母熟悉的方式，告訴父母我們在想什麼、想要追求什麼、在困擾什麼。即便父母沒有一樣的經歷，但不同的人生仍然可以用隱喻的方式相互指涉而產生同理心，讓父母用他們的方式來理解我們的世界如果可以增加同理、緩和衝突，那麼也未嘗不可。在溝通之前就先放棄、先認定父母不可能理解，反而是自己設下了侷限，增加隔閡與衝突。

### 三、研究限制

#### （一）壓縮的現代性難題：難以釐清代間差異或階級差異

台灣社會在民主化、進入後工業社會以來，經歷快速的社會變遷。不僅產業結構改變、公民社會活躍，也進一步帶動了教育政策的改變。因此，在本研究中的父母世代和子女世代其實本來就經歷了各方面相當歧異的世代經驗，形塑出親子之間的價值觀差異。然而，本研究未能詳細梳理這種「壓縮的現代性」如何與第一代大學生的議題相互交織，使得留下許多解釋未盡之處，難以澄清是代間的差異還是階級（學歷）的差異。在本節中，我將進一步說明將我未能在本研究中解決這個難題的背景，主要來自於一方面國內第一代大學生相關量化研究不足，以致於在因果解釋上不足以釐清哪些變項可以歸因於世代、哪些變項可以歸因於階級（學歷）；另一方面則是本研究為僅聚焦第一代大學生的個案研究，並沒有比較父母和子女皆已上大學的專業中產階級家庭。



## 1. 國內「第一代大學生」相關量化研究不足

根據我的檢索，國內關於第一代大學生的量化研究皆為使用「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的資料，包括兩篇期刊論文及三篇碩士論文。這些研究幫助我們了解了第一代大學生的一些基本特質，但可惜的是皆聚焦在第一代大學生的在學經驗，缺乏進一步使用該資料庫的追蹤資料處理第一代大學生畢業後的經驗，因此難以評估他們「取得」了高學歷之後，究竟對他們的生涯產生了哪些影響？他們與父母的親子關係發生哪些變化？

本研究採取質化取徑，也並未以調查資料佐以量化分析探討第一代大學生畢業後的處境，因此這部分值得留待未來研究者進一步探究，以量化取徑檢驗本研究中對於第一代大學生（尤其是取得頂尖大學學歷者）的發現。

## 2. 缺乏對照組：專業中產階級家庭

由於本研究以詳細呈現第一代大學生處境為目標，因此並未同時訪談專業中產階級出身的大學畢業生作為對照組，以探索親子關係在親子間學歷一致或有落差的情況下學歷對於親子關係的效應為何。本研究採取這樣的研究設計，同時也是源自於研究者對於方法論的考量：我認為對於並未採取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的小樣本質性研究，採取多變項式的因果解釋是很危險的。因為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抽樣的個案有沒有代表性，換言之，即便我訪談了 10 位第一代大學生及 10 位專業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學生，我也無法得知這兩群人和父母相處方式的差異，是不是真的源自於他們與父母之間有沒有學歷差距。因此，我採取的是極端抽樣的原



則，以極端經驗中主要的研究變項（學歷）如何呈現在受訪者的敘事中作為解釋機制。未來的研究者如果能夠解決抽樣問題，即可進一步比較第一代大學生與非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經驗。

## （二）父母取樣不足：著重子女觀點

本研究因研究者個人因素，原訂計畫納入父母訪談，但最後由於僅完成三位受訪者母親的訪談，取樣不足而並未納入最後論文的分析。因此，本研究僅能呈現從子女的觀點，他們如何想像自己、想像父母、想像親子關係，並且他們在他們的想像的基礎上，如何形塑出敘事性的自我認同，以及如何在親子關係上採取策略應對。而未能進一步檢證從父母的觀點，他們怎麼看待自己與第一代大學生子女的關係？採取什麼樣的策略來教養子女，經營與子女之間的親子關係？

## （三）僅處理菁英文組大學畢業生

最後，本研究為了以極端個案呈現學歷的作用，因此並沒有訪談非頂尖大學、非文組科系的學生。主要原因在於，一方面，在台灣大學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尤其是公立與私立大學、普通大學與科技大學之間的隔閡，使得大學之間相當的異質。就讀社會評價上後段的學校是否能夠意味著向上流動，並不那麼清楚。另一方面，如果子女的學歷給予很大的求職優勢，父母仍然可以產生「可以找到高薪、穩定工作」的信念，因而減緩給子女的壓力，以及產生關係衝突的契機。但這些預設如果進一步納入這些個案，或許會發現不同於這些預設的發現，值得未來研究者商榷。





## 參考文獻



- 吉川徹，2009，《學歷分斷社会》。東京：筑摩書房。
- 李慈穎，2007，《以家之名，抗家之實：台灣女同志的成家實踐》。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伊慶春，2014，〈台灣地區家庭代間關係的持續與改變：資源與規範的交互作用〉。《社會學研究》3: 189-215。
- 呂玉瑕，2011，〈臺灣民眾性別角色態度的變遷：1991-2001〉。《臺灣社會學刊》48: 51-94。
- 呂宜臻，2009，《第一代及非第一代大學生的校園經驗、學習成果與教育抱負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沈嫻君，2012，《入戲成局：女性同性伴侶與原生家庭的關係與互動》。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沈暉智、林明仁，2019，〈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以 1993-1995 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稅務資料為例〉。《經濟論文叢刊》47(3): 393-453。
- 利翠珊，2007，〈華人已婚女性代間矛盾情感之特色與測量〉。《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0(4): 357-386。
- 吳明燁，2016，《父母難為：臺灣青少年教養的社會學分析》。台北：五南。
- 吳嘉苓，2015，〈訪談法〉。頁 33-62，收錄於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台北：東華書局。
- 吳嘉瑜，2004，〈子代夫妻對偶代間關係經驗：「他」的矛盾？「她」的矛盾？〉。《中華輔導學報》15: 123-149。
- 吳嘉瑜、趙淑珠，2004，〈以多重觀點建構代間矛盾經驗之新嘗試〉。《中華心理



- 衛生學刊》17(1): 75-111。
- 吳慧瑛，2007，〈家庭背景與教育成就：五個出生世代的比較分析〉。《人口學刊》34: 109-143。
- 林如萍，2011，〈東亞家庭的代間互動類型研究〉。《當代中國研究》18(1): 212-239。
- ，2012，〈台灣家庭的代間關係與代間互動類型之變遷趨勢〉。頁 75-124，收錄於伊慶春、章英華編，《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家庭與婚姻》。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林如萍、黃秋華，2017，〈三代之間：代間關係與中年生活福祉〉。《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9(3): 381-414。
- 胡郁盈，2017，〈從「現身」到「關係」：台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0: 107-151。
- 張宜君，2016，〈臺灣產業轉型下的工作機會分布變遷：1978-2012〉。《臺灣社會學刊》60: 135-187。
- ，2017，〈高等教育報酬的世代差異：勞動市場結構轉型的影響〉。《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7(1): 87-139。
- 張宜君、林宗弘，2015，〈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複製：混合效應維續的不平等〉。《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2): 85-129。
- 張盈堃，2005，〈文憑病：重思追求更高的教育作為階級向上流動的迷思〉。《東吳社會學報》18: 1-42。
- 張建成、陳珊華，2006，〈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的階級差異：兼論家庭與學校文化的連續性〉。《教育研究集刊》52(1): 129-161。
- 陳昭如，2009，〈在棄權與爭產之間：超越受害者與行動者二元對立的女兒繼承



- 權實踐)。《臺大法學論叢》38(4): 133-228。
- 陳筱婷、洪瑞斌、莊騏嘉，2014，〈穿越階級藤蔓－父女關係斷裂與再生歷程〉。  
《應用心理研究》60: 273-313。
- 畢恆達，2003，〈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女學學  
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 37-78。
- 畢恆達、潘柏翰、洪文龍，2014，〈LGBT〉。頁 381-413，收錄於陳瑤華主編，  
《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 年》。台北：女書文化。
- 莊淑惠，2011，《第一代與非第一代大學生個人因素、校園經驗與學習成果模式  
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黃秋華、林如萍，2018，〈成年子女與嬰兒潮世代父母的代間經濟支持交換：生  
命事件的影響〉。《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19: 15-43。
- 黃雅容，2008，〈台灣第一代大學生的背景和特質：台灣和美國的發現一樣  
嗎？〉。《師大學報：教育類》53(2): 111-130。
- 彭滄雯、洪綾君，2011，〈為何從母姓？：夫妻約定子女姓氏的影響因素調查〉。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8: 1-54。
- 葉光輝，2009，〈台灣民眾的代間交換行為：孝道觀點的探討〉。《本土心理學研  
究》31: 97-141。
- 葉高華，2018，〈大學多元入學是否有利「家境好」的學生？〉。《臺灣社會學  
刊》64: 171-195。
- 趙彥寧，2008，〈往生送死、親屬倫理與同志友誼：老 T 搬家續探〉。《文化研  
究》6: 153-194。
- 劉若蘭、林大森，2012，〈家中第一代大學生的就學經驗、學習成果與畢業流  
向：與非第一代相比〉。《教育實踐與研究》25(2): 97-130。

鄭英傑，2017，〈學做工還是怕做工？臺灣社會高學業成就勞動階級學生及其家長的反再製心態之分析〉。《教育研究集刊》63(4): 65-100。

蔡淑鈴，2004，〈高等教育的擴展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響〉。《台灣社會學》7: 47-88。

魯慧中，2017，〈性別偏好與出生排序效果：重新檢視台灣家戶對子女教育資源之配置〉。《經濟論文叢刊》45(4): 579-637。

駱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 113-147。

——，2018，〈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多元入學的影響〉。《經濟論文叢刊》46(1): 47-95。

謝孟穎，2019，〈拚死考上月薪7萬公職，卻換來右手廢掉！一場大病讓她看清「為爸媽而活」沉痛代價〉。《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1889987>，最後取用：2020年1月1日。

謝志龍，2013，〈從兒子偏好與家庭資源探討手足結構對生育決策的影響〉。《人口學刊》47: 35-86。

藍佩嘉，2019，《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台北：春山。

羅秀東，2012，《教育機會均等性之探討：第一代與非第一代大學生之比較》。宜蘭：佛光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Bittman, Michael, Paula England, and Nancy Folbre, 2003, "When Does Gender Trump Money? Bargaining and Time in Household Work."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186-214.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1-2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Richardson, J. Westport, CT: Greenwood.

Brainer, Amy, 2019,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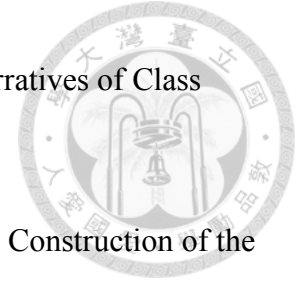
Cheng, Yen-hsin Alice, 2013, "The Role of Non-cognitive Traits in Higher Education Achievement among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Taiwanese Youth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25(4): 735-764.

Granfield, Robert, 1991, "Making It by Faking It: Working-Class Students in an Elite Academic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3): 331-351.

Kandiyoti, Deniz, 1988, "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 *Gender & Society* 2(3): 274-290.

Kohn, Melvin L., 1963, "Social Clas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8(4): 471-480.

Lareau, Annette, 2011,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wler, Steph, 1999, " 'Getting out and Getting Away': Women's Narratives of Class Mobility." *Feminist Review* 63(1): 3-24.
- Leathwood, Carole and Paul O'Connell, 2003, "'It's a Strugg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tudent'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8(6), 597-615.
- Lee, Elizabeth M. and Rory Kramer, 2013, "Out with the Old, In with the New? Habitus and Social Mobility at Selective Colleg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6(1): 18-35.
- Lehmann, Wolfgang, 2009, "Becoming Middle Class: How Working-class University Students Draw and Transgress Moral Class Boundaries." *Sociology* 43(4), 631-647.
- , 2014, "Habitus Transformation and Hidden Injuries: Successful Working-class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7(1), 1-15.
- Lin, Ju-Ping and Chin-Chun Yi, 2013,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8(3):297-315.
- Lucey, Helen, June Melody, and Valerie Walkerdine, 2003, "Uneasy Hybrids: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Becoming Educationally Successful for Working-Class Young Women." *Gender and Education* 15(3), 285-299.
- Luescher, K. and K. Pillemer, 1998,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0(2):413-425.
- Mallman, Mark, 2017, "The Perceived Inherent Vice of Working-class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5(2): 235-250.
- Qin, Desiree Baolian, 2006, "'Our Child Doesn't Talk to Us Anymore': Alienation in Immigrant Chinese Families."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37(2):162-



179.

Quart, Alissa 著、李祐寧譯，2019，《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新北：八旗文化。

Reay, Diane, 1998, "Rethinking Social Class: Qualitative Perspectives on Class and Gender." *Sociology* 32(2): 259-275.

Reay, Diane, Gill Crozier, and John Clayton, 2009, "'Strangers in Paradise'? Working-class Students in Elite Universities." *Sociology* 43(6), 1103-1121.

Rondini, Ashley C., 2016, "Healing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Redemption Narratives, Aspirational Proxies, and Parents of Low-Income, 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Sociological Forum* 31(1):96-116.

Rubin, Gayle,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Pp. 157-210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ited by Rayna R. Rei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Sennett, Richard and Jonathan Cobb, 1972,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eggs, Beverley,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Becoming Respectabl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Willis, Paul 著、秘舒、凌旻華譯，2013 [1977]，《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南京：譯林。

Yu, Wei-Hsin and Kuo-Hsien Su, 2006, "Gender, Sibship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Taiwan: Son Preference Revisite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8: 1057-1068.



## 附錄一、徵求受訪者表單



標題：親子間學歷差距與親子溝通—誠徵受訪者

說明文：

各位朋友好，

我是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謝宇修。目前正在進行的碩士論文研究為探討親子間學歷差距（父母低學歷、子女高學歷）與親子溝通間的關係。我在徵求有相關經驗願意受訪的朋友，懇請大家幫忙！

\* 您是否覺得從上大學以來，變得和父母在一些事情上難以溝通？像是就讀的學科父母始終無法理解與認同；自己關心的事、思考事情的角度、對新聞或社會議題的觀點和父母差異很大，卻很難溝通；畢業後的生涯安排、工作選擇和父母的期待落差很大；自己想找怎樣的對象，要不要（及何時）結婚和生小孩，等等諸如此此類事項。

如果您有類似這樣的經驗，甚至感受到困擾，並符合以下對象尋求條件，請填寫本表單，我將主動向您聯繫。如符合研究目的，我將進一步安排約訪事宜。

\* 對象尋求條件（皆須具備） \*

1. 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大學部，或現正就讀於以上各校研究所。

2. 22-30 歲之間。



3. 父母學歷為高中職或以下。

訪談的內容大致包括：

1. 您曾與父母就求學上的溝通不良或衝突經驗。例如：父母無法認同你選擇的科系。父母對你的升學計畫有意見。
2. 您曾與父母就工作安排上的溝通不良或衝突經驗。例如：父母不滿你選擇工作的組織、工作型態或收入。
3. 您曾與父母就找對象、成家等事項上的溝通不良或衝突經驗。例如：父母經常管你有沒有交往對象或何時結婚。

我可以就近到您平常生活方便處，擇安靜地點訪談。訪談時間約 1-1.5 小時。雖然本研究沒有經費贊助，沒辦法負擔訪談費，但請讓我請您喝杯飲料（或其他等價物）聊表心意。

\* 本研究謹遵研究倫理，您提供的一切訊息都將匿名處理，並僅用於學術研究之途。您有權了解研究發現。若訪談過程中或訪談後希望退出本研究，也必會尊重您的自主決定，不使用您所提供的一切資訊。

感謝大家，祝大家一切順心。

\* 如對於本研究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直接寄信向我聯繫：

[r05325001@ntu.edu.tw](mailto:r05325001@ntu.edu.tw)

研究者：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 謝宇修

指導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藍佩嘉教授



表單問項：

年齡、性別、性傾向、最高學歷、就業狀態、婚育狀態、現居地、家鄉、父親最高學歷、母親最高學歷

## 附錄二、訪談告知



本訪談為研究者為撰寫碩士論文之用。該碩士論文的目的是探討教育向上流動青年的經驗，並聚焦在青年與父母間關於求學、就業、交友和成家面向上的觀念差異與溝通難題。由於問題為開放式問題，請你想像自己在說故事、而不是在回答問題來受訪。

訪談預計約 1-1.5 小時，過程會全程錄音，並在之後會製作逐字稿。錄音檔及逐字稿絕不對外公開。之後研究者引用逐字稿內容所進行的研究，皆會匿名處理。若有提到足以辨識出受訪者身分的資訊也會進行必要的修改。關於訪談中提到的任何事情，研究者不會在研究目的外轉述給第三人知悉。

由於訪談涉及請受訪者回想比較不愉快的經驗，或是涉及個人隱私或家庭背景，若不便透露，您有拒絕回答的權利。若訪談後受訪者希望退出本研究，也可以直接向研究者提出，不會造成任何不愉快。受訪者也有權利知悉研究最後所發表的成果。

如有任何問題，可以直接當面向研究者提出，或寄信聯絡。

研究者：謝宇修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指導教授：藍佩嘉教授

r05325001@ntu.edu.tw

### 附錄三、訪談大綱



\* 盡可能請您詳細描述印象深刻的事件，以及該事件對自己的影響與意義。

\* 部分問題若不適用於您的狀況，可以跳過不答。

#### 一、親子溝通

1. 請你簡單介紹一下你家。包括家庭成員、家人間的關係等。
2. 你住在家裡嗎？如果是，你通常都幾點回家？回家之後你跟家人都在做什麼？  
如果你不住家裡，你最近有回家嗎？多常回家？
3. 你平常會和父母聊天或談事情嗎？在什麼樣的場合、時機下會聊？通常聊什麼樣的話題？
4. 你和父母之間最常就什麼事情觀念不合、很難溝通，或是吵架？請你回想一次印象最深刻的衝突事件。
5. 針對前一題你提的事，你覺得為什麼父母沒辦法理解或接受你的想法？你覺得父母和你很不一樣的觀念是怎麼來的？和他們的成長背景、求學歷程、出社會的經驗有什麼關係嗎？
6. 如果你發現你跟父母就一件事很難溝通，你會避免跟父母談論嗎？你怎麼樣避免跟父母談論？還是你依然會積極說服父母理解或接受你的想法？或是你覺得父母會刻意找機會讓你聽他們的？
7. 你覺得跟你周遭的朋友比起來，你跟父母的關係算是親近還是疏離？算是比較多還是比較少衝突？
8. 你覺得你跟周遭朋友的家庭相比，家庭生活、親子關係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嗎？像是有沒有聽過朋友談論他家裡的狀況，或是去過朋友家，發現跟自己家裡很不一樣的地方？



## 二、觀念差異

### (一) 求學

1. 請你簡單描述一下你的求學歷程。讀過哪些學校、如何決定選校等等。
2. 你在求學過程中是否有補習？如何決定要或不要補習的？家裡的經濟狀況是考量因素嗎？
3. 你當初在選大學、選科系的時候，有跟父母討論過嗎？父母有什麼意見？最後是怎麼決定的？事後父母對你錄取的校系有什麼想法？
4. 你有沒有考慮（或已經做過）轉系、雙主修、輔系、轉學或休學？如果有，你有和父母討論過嗎？父母有沒有對你的打算很擔心？或是很積極勸或要求你這麼做？父母對於你有可能（或已經）延畢有過什麼意見嗎？
5. 上大學之後，父母還有在關心你的成績，或是管你選修什麼課？他們問你的時候，你怎麼跟他們交代？你有沒有攔截過成績單，避免被父母看到？
6. 你大學畢業之後有繼續升學嗎？或是有考慮繼續升學？你對工作和升學之間的選擇是怎麼想的？父母對於你繼續升學的決定，有給你怎麼樣的壓力嗎？
7. 你有沒有考慮過（或已經）出國留學？你會很擔心留學經費的問題嗎？父母對於你要不要留學的態度是什麼？他們對於你要在國外待好幾年有什麼想法？
8. 你覺得在你求學歷程中，你父母對你和對你兄弟姊妹的投資與付出有什麼差異嗎？你會不會覺得他們對兒子和對女兒的付出與期待不同？

### (二) 就業

1. 對你來說，找工作是一件多困難的事？你覺得在找工作時，哪個部分面臨最大的挑戰？你會尋求父母怎樣的幫忙嗎？



2. 你覺得父母擔心你的就業能力嗎？比如說，質疑你的學科專業，擔憂沒有人要雇用你？有沒有要求過你考證照或去實習，甚至幫你安排？
3. 你曾經經歷過最長的待業期大概多久？待業的時候你的經濟來源是父母嗎？父母有沒有、如何催促你找工作，或幫你安排？你怎麼看待跟父母拿錢這件事？
4. 對你來說，找工作的時候你怎麼評估你要不要接這份工作？父母會管你嗎？那他們對找工作的觀念是怎樣？
5. 父母的工作型態有沒有成為你心中想像未來職涯選擇的一個參考基準？
6. 你喜歡你現在的工作嗎？你覺得現在的工作好在哪裡，不好在哪裡？你心目中理想的工作是怎樣的工作？工作穩定程度、薪資和待遇，以及是否符合志趣與理想，這些評估工作的標準你怎麼看？你父母對你現在的工作有什麼想法？他們希望你做怎樣的工作？
7. 很多父母希望小孩去考公務員，有個終身穩定的工作。你的父母會這樣想嗎？如果有，你覺得為什麼你父母這樣想？那你對考公務員的想法是怎樣？

### (三) 交友與成家

1. 你印象中父母什麼時候開始催促你交男女朋友？他們對你的伴侶有什麼樣的期待，或是看重對方的哪些特質？
2. 你有過幾次交往的經驗？你曾經帶你交往的對象回家過嗎？如果有，你有告訴他們，這是你的交往對象嗎？父母有什麼反應？如果沒有，你父母知道你有對象，或認識你的交往對象嗎？他們的態度是怎樣？為什麼你不帶交往對象回家，或給父母認識？
3. 你的父母有沒有為你安排過相親，或介紹對象給你？你有什麼反應？



4. 你覺得父母有施加壓力，催促你結婚、生子嗎？你對結婚的期待跟他們有什麼差異嗎？比方說你想有什麼樣的條件、找到怎樣的對象才想要結婚？或是你不想結婚、想要晚點結婚等等。
5. 如果你是同志的話，你有跟家裡出櫃嗎？如果有，出櫃的過程如何？父母現在對你的同志身分的理解與認同狀況如何？可以接受你的伴侶嗎？如果沒有的話，有沒有過被父母懷疑，或差點被發現的經驗？是否有和父母討論過同志議題？
6. 請你想像你未來理想的家庭圖像。你希望你跟父母同住嗎？如果不希望，你希望住在離父母多遠的地方？你想要跟哪些人住在一起？父母有沒有自有住宅，以及住家裡需不需要出錢，會影響你的規劃嗎？那你父母的想法跟你有什麼不一樣嗎？

### 三、學歷差距與親子關係

1. 回想一下剛剛你說過的關於求學、就業、交友和成家的事情上，你的觀念，還有你父母的觀念，尤其是你們之間觀念的不一致。你覺得有沒有哪些事情的觀念，你過去和父母是比較相似的，但是在你唸大學之後，和父母開始變得不一樣？你覺得為什麼會變得不一樣？和你的求學經驗、交友關係或人生經歷有什麼關係嗎？
2. 這些你跟父母之間觀念的不一致，你覺得為什麼父母會那樣想？跟他們的求學經驗、交友關係或人生經歷有什麼關係嗎？
3. 在這些事情中，你覺得有沒有什麼事情是隨著你畢業後，年紀漸長，開始能夠理解甚至接受父母的觀念的？如果有，你覺得為什麼你當時沒有辦法理解或接受？





4. 隨著父母年紀也在增長，有沒有哪些事情是雖然你們之間的觀念落差終究不會弭平，你卻會考慮為了讓父母安心，而讓步妥協的？
5. 你覺得你跟父母之間的關係，是可以談內心話的嗎？為什麼？
6. 你是否需要父母的金援，或是需要住在父母的房子裡？還是你會給父母錢？你跟父母之間的關係，會不會影響你想不想住在父母家裡，以及金錢上的往來？

#### 四、對這次訪談的想法或回饋

五、受訪者與父母基本資料（此項不列入給受訪者的訪綱中，僅於訪談結束後口頭詢問）

	受訪者	父親	母親
年齡			
性別			
性傾向			
職業			
收入			
教育程度			
學科			
居住地（以前／現在）			

感情狀態／婚姻狀態			
子女數			
經濟交換關係			
家庭結構			

